

责任编辑：杨匡满　龚　玉

冬天的童话
Dongtian De Tonghua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67,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13}{16}$　插页2
1985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3,000

书号10019·3860　定价1.40元

献　　词

政治修明的年代，这本书出版了。也许，某些文艺评论上写着："这是她——一个女孩子的遗作……"

我用生命写出这些文字，献给我的哥哥遇罗克。

作　者

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

——遇罗克就义四周年纪念日

目　　录

冬天的童话

一 结 识

突然，外屋的门开了——奇怪的是没听到狗叫，我家的白狗是村里有名的厉害狗呵。

我挪挪小板凳，从洗衣盆边站起来，向玻璃外张望，只见白狗正站在院子里，向屋门摇尾巴呢。

随着凛冽的北风卷进来的雪花，走进两个人来。一看那同样的很旧的蓝棉短外衣，就知道不定是哪个村的知识青年。

“赵志国在这儿住吗？”前面那个面色微黑的青年问道。他长着一双灵活的金鱼眼，厚嘴唇微笑似地向上翘着。另一位黄布棉帽遮着脸，正跺着脚上的雪。

“是，请进吧。”我招呼道。

他俩进了里屋，给屋子里带进一股寒气。

“这屋真暖和，”那面色微黑的青年边走边摘下棉帽，坐在炕沿上，环视了一下，说道：“一路上可给我们冻坏了！走到半路偏赶上下起了大雪！”

另一位青年一进屋就顺手抄起炕上的一张过了期的

《参考消息》，也顾不得摘帽，头也不抬地看起来。

“喝水吗？”我把暖壶、玻璃杯放在他俩之间的炕桌上，又从柜子里抓了一把水果糖：“吃吧。”

由于知识青年们常来常往，不必客气，所以我依旧坐下来洗我的衣服，一面和他们聊着天。

“赵志国呢？”仍是那青年问道。

“走了半个月了，”我想了想：“今天是一月四号吧？一分完红他就回北京啦。”

“噢，走啦？那，你不回去了？”

“有家的人不比你们哪，不看家，明年还过不过了？”我又问：“你们哪儿的？有事吗？”

“西河的，没事出来蹓蹓。”那青年说道：“你没听说过我们？”

“西河……”我停下洗衣的手，“除了姓维的哥儿俩，都来过呀。”

“正说对了！有烟吗？”

我把志国平时用的烟笸箩递给他。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破纸条，熟练地卷了起来，立即过瘾似地吐出了一口淡淡的烟雾：“我叫维力。他是我哥哥，维盈。”

“维力、维盈？”我一边搓着衣服，一边欣赏着这音的和谐：“这名字怪好听的！”

这时，那个看报的人才象略略听到了点什么，抬起头来，向我抱歉似地笑了一下，温和中却带着苦味儿。我才发现，这是一张多么温柔聪敏和安静的脸呵。好象在一间烟

气弥漫的屋子里，你突然推开窗户，一眼看见深蓝澄静的天幕中挂着一弯银月，伴随而来的是凉爽沁人的空气——这就是我看到他相貌时的心情。是否他那甲字形的脸和白玻璃框眼镜使我想起了哥哥？还是他白净的肤色和五官透出的宁静气质象哥哥？我说不清……

“其实，”他注意地望了望我，腼腆地含笑道：“我们早就听说过你了。”

“什么时候？”我好奇地望着他。

“六六年。”他说话的声音那么悦耳，多象哥哥的声音呵。

“你还记得维兰吗？”他问道。

“维兰？记得！”

“她是我姐姐。”

“真的？”

他笑了笑，又腼腆地微低了头。只有这腼腆不象哥哥。

“那时候我和维力就听说过你了。”

“距今快八年啦。”我不由停了洗衣，望着他：“你姐姐怎么说起我的？”

“她说，你给她写过一首诗，是赞美她的，她可得意了，还给我们描述了半天你的模样。”说罢他温和地笑了。

“真的，”维力笑道：“我们应当算老相识啦。”

“真有意思！”我不禁兴味十足地回忆起来，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位鹤立鸡群式的姑娘，那时她刚大学毕业，六六年

文革初期做为工作组的一员，到玩具厂执行任务。而我六五年才从工艺美术学校毕业，正好在那个厂实习，她恰巧领导我们木工车间。那车间除了我全是老头儿，开会谁也不发言，她就总在会下动员我这会议的记录员——唯一的年轻人起带头作用。这动员虽然无效（对于“走资派”有什么言可发呢？）可我却很喜欢她，我们大部分时间是聊家常。我告诉了她我家的一切情况，她很感兴趣，似乎她非常喜欢我——说真的，那时我真希望从来不交女朋友的哥哥能够认识她呢！她也戴着白玻璃框眼镜，爱穿一件黑白格短袖绸衫，短发，不俗气而且可爱。然而工作组很快撤走了，从此再也没见到她。现在经维盈一提，仿佛在我和维盈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红线穿着，那么亲切和自然，又带点儿甜蜜。

“那首诗我写的什么？我可忘啦。”我思索着。

“你把我姐姐比做太阳。”维力喝了口水，笑道：“有一次我哥去你们厂给我姐姐送衣服，回来说没看见你，还觉得挺遗憾呢！”

“还有这样的事？”我十分高兴，维盈却不好意思地低了头。

“多快，”维盈这时才摘下棉帽子，露出那聪颖的前额和细软的黑发：“一晃八年了。变化真大呵……”

是的，这八年，确实变化很大。如今见了维盈，更觉感慨。可是，感慨又有什么用呢？我早已不是那时的小姑娘啦。此时他的姐姐再见到我，也不见得喜欢我了……

我搓着衣服，排挤开不愉快的想法，望望他俩的相貌问道：“你们是亲兄弟吗？”

“是呀。”

“可真不象。”

“谁都这么说。”维盈笑道。

“我是傻大黑粗，他是白面书生，对吧？”维力这一句话给我们都逗乐了。

北大荒冬天日短，农闲时，都吃两顿饭。此时已到吃下午饭的时间，我留他们吃饭，他们不见外地答应了。顷刻间我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了上来。

“嗬，你们的伙食不错呀！”维力欢喜地拿起了筷子。

“也许比你们强一点儿？”我已听过不止一次这样的话了。

“我们？你知道我们怎么过的吗？”他有些不以为然，一边大口地吃着。

我们坐在热炕上，围着炕桌，吃着队里分的大米焖成的雪白的米饭。冬季正值家家都杀了猪，肉丝炒酸菜，肉片炒土豆，大头菜豆腐丝汤，使暖盈盈的屋里洋溢着诱人的香味。可口的饭菜使人们的话多了，也更随便了些，人们的感情似乎因这黄澄澄的灯光更加接近了。

“你们队今年合多少钱？”维力边问边大口地嚼着；而维盈就连吃饭也和他正相反——细嚼慢咽，一点儿声都不出。

“比去年差。”我说：“一块七。”

“和我们队差不多。”

“你们俩分了多少钱？”

意外的是他们竟狼狈地一笑。

“五十多块钱。”维力耸了耸肩。

“这么少？”

“我们俩去年七月才从北京回来。”维力解释道：“才干了几个月？除去六百斤口粮，一夏天的香瓜、西瓜、柴禾、油钱等等，能分五十就不少啦。”

“今年不回北京了？”我问道。

“回去。”维力满高兴地说：“后天我就走。我先走，他后走。我妈早就来信催了。”

“你们的住处真背呀！”维盈吃完饭，撂下碗，欠身用哈气化了块玻璃上的冰花，探头向黑漆的大院子望去：“雪这么大了，还不停！这周围的院子有三亩地吧？四周的树也是你们的吗？”

“是。”维力也吃饱了，我一边下炕收拾碗筷，一边说：“当初买这房，所以那么便宜，不就因为太背，原来的一家三口被那个流氓全杀死了吗？”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当时这事传到我们村，谁听了都够害怕的！”维力咧嘴摇了摇头：“守着这大空房，不害怕？喊都听不见哪！怪不得人死了三天村里才知道！”

“有什么可怕的呢？那流氓所以敢如此，也是那家的女人不正派。”

“你们户口在一队，”维盈问道：“离这儿二里多地，为什

么却买了二队的房？”

“原来的房太破，正想盖房，正好二队出了这件人命案，谁也不敢买这房。我和志国一看，两间大北房，一间仓房，三亩地的大园子，四周一百多棵小杨树，密实的柳条，又有小院墙，十六棵海棠树，一棵山丁子，前边是条河，虽然在村边，背点，可才二百块钱呀，太便宜了。志国又有自行车，二里多地，干活也算方便。”

“这园子算自留地吗？”维盈问道。

“去年没算，今年大概要算啦——不是传达上边的精神了吗？”

“这么大园子就够一个人整年干的啦，”维力喷了口烟，舒服地靠墙坐在热炕头上：“去年这园子出产多少？”

“去年我们种了一万六千棵烟叶，三千棵向日葵，光这两样卖公家就卖了九百多元。一队还有我们三口人一亩半自留地，种的土豆、倭瓜，也卖了些钱，打了两麻袋海棠，也卖了，自己根本吃不了。对了，我去炒点瓜子来。”

瓜子炒熟后，维力烟也不抽了，三个人都脱了鞋，坐在热炕上，围着炕桌嗑瓜子，一边闲聊——冬闲对于丰衣足食的人们来说实在是个有趣的季节呵！我们谈着插队的同学每年聚会到北京时带去的外地的真实情况；谈到本来不该变穷的农村也让极左分子们闹穷了；谈到关里的农民来闯关东谋生的人一年比一年多；谈到许多“盲流”点（政府管他们叫盲动流行人员），谈到他们开创基业的千辛万苦；谈到东北虽然富，外省虽然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血统论严重

地统治着农村，地富子女连找对象都难，更甭说入党入团，人为的阶级斗争在富饶的北大荒依然不减分毫，而那些穷省就更甚；谈到林彪由亲密战友的地位一下子摔下来成了特号的阶级敌人，连最没文化的农村老太太也认为哭笑不得……

怒吼的北风呼啸地撞着玻璃，更感到屋子的可恋和可爱，维盈不由望了望腕上的表。

“要走？”我轻轻问道。

“嗯，”他无奈地一笑：“二十里呢。”

“该死的天！”维力扒着玻璃说道：“雪有一尺厚了！怎么下个没完？”

“要不住这儿吧，”我挽留道：“这天气怎么回去呢？要是遇见狼呢？”

他们面有难色地望了屋子一眼。

“没关系，我们里边这小间也可以睡人，”我下了地，撩开那纸墙上的门帘说道：“这不是？我就睡这儿。”

“那……”他们略一沉思，微微露出同意的喜色。

“就这样啦？”我坐在炕上宣布道：“决定啦。真好，我们又可以多聊会儿了。”我饶有兴致地问道：“你们怎么过的？”

“我们？”维力笑道：“知青点早就散了，各过各的，我们哥儿俩买了间小马架，单过。哪天你去看看？志国早去过了。”

“听说过得不错。可那时候不知道你们是维兰的弟弟，

也就没往心里去。”

“你能不能告诉我……”维盈迟疑地道：“你哥哥的事？”他见我嗑着瓜子没有回答，一苦笑，又补充说：“真的，从六六年油印的《出身论》一贴出来，我就特别想见到这位作者。后来铅印了，一卖《中学文革报》人们就想知道作者是谁，我真想见见这人呵！到了这儿，才知道是你哥哥……可是……唉！”说着，他竟沉痛地不言语了。

“烈士！”维力从遐思中缓缓地抬起那严肃的面庞，自言自语然而有力地又迸出这两个字：“烈士！”

我正想着应当由何说起，不料维盈却立即改变了话题：“听说，你父亲和两个弟弟也在这儿？”

“嗯，住在一队，”我答应着，心里却在好笑地想——好心的人！你的眼神怎么骗得过我，你以为怕我提到哥哥伤心呢！你兴许后悔自己的冒失？可惜，我可不是象你那号爱伤感的人！我倒真想四处宣传哥哥的事迹才好呢！

“真的，我有好多事都想问你，”维力可没有他哥哥那么敏感和细心，兴头十足地问道：“有一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

“什么话呢？”

“嗯……就是……”他却吞吞吐吐起来，难于开口地笑了一下：“我们都不理解，你怎么和赵志国那样的人结了婚？”

“那样的人？”——我并不高兴这句话。我才发现，维盈也正出神地望着我呢，从他那期待的眼神里，好象他比维力

更想知道答案。

“唉！”我装作不在意地短叹一声：“说来话长，我看留着明天讲吧。”

这晚，我睡在里屋的木板床上，接二连三地想着心事……

我心里涌出从未有过的快乐和激动，是什么呢？是维盈给我的一切印象？是他那温和、安静的面庞？是那象哥哥一样敏感、纯洁的气质？是他那宽厚、善良的心肠？是他那使人安静的轻音乐般的声音？是他八年前就对我埋下的好感？……相见恨晚呵！我不由遗憾地想，假如七〇年十月我来闯北大荒时能在半路上遇见他，聊一聊，我大概不会嫁给志国的。可是，现在我又有什么资格这么想？别忘了我已是孩子的妈妈了！我怎么配有这样的想法呢？多么要不得呵！何况我还不了解他。如果我喜欢他，我只能拿他当朋友，但愿是知心朋友，但决不能越过朋友这一步。对，等志国回来我要高兴地告诉他我结识了维盈，希望他俩也能成为好朋友，志国也许会象我一样高兴的，我们三个人一定会处得非常好……想到这儿，觉得心里安定了许多。伸手开了电灯，悄悄翻了个身，拿起枕头旁边的日记本和钢笔。这天蓝色的塑料皮上印有烫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几个字，是去年北京慰问团发给知识青年作为留念的。而我这“思想反动”的教养分子到了东北竟算为知识青年，也是十分意外的事！究竟从什么时候算的，谁算的？说不清。总

之，一切待遇都和知青一样，没有人去刨根问底，这就是北大荒的可爱！

握着这支黑杆的自来水笔，总觉得分量有千斤重。它，是哥哥七〇年三月五日被枪决以后，爸爸妈妈从监狱取回来的呀！这笔，我留下了，我决心要紧握着它，继承哥哥的遗志。哪怕费十年功夫，也要写出哥哥的形象！

我在本上唰唰地继续写关于哥哥的“回忆录”，大约过了凌晨两点，我才睡着了。

次早，我悄悄地起了身。一掀门帘，只见他俩还香香地睡着。维力半张着嘴发出微弱的鼾声，而维盈呢，面朝天地平躺在被窝里——那被窝平整的形状、那安详宁静的神态，就象他一夜不曾动一下。多有趣的怪人呵，好象他静得没有了生命似的！

我到外屋烧洗脸水，做饭，尽量不出声地忙活着。一回头，不知什么时候，维盈已沉吟地站在我身后。

“你起这么早？”他温和地问道。

“天天这样，不算早啦。”我一边切菜一边回答。

“昨晚上，”他轻轻问道：“好象你屋里一直亮着灯，是吗？”

“那么，你什么时候睡着的呢？”

他只是腼腆地一笑，不再说什么。

这无言的答复更胜过有言，我心里不由躁起一阵轻微的不安。

吃罢饭，他们并不急于走。我们又象昨晚一样，围着炕

桌，坐在热炕上闲嗑瓜子。我向他们讲起了哥哥。

……讲了一阵，我们三个都沉默了。

“烈士！”维力低低地说了一声，那严峻的表情含蕴着心中的不平静。

“你知道吗，”维盈抬起凝滞沉思的目光，苦笑着说：“我们邻居的孩子，就因为贴了一张‘《出身论》的作者永垂不朽’的标语，就被判了八年徒刑。”

我从鼻子里长嘘了一口气，叹道：“这个案子牵涉的人很多，凡是要《中学文革报》的人，地址都被搜了去，倒了霉，更不用说办报的人了。”

“你家的遭遇可想而知了……”维盈郁闷地叹了口气。

“当然。你们家呢？”

“我们家？”不等维盈开口，维力便接过来说道：“我爸爸五〇年被镇压了，那时我哥三岁，我才两岁。我母亲是小学里的一级教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守寡至今，全靠她养活我们。我姐姐在中学的学习和表现优秀极了，一直到高三才入上团，考验了六年！好不容易上了师范学院，想入党，怎样争取也不行，出身不好呵！为这她苦恼极了，后来干脆失望了。她原来有个男朋友，出身不太好，我母亲坚决不同意，给她找了个工人出身的。”

“感情好吗？”我问道，实在为她感到悲哀。

“还行。小孩儿都有一个了。”

“你们对你父亲有印象吗？”

“没有，”维力吐了口烟，不加思索地说：“真的，我们都挺恨他，尤其我母亲。他只给了我们苦难。”

我没有说什么，心里不太明白。而维盈却低头不语，象在想着心事。

“那么，”过了会儿我又问：“文革时你们家也倒了霉了？”

“那还用说？”维力望着自己喷出的烟圈。

“整整有一个月，”维盈抬起头说道：“我们家只好睡在火车站里……”

他没再说下去，我也无心思再问了——谁愿提那些伤心的事呢？那些往事早已屡见不鲜了。

“真的，”维力又象想起了什么，征询地望着我说：“那……你能告诉我昨天问你的那件事吗？”

“你们以后不是还要来吗？”我搪塞地说：“以后再聊吧，故事别一下子讲完呀！要不就该没的说啦。”

也许是我那神气把他俩逗笑了，又闲扯了些别的，他们起身告辞——雪早已停了。

我把他们送到村边，目送着他们走了很远。维盈回头望了望，又回头望了望……

我一个人慢慢走回来，说不出是愉快还是惆怅，不知为什么，望着那白皑皑的雪原，心里却做起诗来：

我不知这是否爱情，

那柔和的声音

使人温暖。
我不知这是否爱情，
那敏感的心地
扣人心弦。
我爱听大海的歌唱，
从没有这么亲切；
我爱听松涛的低鸣，
从没有这般动情。
宽厚、淳朴的性格，
象春风一样柔和；
聪睿善良的心灵，
象水晶一样透明。
我愿把深深的爱，
化成对哥哥的怀念；
我愿在友谊的大海，
寻求力量的源泉！

这晚，我睡得那么熟，做的梦多么香甜呵！

次早醒来，天还没有大亮。望着玻璃上美丽的冰花，心想，维盈还能来吗？不，也许他再不会来了，他太敏感，一定觉出我喜欢他了。他是有理智的，如果他也喜欢我，他是不会凭感情用事的——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呀。

唉！我多希望，每对夫妻都能觉得，自己所见过的任何人，也不如对方可爱，那该多好！马克思和燕妮彼此间就是

这种感情吧？可是我所见过的结了婚的人，又有几对是这样的呢？遗憾的是，维盈不会再来了，想不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竟成为最后一次了。

总之，我已肯定他不会再来，只是悲哀地嘘了口气，心里倒清静了许多。

这一天，我伏在炕桌上写回忆哥哥的文章。

第二天一早，我又写着。忽然，外屋的门被轻轻推开了，维盈微笑着站在我面前。

“维盈？”我惊喜地嚷道：“真没想到！”

“没想到吗？”他腼腆地笑了笑，坐在炕桌边。

“我家的狗怎么也不叫？你给他扔好吃的了？”

“哪有的事！”他笑道：“凡是属狗的都跟我有缘罢了。”

“你这是说我吗？”我笑道：“我就属狗呀。”

“不不，”他羞赧地低了头，笑着解释道：“我无意中说的，我真不知道……真的，我们村的狗很少咬我，不管多厉害的。”

“也许你有点儿魔力吧？”我开玩笑地说。

“你在写什么？”他探头看了看本子。

“我？瞎写着玩儿。”我合上本子，下地给他倒了杯糖水：“我以为，你不会再来了。”

“为什么？”

这怎么答复他呢？我只好一笑置之。

“我知道你想的什么！他锐敏地含笑说道。

"知道就省得我告诉你啦。"我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

"不知为什么，我老想到你这儿来。"多有趣，他竟自动承认起来！虽然吞吞吐吐，却象鼓了很大的勇气呢。

"你是——毫不犹豫地就来了，还是犹豫了半天才来呢？"

"犹豫了——你真会猜！"他开心地笑道。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各自想着心事……

真没想到，他竟对我一见钟情！两个人都如此，倒真是罕见的事呢！可是，不管怎么一见如故，也只能成为朋友罢了……

"真的，"他抬起头，望着我，又微微低下头去，轻声问道："我和维力，还有许多同学都不理解，你怎么和志国结的婚呢？能告诉我吗？"他略带哀求的恳切地望着我。

难道，他今天特意来，就为的听这个吗？如果他为了猎奇，我可真没心思去介绍自己。可是，他这一副虔敬哀伤的神气，使我无法拒绝他。我被他的关心感动了，他自愿做我的知己有什么不好呢？他是值得信赖的！

"要想听这件事吗？"我和他对面坐着，各自靠着墙，以便坐得更舒服些。他专注地望着我，象准备听教授讲什么大课似的。我慢慢地讲下去。

二 往　　事(一)

——日记

日记……

蠢笨的我，是怎样把哥哥交给我的日记连同我自己的一起弄丢了啊！等于是我出卖了他！我痛心地回想着……

那是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午，我在屋里坐着，忽听哥哥在他的小屋门口招呼："罗锦！"

我立即走进他的小屋，看到他的眼神十分不寻常，仿佛决定了一件什么大事似的。我不由得有些紧张起来。

"现在抄家风大兴，"哥哥站在桌边，严肃地望着我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决定把这些可以不必保留的日记、文稿、信件，笔记全部烧掉。你如果也有可以不必保留的日记，最好也烧掉。在烧它们之前，我真希望有个人能了解我！想来想去只有你。现在你就坐这儿看吧，看完我就把它们烧了。"

我只有用沉默来回答，心情象死神般可怕——日记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啊！

"但是这本日记，"他拿起一本放在桌上的蓝皮《北京日记》，又说道："里面记的是我近一年来的思想，这段思想，在我一生中是比较成熟的，是值得纪念的，无论如何我也舍不得烧了它。你能帮我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吗？过了这阵抄家风就拿回来？"

“能！”我不加思索，双手接了过来，把它搂在胸前。他注目地望着我，似乎完全相信了。

“看吧。”说罢他背着手站在关闭的门前，向玻璃外的天空望去。我默默地走到小床边，床上那一摞摞的日记、文稿、信件、读书笔记，似乎都在哀泣地望着我；只要我说出一句“看完了”，它们便将被葬入火海。

从哥哥入队的第一篇日记到他成年后的征路，象画展一样呈现在我面前。哥哥的性格象快速电影般在我脑海里掠过……

还记得呼拉拉的队旗在瓦蓝的天空下飘拂着哥哥的脸，站在旗手旁边的他，右手紧并的四指用力得几乎象要弯过去，神圣庄严地对向他授红领巾的王老师敬第一个少先队礼吗？

还记得三反运动中，他英勇地检举父母亲无理开除手指被机器轧掉的工人严叔叔，因而受到团市委的表扬，开了全校的表扬大会吗？

还记得小学毕业典礼那天，他做为毕业班代表第一个上台发言，那清脆动情的话语，深撼着每一个人的心吗？

还记得他十二岁上初一时就写了入团申请书，学习成绩一直优异，他在五六年劝父母亲交出自己的全部房产，却在入团申请书里对此从未表白过吗？

还记得五七年父母成为右派后，他的操行连年得“中”，仍坚持不懈地争取入团，并且也多次鼓励我入团吗？

还记得从高一起这小屋的灯光就每天亮到深夜，他夜

以继日地苦读各种书籍——文、哲、史、地……使自己的大脑成为一个丰富的贮存器，以便寻求颠扑不破的真理吗？

还记得他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又将全部心力投入到学习中，为取得优异的高考成绩、为考上地质学院勘探系，而每天清晨顽强地锻炼身体吗？

还记得高考连最末一个志愿也未被录取，他毅然报名去农村当农民，六二年夏天他又一次考大学，得到的是又一次打击吗？

还记得他写的短篇小说与评论在《北京晚报》和《大众电影》上发表，歌颂焦裕禄光辉事迹的梅花大鼓词在北京曲艺团上演；而后在文革初期，他又怎样大无畏地写文章抨击姚文元，揭露这个跳梁小丑吗？

还记得他坎坷的经历——无论是当农民，还是当临时工——街道服务站的接送传呼电话员、首都图书馆和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的资料管理员、小学代课教师，以及后来人民机器厂的工人，他工作得都认真、出色；而这些丰富的经历不正是构成了他现在写的《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后改名《出身论》）中的灵魂吗？

……哥哥，可爱可敬的哥哥！

这些剖心挖腹的日记，这些大胆率直的文稿，这些与朋友互勉的信件，难道都不能活过今天？这不是日记和信件，这是青春的诗篇和生命的火焰！那一天，我才知道哥哥是怎样记日记的呀！一个何等敢于解剖自己的人！

从他高中时代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起，从他认

为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事物唯一正确的思想指南起，他就开始每天思过——把一天中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言行都无情地写在日记本上加以鞭挞，每星期小结、每月中结、每年大结。他的勤俭朴素、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对人宽对己严、敢于向不正确的言行做斗争以及待人处世的方法，都是有意识地严格要求自己才做出的啊！只要是他胡涂的，他就要通过书本或实践的渠道把它弄清；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坚持，持之以恒——而对与错，都有一个正确的标尺去衡量——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和人民的利益。

许多人也相信唯物辩证法，但唯独缺乏解剖自己、战胜另一个“私我”的勇气。他们不敢首先拿自己开刀，总是拿别人开刀。而哥哥正是以战胜“私我”为己任、为幸福！如果每个人都能象哥哥那样，这世界该多光明！该减少多少虚伪、欺骗和软弱！

我一篇篇翻着它们，屋里只听见轻微的沙沙声。每一响、每一翻，都使我的心缩紧——又一个小小的生命、又一段活的历史被推向死神。我多想跪下替它们向哥哥求情啊！而哥哥仍立在门前，背着手，一动不动地向天空凝望。他在想着什么？我悄悄抬起了头，难过地望着他——森冷的小屋再冷，冷不过他的目光。这灰白惨淡的色调、这雕象般的姿势……隔壁院子里，红卫兵正在抄家。打、砸和怒骂声，受难者的哭泣、哀嚎声，混成一片，清晰地传进耳中。透过后窗的玻璃，可以望见邻院烧东西冒过墙头的青烟！是的，思想是要被铲除的，躯壳是要被凌辱的，还有什么属于人们

自己呢？

当天晚上，母亲就没回来，与厂里的黑七类一起被扣在厂内受群众专政了。第二天一早，我把哥哥托付给我的那本日记夹在我的二十本日记当中，放在一个花布书包里，跑遍了所有与我要好的同学的家——家家都在烧东西，胆战心惊。所见的人无不这样问我：

“怎么，你还不快烧了它？这时候你还穿裙子？”

谁也不敢藏它们，而且对我居然还要保留它们感到吃惊。我走得精疲力尽，心想，藏在公园的哪块石头底下或石洞里？然而公园全让大字报糊严了大门，好多天以前就禁止开放了。怎么办呢？我走到文化宫前面，很想上厕所，就进去了。厕所里静得出奇，又干净又敞亮。以前我到公园画写生画时常到这厕所来，对面一排排的门关着，永远用绳索穿着不用。这次仍是那样，白白的高油漆门，静静地就象一排卫兵。我忽然心里一动，心想日记拿回家太危险，说不定今晚就抄家呢！不如放在对面的门里，明天一早我再想办法另行安置。对！只好这么办！一看左右没人，我便把这一书包日记从那干净的白瓷砖地上塞了进去。弯下腰看看，一点儿也看不见，心想只存放一夜不会有什么问题，总比家里安全哪。又看看窗外，见一个人也没有，才洗洗手，放心地走了。

第二天天还没大亮，全城就戒严了。原来这天上午毛主席要接见百万红卫兵。连自行车也不能随便通行，糟糕！

我忐忑不安……下午两点钟才开始通车，我赶到那里一看，不由楞住了——两排的门大开，书包早已没了踪影。干净的地面现在尽是痰、纸屑和污脏的杂乱的脚印，一个工作人员正进来打扫卫生。我不安地向她打听书包的下落，她只掠了我一眼，便耷着眼皮，阴沉沉地说："没看见。"此外再问不出一句话来。

我怀疑地离开了她，又去问在外面扫地的那位女同志。给我的回答是同样的表情、同样的腔调："没看见。"

完了，全完了！

我是怎样懊悔，怎样愧恨，怎样骂自己啊！我个人的日记丢了倒是小事——随它去吧。然而哥哥的呢？我是怎样辜负了他的委托！前天我看了他那么多日记，唯独这本没有看，因为他没叫我看。谁知里边他记了什么呢？他比我有思想，万一有"犯上"的话，这不等于我出卖了他？我，蠢笨的我呀！世上还有比我更蠢笨的人吗？我不知道是怎样走回家去的，简直不是在走，而是在飘。没心思去上班，更无心思吃饭，只是坐在大木板床上对着墙角抹眼泪。我从来没信过上帝，此时心里却在痛心地祈祷——保佑保佑吧，千万别叫哥哥出事！……

父亲责备道："愚蠢哪，愚蠢！还有比你更蠢的吗？怎么能藏在那个地方？唉唉！"

我哭啊哭，虽然知道一点儿用也没有，仍只想哭……可是又藏哪儿好呢？搁顶会被捅破，墙壁会被凿穿。埋地里？小院里五家，万一被谁听见，看见？街道积极分子的孩子整

天在这院里玩……或许，哥哥藏了半天也没地方藏才交给我的吧！唉唉，我是怎样辜负了他啊！

哥哥下了班听到这噩耗，先是一愣，再没有说一句话。父亲问他：

“你记了什么犯歹的话没有？”

他发呆地回答：“对陈伯达、姚文元有些看法。”

“蠢哪蠢！”父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还有比你更蠢的吗？罗克呀，你也是，不早烧了，还偏偏交给这蠢丫头？”

我惭愧得头都不敢抬起来，痛心地流着眼泪。哥哥却很快恢复了常态，只说了一句：

“小妹妹，我不怪你。”说罢便走进他的小屋。

这句宽宏大量的爱语如何能使我忘怀！一直到死，我也会觉得对不起哥哥！我辜负了他的重托啊！

我对不起哥哥！我对不起他的不独是这件事，还有自己的软弱——下跪，我被迫地违心地下跪过！

三　往　　事（二）

——抄家

那是丢失日记的第二天。天出奇的闷热，一丝风也没有。西下的夕阳在迅速聚拢的阴云中，显得不可捉摸。下班的自行车铃乱响，汽车载满了人在飞驰，马路一下子象窄了许多。我下班骑车忙往家赶，生怕会淋到暴雨。

刚进家门，哥哥也刚从工厂下班回家。两个弟弟由于

属于“黑七类”子女，不准革命，一直在家待着。姥姥在二姨家养病，母亲已被扣在工厂一个星期了。爸爸正要摆晚饭，院里的一个小孩呼哧带喘地跑来说：

“大爷！大妈让好些红卫兵押着，都走到钱粮胡同了，大妈还剃了头发呢！”说完跑了。

一家人全愣住了。

“快走，孩子们！”爸爸迫不及待地道：“我一个人顶着，快走吧，早知有这一天！”

在院里吃饭的三家邻居吓得急忙把饭桌搬进了屋。有两家在前几天已被红卫兵轰回老家去了。

“爸爸，”哥哥迅速地拿起米黄色的风雨衣，说道：“我上国务院看大字报去，尽量晚点儿回来。”说毕头也不回地推车走了。

“爸爸，我到学校去住。”大弟也急忙走了。

“我也到学校去。”小弟也做出了决定。

“多拿件衣服！”爸爸慌慌地递给他一件旧上衣。

“你还不快走？”爸爸跺着脚催我。

我抓起墙上的小提琴，就跑了出去。

在胡同口我追上了小弟。噼啪的大雨点不客气地掉在我们脸上。

“快跑！”我一把拽住他的衣袖，三脚两步一口气逃进了马路对面的邮局。

大雨倾泻下来，玻璃窗流淌着不尽的泪水。我们隔着玻璃向外张望，暴雨中，偶尔有辆寻找避雨处的骑车人慌忙

窜过。不少人躲在商店的房檐下，邮局里的人多了起来。

白花花的雨雾齐边齐沿、遮天盖地而来，一切沉浸在怒吼的雨声中……雨水大合唱好象天公发泄出的无比愤怒。马路上的母亲正被天公的泪水无情地浇着呵！

究竟我们犯了什么罪呢，有家不能归？只因为出身！……从门外刮进来的冷风吹着我的裙子，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我瞥瞥身边的小弟，他正呆望着窗外，一言不发……

雨声渐渐小了，陆续的推门声打断了我的沉思。自行车铃又在街上催命般地响了起来。邮局的灯光亮得刺眼，而门外却是一片清新、深蓝的夜空。

我和弟弟站在邮局前面的空地上。天上仍淅淅沥沥地掉着最后几个雨点。我深深地吸了口凉气——深蓝而澄澈的夜呵！

繁星神秘、淘气地眨着眼睛，仿佛因人们不去探索它们的秘密却自相残杀而幸灾乐祸地挤着怪眼儿。唉！我们不约而同地朝小胡同口望了一眼，那儿并没有什么奇迹，行人们依旧平静淡漠地你来我往，好象这世界并没有什么奇特的、痛苦的事情发生。

"姐姐，咱们走吧。"

"嗯。"

是呀，老站在这儿也会引起别人注意的。我们向前面的十字路口走去。

"你去学校，行吗？"我问道。

"行。这几天，尽有被抄家的同学在那儿过夜。"

"睡在哪儿？"

"就睡在课桌上。"

"不冷吗？"其实这话问得多余。

"他们说，不太冷。有带毛巾被的，大概他们能给我盖一点儿。还有爸爸给我的这件破褂子呢。"

我难过地叹了口气。

"姐姐，昨天红卫兵的头儿说，每个学校都要组织黑七类子女学习班，我们学校也快了。你们工厂没有吧？"

"也许，以后会有吧。"

"今晚你到哪儿过夜呢？"

我不由停了脚步，思索着。真的，上哪儿去？

"我看，上二姨家去吧，两个多月了，也不知道姥姥的病怎么样。"我决定道。

"那儿行吗？"

"姨父他们有什么问题？"

"嗯，那也好。"

在十字路口，我望着抱着一小团衣服的弟弟过了马路，消失在黑夜中。

旧黑漆门虚掩着。

我轻轻推开门，蹑脚儿走了进去。寂静的小院里，二姨家的窗帘透着淡黄色的灯光。我屏住呼吸在玻璃外静听了几秒钟，只听见二姨剧烈的喘咳声和姨父那闷闷的长叹。

我小心地敲敲门上的玻璃。

"谁呀？"

窗帘的下角掀起一小块，露出姨父一只惊疑不定的眼。

"我。"

"噢，是罗锦？快进来！"

门开了一半，我挤了进去。姨父随手关严了门。

我向她们打了招呼——二姨和姥姥坐在床上，二姨喘咳得紫胀着脸，面色蜡黄的姥姥正心疼地给她轻轻拍背呢。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姨父站在屋中央，拧着两道淡淡的细眉，狐疑地望着我。这惊恐的神情真使我失望——那一向大说大笑的爽朗的姨父让鬼捉去了？

"我来看看姥姥的病，"我假装轻松地说："怎么，二姨的老病又犯了？"

我把小提琴竖在墙边，坐在凳上。

"这小提琴？……"姨父仍疑惑地站在那里，审视地端详着我的脸："不是家里出事啦？"

"出什么事呀？我刚才到同学家练琴，路过来看看。"

"那……你还没有吃饭？"姨父仍不太相信，用这话试探。

"吃的可饱了！"我拍了拍肚子说。

"噢……"他仍拧着眉头，思量地走到桌边，半信半疑地坐下来。吧嗒一口将灭的烟，窃窃地问我道"你妈怎么样？

还上班吗？”

“嗯，上班。”

“没抄家？”

“没有。”

“提防着点儿吧，早晚得来一次。我这儿已经抄过一回了。”

“您家？”我惊愕地望了屋子一眼，才发现比以前零乱得多：“您家有什么问题？”

姨父并不立即回答，只是叹气。

二姨一阵阵咳嗽，姥姥一面给她捶背，一面东一句西一句地问着家里的事，我只好尽量往好里说。

“别提喽，孩子！”姨父磕了磕烟斗，凄苦地摇摇头，“你可不知道我和你二姨受的这份罪哟！”他站起身，拿起挂在门边的一件旧蓝布上衣，凑到我眼皮下：“瞧瞧。”

上面缝着一块长方形黑布，用白线分明绣着：“黑五类老婆”。

“您？”我惊讶地望着他。

他长叹一声，感慨万千地把那衣服挂回原处。

“全因为我做过半年交通警哟！”

“您不是拉了好多年洋车吗？怎么又做过交通警？”

“你哪儿知道！唉！那时候我生活没着落，不得已当了半年交通警。半年后赶上裁人，又给裁下来了。没办法，只好去拉洋车。后来找了个会计的差事，一直干到如今。没想到这半年交通警就成了事儿喽！咱不明白，解放前马路上

就不需要维持秩序、少出车祸啦？这理上哪儿讲去？再说，解放后哪一次运动我不主动交代个底儿吊？这会儿可好，成了阶级敌人啦！天天陪着当权派挨斗！给我调到锻工车间去打铁，这不说，多苦咱也能忍着。可你二姨招谁惹谁啦？老老实实的一个家庭妇女，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养病还养不过来呢，这回也成了黑五类老婆，天不亮就去扫街。你看病得这个样儿！扫不好就挨打！唉！咱这是招谁惹谁啦？"

……就这样，我离开了姨父家——我能再给他们的苦难增添惊恐和不安吗？

步出虚掩的门，我深深地叹了口气。漆黑的夜色中清楚地听到自己肚子的咕噜声。耳边还响着姨父送别时的嘱咐：

"这年头儿少来往吧，孩子！还穿裙子？还拉小提琴？我的二胡都叫他们给砸啦！"……

夜里的风真冷呵，冷得想打哆嗦。裙子又和凉风一伙，淘气地掀拂我的腿。我把琴夹在腋下，缩着肩，双手抱着臂弯，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家走去……

最揪心的是我和哥哥的日记！这时，我的一书包日记已经放在我们厂保卫科，哥哥那本日记也已转送到他的工厂去了……蠢笨的我呀！

黑黝黝的小胡同象魔鬼似地出现在面前，我紧张地提起琴，惴惴不安地走去。

突然，一个人头在墙后一缩。不好！我转身就跑，只听

背后大喝道：

“抓住她，别让她跑了！”

大叫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远处一两个行人慌忙窜到阴影里。几只大手将我紧紧掐住：

“狗崽子！还想跑？老子等了你们半天了！走！”

小提琴早不知去向。他们反拧起我的双臂，推搡着向家里走去。

小小的四合院各屋都熄了灯，但人们决不可能睡着。只有我家的屋门大敞，日光灯亮得刺眼。带路的妈妈一定又被押回去了，乱七八糟的破烂拖到了门边，爸爸正跪在破烂堆上，秃顶的头在日光灯下闪闪发亮。

红卫兵将我猛地一推，喝一声：“打！”木枪、皮带便劈头盖脸地落下来，只听他们边打边吼：“跪下！”

“凭什么打人？”我挣扎地喊道。

“打的就是你这狗崽子！”

“就冲你这裙子也得打！”

“头上还别卡子？打！”

“跪不跪？！”

求生的念头第一次象刀一样刺进了我心里，我扑咚一声跪下了。

“低头！”他们仍不满意，狠狠地又抽打了几下。我连大气都不敢出。

“低头！”他们抽打着爸爸，爸爸低头一声不吭。

“狗崽子，知道自己有罪不知道？”

"知道。"

"什么罪?"他们反而问起我来。

"我妈是资本家,父母都是右派。"

"应不应当向人民低头认罪?"

"应当。"

"为什么穿裙子?违犯××号通令?"

"你们这一窝崽子跑哪儿去了?"又一个人问。他们边零碎地抽打,边吼叫着审问。

突然,门"豁啷"一声被推开了,屋里的人惊异地扭过头去——呵,深蓝的夜空衬托出哥哥那严厉、镇定、苍白的脸。他那锐利、冰冷的目光象闪电般直刺向惊愕的人群;那坚毅、紧闭的嘴角,正直的鼻梁,发着寒光的白玻璃镜片,直慑人们的心魄!

他站定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威严地望着他们。红卫兵们从呆滞中猛省过来,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但他铁塔般地立在那儿,刺人的目光使人发憷,竟没人敢拉他一把。

我跪在地上,胆怯、羞惭地向他望去——呵,在他那严峻冰冷的目光中,也有我和父亲给他的痛苦呵!我不敢看他,可是又不敢站起来。

"对于你们的革命行动,我十分欢迎!"未等他们开口,哥哥便果决地说道:"就是你们不来,我也要请你们来!但是——"

"你就是遇罗克?"

“但是十六条明文说过，报纸上也多次讲明：只许文斗，不许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

“你先跪下！”一位“勇士”照他的后脖梗猛拍一掌。

“你打人？”哥哥疾速地扭过头去，灼灼的目光紧逼着他，脸色煞白。那不可侵犯的凛然气度竟使那人缩回了手，悻悻地避开了哥哥的目光。

“我犯了什么罪？”哥哥那冷透骨髓的目光紧逼着面前的红卫兵。

“出身就是你的罪！”

“一个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一个人的道路却是完全可以选择的。请问，你们是如何看待家庭出身问题的呢？”哥哥朗朗地问道。

“我们拥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正在激烈地辩论着，门外又拥进一群红卫兵。

“遇罗克，走，厂子叫你去！”原来是哥哥工厂的。

“对，把这小子带走，找个地方说理去！”一个人上来就要扭哥哥的胳臂。

“慢着！”哥哥威严地喝了一声，甩开他们的手，一转身飒然走了出去。红卫兵们蜂拥地尾随着他，象一阵黄旋风刮出了门。

霎时，屋里静了、空了……很久，我和爸爸还歪坐在地上，向门口发愣……

啊，那就是哥哥站过的地方，仿佛他还坚定地立在那里，冰冷、严峻地扫视着一切……那灼灼逼人的目光，那坚

毅的嘴角，那正直的鼻梁，那镇定、无畏的面容，仿佛还在那儿发出夺目的光；那朗朗有力、清脆沉着的声音，好象还在那儿回荡。

他并不高大，但却须得仰视。而我，却跪着，老老实实地跪着！

不幸的人们屈辱地生存，理智的自省就是检验自己的最好的尺码！哥哥，我对不起你呵……

夜深了，我和爸爸仍没有一句话，无力地坐在地上，在羞愧、钦佩和屈辱中不能自拔。钟打两点，我们慢慢地站了起来，忍着身上的疼痛，缓缓地、默默地收拾着地上零乱的东西。

呵，当我想去漆黑的门外拿扫地帚时，我不敢、也不愿踩踏屋门口那小块地，那块放着光的地呵！我怕肮脏的鞋底玷污了它！当我跨过它的那一秒钟时，心里是怎样神奇地跳跃呵！我不愿扫它，生怕扫去它上面的光芒，我时时扭头望望它。

我们把破破烂烂在屋中央堆了一堆，就马马虎虎地躺下了。爸爸在杂乱的大床上腾了块地方，我就躺在那早已抢劫一空的大木箱上。只有穿衣镜没有被砸，幸存的原因是，父亲早就用一大篇语录将它严严地糊上了。假如事先也将我们用语录严严糊住，是否还会挨打呢？

静谧的月光洒在屋门口那小块地上，它显得更美了。我一动不动地望着它。这柔和的光线，仿佛把我带到了久远的、几千年前的世界。那时，该是个博爱的世界吧？……哥

哥的神魂在眼前飘荡，我配做他的妹妹吗？配吗？我为什么不敢象他那样？羞愧的眼泪在黑暗中大滴滴着，我尽力不做出一点声息来，任泪水随意向枕边流去……

柔和的月光抚照着窗棂，抚照着那块神奇的地面。这时的地面，似乎在向月光细细诉说着无限衷情……哥哥被押到什么地方去了？工厂的刑室还是地牢里？他会挨打吗？不，不会，他身上有的是正义的光，他们不敢触他。倒是母亲在地牢里会不会自杀？

想到两个弟弟，我的心紧缩了。在空荡教室的课桌上，躺着许多出身不好的孩子，他们背靠着背，蜷缩着身子以抵御那黑夜的寒冷……他们睡着了？做着什么梦？慈爱的月光照着他们，从他们的嘴角上似乎透出微微的甜意——或许，他们正在美好的幻想里驰骋？……

四　往　　事（三）

——教养

第二天，我就被厂里揪斗，成了处处被监视的阶级敌人。从二十多本日记中篩糠似地找出了六句话，成了“思想反动根深蒂固”。

哥哥和母亲分别被关在厂里，两个弟弟也进了学校办的“黑七类子女学习班”。

十二月二十一日，学校的几个同学将我扭送到市公安局，正值“砸烂公检法”，执掌公安局大权的是戴“政法公社”

红袖章的学生。公安局里乱得不行，不时有人被扭送进来。在"如果你们不收留遇罗锦，你们就是反革命！"的热烈激昂的口号声中，政法公社的人勉勉强强同意扣留我，立即将我送到半步桥拘留所。

三个月的监狱生活使我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又长了见识……

一共只审问过一次。

"这些日记是你写的吗？"审讯员递过几张二寸照片说："是就签字吧。"

我看了看这六张二寸照片——哪里有一点儿反动呢？既没攻击党的领导又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只不过对一些文艺、对破四旧和红卫兵有些看法，只觉得林彪长得有点象奸臣，就思想反动啦？而那无数奋发学习想为人民有所贡献的话一概不算啦？

当我站在地上听审讯员高声念我的思想罪状时，我惊奇地茫然地望着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是我吗？那是强加给我的！我已经配戴上这么多反动的高帽了？当一个敌人这么容易？太容易了！所有的只是烧没烧日记的问题！每个中国人都有我这些思想，那么，党所领导的人民全是她的敌人吗？敌人！从这一分钟起，我已经被正式宣布为这个社会的敌人了！我已经没有生活的自由，只有被专政的自由了！教养三年？三年！我心里一沉。只因为我没烧掉日记，就要付出三年的代价，受三年的苦！漫长的三年哪，三年以后还不知是什么样子。这时，我真后悔没烧掉

日记，可是已经晚了。

“若不服，十天内可以上诉。”审讯员最后说。

我什么也没说，就签了字。

小汽车在奔驰，不知要把我解到哪里去。我既没戴手铐也没戴脚镣——劳动教养是人民内部处分。

我不明白，如果说五七年的右派多少是因为自己“说出了一些看法”，起了点“宣传作用”（交心也姑且算为“宣传”吧），那么记日记又起了什么作用呢？一个人的日记除了自己，外人没有任何权利看。日记里的话只不过是自己一时的思想，并不见得是永久的思想，没有任何行动，危害了谁呢？哪一个记日记的人不是为了认真地做人更好地鞭策自己前进才记日记的呢？算了，这些道理没有地方可讲！上诉？可笑！这点经验我倒有——五七年的右派，凡是认罪态度不好的，才去教养，再不好，还可以判刑呢！我十一岁、哥哥十五岁就已经知道这条经验了！

一想到有多少人比我还冤枉——那些解放前为祖国出生入死战斗过的老将也一个个被揪斗、弄死，我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我算什么呢？比起他们，我还不太冤枉呢！三年很快会过去的，我应当看到好的一面——我将要去的新天地是什么样子？我应当去领略领略，只当是锻炼自己的一个机会吧。

汽车把我送到了京郊良乡收容所。这儿都是因男女关系问题被拘役的女犯，大多数三十多岁，结过婚。拘役是刑事处分中最轻的一种，短期一个月，长的半年。

回想教养三年，我认为是上了一次大学，难得的认识社会的场所，而良乡是我的第一课，在这儿我待了一年。

这期间，有两个人来审问过我一次：

“你哥哥平时和你谈过什么？对你的反动思想有什么影响？”

“我哥哥思想进步，对我帮助最大！”

“都说过什么？”

“他经常鼓励我入团，让我和剥削思想划清界线。”

“嗯？”

“他苦读马列著作，坚信共产主义。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除了这几句话，我再也不想回答他们任何问题。我的态度使两个审讯员大为恼火。

“有你的好处！”他们威胁说，结束了审问。

即使加刑，我也无法不这样说，因为是事实。

一年后，一列火车载着我，将我押送到茶淀站清河农场。

……傍晚收工后，又一次突然袭击式的搜查终于过去了。三位队长回来宣布，“反动”组的十几个人可以回“号”里去了。

专政机关的宿舍一律称为“号”，这一点，劳动教养和判刑并没有区别。

几个人住的“号”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刚才搜查时，队长

们已将各人箱子的钥匙从每人手里拿了去。此时，每个人箱子的锁上都还挂着自己的钥匙。有的箱子半开着，露出里面的衣服，有的已离开了原来放的位置。被褥和衣服全被抖开了，乱糟糟地堆在各人的铺位上。人们不出声地默默地收拾着，彼此沉闷的心情自不必说。也许，只因为组里十三个人有十个是五七年的右派，而我又是因为写“反动日记”，所以，才容易遭到袭击式的搜查吧？

“糟糕，”睡在我旁边的那位被教养了十二年的右派——原《北京日报》记者，忧心忡忡地嘀咕道：“我的日记不见了。”

“你怎么不放好？”我心里说，你怎么在这儿还记日记？

“我藏在褥子里，多次都躲过去了。”她叹了口气。

果然，她褥子的一头已拆了个口。

“奇怪……队长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我悄声问道。

“肯定是有人汇报了。”

她只是坐在炕沿上发愣。

“有什么忌讳的话么？”我极轻地又问。

“忌讳的话是不敢写的，反正情调够灰的……唉！”

是呵，假如从中又发现了她的哪怕一句“反动”话，都对她不利。我虽然同情她，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瞟了瞟铺位下面那从不烧火的炕口，那烧炕口里塞着我的两双旧鞋，而鞋的灰土下面却埋着我的小本呀。显然，鞋子已动过了，可是小本呢？但此时，我决不能当着任

何人去查看，假如叫别人汇报了去，就该没啦。

我瞥了一眼安插在反动组里的两位流氓，别瞧她们是流氓，可比我们强——期满以后准是划为人民内部矛盾。流氓、小偷都是“铁杆内矛”，而我们这些“反动”，最好的划为“二类”，即永远成不了人民，也就永远可以作为敌人来斗——这划类（共三类）也是文革中新兴的呢！

呵，我多想伸手到烧炕口里摸一摸，看看我的小本在不在呵！我又悄悄朝那儿望了一眼，炕口外面干干净净，并没有抖出灰土的痕迹，小本没被发现？我反常地盼望着快响熄灯铃！

人们忙着吃晚饭、分热水、洗脚、上厕所，然后学习，点名——在寒冷的北风怒吼的院子里，全教养所的人一齐背诵“老三篇”，高贼“敬祝……无疆”和“永远……健康”之类的圣经。语录歌唱了一遍又一遍。这些语录歌，哪有一点歌曲的味道呢！我真希望五十年后我们的子孙也能有耳福听听这些语录歌的唱片。听听他们对历史的评价吧。

一直到队长大赦般地终于说了声“解散”。大家早已冻得手脚冰凉，急忙跑回各屋铺被睡觉。熄灯铃震耳地响了，趁着刚一熄灯那黑暗的刹那，我迅速地把炕口里的棉鞋拿出了一双，好象我明天要穿它似的，用谁也不觉察的动作，疾速、准确地伸手到那松松的灰土下面——呵，那用塑料袋包着的小本依然完好地存在！我的心惊喜得跳了起来……

钻进冷得象冰块一般的被窝，扭头看了看睡在左边的记者，每次我看她都不禁哑然失笑——她总是直挺挺地面

朝上躺着，两层棉被和棉衣服压得象要翻不动身那么厚，她戴着教养所普遍做的最挡风的"尼姑式"的棉帽子，戴着双层口罩，冻得灰白的脸遮得严严的，一动不动，活象个死人。她的丈夫也是右派，被关在另一个分场。一个孩子在北京，和他奶奶过着经济、精神双重苦难的生活。

这位记者解放前就为革命出生入死地工作，十五岁就入了共产党，工作一直优秀。只因五七年向党交心时，她爱人说了几句话，由于出身地主，遂定为右派，她和爱人"划不清界线"，便也成了右派。由于不认错，夫妇两个都被送进专政机关，孩子和没有工作的婆婆在北京靠派出所发给的补助费（九元）生活。他们可谓"大"右派了，父母受的罪，比起他们，又算得什么呢？这些右派里，大多是很有知识的机关干部。

想着我的小本，好一会儿不能睡着。想到每当拿、放小本时竟巧妙地躲过了屋里所有人的眼睛，这是怎样的细心和胜利呵！想到我利用每天早上的学习时间，用书本挡着，记下哥哥从小到大的一点一滴的言行，相信总有一天能发表回忆他的文章，心里是何等的自信和自豪！

是的，无论他活着还是死去，人们都会称他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子。哥哥与年轻的共和国一起成长，他是公开地向残害中华民族的"左"倾路线挑战的先锋战士！是思想解放的先驱，是中国青年的楷模！

也许，我没烧掉日记是愚蠢的行为，然而，我更看到好的一面。难道那些日记不是一叶小舟吗？谁能想到竟有这

么便宜的事——不用费任何力气就凭着这"宪法保护"的小舟进到专政机关遨游来了呢？如果我将来写一本书，生动地写下专政机关一天的生活，没有这段经历怎能写得出来？实在话，这个地方，哪怕你是最有名气的一流作家也不会被允许到这儿来体验生活的。而没有进过专政机关的人就不能说全面地了解社会。这里，是社会上各种人物的集中地，而且都是典型人物。这里是丑与美、恶与善、假与真的最集中、最高度、最尖锐的表现场所。社会上的一切阴暗面在这儿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平常，但有些刑事犯所犯的罪，简直连听也没听说过，初次听时常使我惊异得说不出话来。

回想自己的过去，觉得单纯得多么可笑！那时我除了知道我一家、我的几个同学，还知道有谁呢？世界在我眼里一片光明美好，如何想象得出还有许多说不出名堂的犯罪勾当！如今，我不但认识了生活，认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锻炼了自己。在劳动上，我从一个怕苦怕累的娇气的小姑娘，锻炼成为一员猛将。两年来，我是全组的劳动组长，我干得很起劲，只因为我有意识地想磨练自己，从劳动中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大自然是不承认我们是罪犯的。我们挖养鱼池、打冻方、种水稻、果园、菜园……都干过。我们向自然索取，同时也享受到大自然给我们的无限快慰——每当日出、日落，云千变万化时，每当四季的色彩绚烂地呈现在眼前时，我心里就多么欢快，感到说不出的美呵！我记下了许多风景速写，准备有一天能寄给哥哥，让他高兴……

最可笑的是，我们虽与男队没有接触的机会，一些人竟想方设法给我们递条子。我也接到两封信，表示愿意和我做朋友，即将来的爱人。这两个人都是出身红五类的打砸抢分子，“八·一八”的老红卫兵，只因打死人太多，被篡党夺权者利用够了而又被专政的。且不说这样的信看了只能使人轻蔑地一笑，单就这事本身来说，还不足以讽刺反动的血统论么？

当我六九年十二月教养期满时，上边开始兴“划类”一说。我虽表现挺好，却被划为“二类”，理由是：“不能大义灭亲，有些问题未交代清。”那时哥哥已被捕将近一年。

“我真不敢相信，”讲到这里，维盈用那含蓄、深切的目光望着我画的风景速写，抬起头对我说：“这是你在那儿写的、画的……这些画儿，多有意思呵！”他久久地注视着它们。

“如果不是墨迹和纸的变色，你可能真的不信呢。那么，依你看来，一个人在那种环境下，就应当整天哭丧着脸吗？可惜，我天生的不会。在六六年十二月进监狱的第一天，看守拿了两个馒头和一碗肉白菜汤，我都吃光，倒下便呼呼睡着了。第二天她们才发现给错了饭——她们原以为我也是打死人的高干子弟呢！可是吃窝头我也觉得挺香。在农场，我一看到那些美丽的风景，就觉得我还活着，还有对生活的向往……那儿，确实很美，挨近渤海，天碧蓝、干净，空气好，云也美，我记下画下它们，自己觉得是享受。一方面，总想把它给哥哥寄去，假如他判了刑，见到我这些朝

气蓬勃的画，该多高兴呵！最有趣的是，有一次突然袭击搜查，队长把我的画全搜走了，我心疼得什么似的，以为再也拿不回来了，没想到队长什么也没说，一张不拉地又给了我。可见她也是有人心的呀。”

“我想……”维盈也笑了。他爱慕地说：“我拿回去抄下来可以吗？我实在太喜欢了。”

“当然可以。让我接着给你讲吧。”

五 往　　事（四）

——探亲

火车在飞驰，三年的劳动教养生活结束了。车轮那隆隆的节奏声使我心里说不出是喜还是悲。

车窗外一片严冬的景象，广阔的平原白一块、褐一块，田野光秃秃的，没有一丝生气，一座座灰色的村落向车后闪去，七〇年——又是一个冻结的冬天！

回家了，回家了，我多想家、多想哥哥呵！我盼着，盼望早一分钟到家——那三年来搬了不止一次的家！

……这儿，就是我的家？

我看看手里的信封，再对对门上的号码，心怦怦地跳了。左右没人，楼道里好静呵。我正要敲门，又侧耳听听，万一能听到门里亲人的声音呢？谁知这紧闭的门后面是痛苦还是欢乐？

"咚咚咚"，伴着心跳，我敲出了这决定一切的声音。

门静静地开了条缝，忽又停住，一点儿也看不清门后是谁。只恍惚看见黑暗中的一只眼睛，只见这只眼睛越睁越大，随着门缝的猛然敞开，迸进我耳中的是惊喜的一声：

"姐姐！"

我一脚跨进门去，大弟随手关上了门。

"爸爸，我姐姐回来了！"在黑暗的过道里，大弟激动地挤过我身边，向那有亮光的半敞着门的屋子嚷道。

望着屋里的这位老人，我不由愣住了。难道，这瞪着混浊的眼睛、衰老不堪、惊疑地望着我的就是爸爸吗？

"爸爸！"我心酸地叫着，连小弟叫我都没听见。

父亲半信半疑地望着我，惊异地瞪大了眼睛，两只手还拿着烙饼用的擀面杖和切菜刀，突然哇地一声，哭着瘫坐在地上了。

"爸爸！"

"爸爸！"

我和两个弟弟吓了一跳，慌忙去搀扶他。但他悲号着，凄楚地摇摇头：

"让我哭个痛快吧……"

纵横的老泪在他那满是皱纹的脸上奔流，这突然的举止，把我三年来思家的心绪都吓跑了，我们终于将他搀扶到椅子上。我奔向姥姥的床前，她病得奄奄一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好半天认出我，只是悲哀无力地向我点点头，便微闭了眼睛。

"孩子，你回来也不说一声儿……"父亲不住地擦着眼泪。

"姐姐，"弟弟们又喜又怨地道："你怎么不事先来封信或打个电报呢？"

"高兴得顾不得了，你知道，期满就业的人有多少都没回过家呢！批了我假，乐得什么都忘了。"

"批了你几天假？"

"十天、十天呢！后天就是春节啦！"

我掏出农场开的证明，放在桌上。如果不是因姥姥病重，农场怎么能批呢？

"唉！"父亲叹道："一场梦啊！……"

"我妈好吗？她还没下班？"

"快了，姐姐，要是一会儿妈回来，你千万先到南屋躲躲，不然——"

"知道了，我真后悔没事先告诉你们。"

"唉！"父亲仍不住地擦眼角的泪水："真是一场梦……"

"其实，"大弟愤愤地说："我姐姐日记里的话有什么不对？这些年搞的不是极左政策？文学艺术不是公式化、框框？红卫兵不是被人利用？要说我姐姐思想反动，那全国人民都该定为思想反动了！"

"小点儿声吧！"父亲叮咛道。

"姐姐，农场里的生活怎么样？苦吗？"

"一言难尽！哥哥怎么样了？哥哥？"

三年来，我最想问的就是这句话。

"我真担心哪……"父亲眨巴着发红的眼睛，咽了口唾沫："唉！上一批到体育场判决，不知为什么单把你哥哥拉走了……那批布告没有他。"父亲那直呆的目光凝视着地面，摇摇头说："唉！我一睡觉就梦见他……担心哪！……"

"拉体育场咱家看见了？"

"不让咱们家看，"大弟说道："我们俩头几天才从陕西回来的，前天批斗一批政治犯，就有哥哥，可是监视着咱们家不许出去。"

"这儿有一个和爸爸一块儿扫街的老头儿，"小弟接过来说："偷偷告诉爸爸，说他看见哥哥了，全都戴着手铐、脚镣、五花大绑，谁也喊不出声。他说哥哥的脸又黄又肿，两个警察使劲按着他，他硬不低头，一个劲儿往上挣、挣……"

好一阵谁也没有说话。只有那陈旧的老挂钟死板的滴嗒声伴着我们僵木的心。仿佛舌夹子在夹着我们自己的舌头，简直憋得透不过气来。

"担心哪……"父亲叹道。

我向屋里环视了一眼，除了一张破桌，两只旧木箱外，家里什么都没了。仅仅离别三年，家里就如此地破败和衰落，一点儿欢乐的迹象也找不到了。家抄了有无数回，抄的抄走，卖的卖掉，能够维持下来，就不知有多难呵！

爸爸磕了磕烟斗，迟缓地站起来接着去烙饼。他那脊背比以前更弯了，个子也象矮了一截。他慢腾腾地擀着面饼，忧郁地摇头叹气，我望着他这极大的变化，真有说不出的悲哀。

突然，隐隐地听到敲门声。

“是妈回来了！”两个弟弟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姐姐，快，快去南屋等着！”

我窜进南屋，急忙关紧门，将右耳紧贴在冰冷的门上——呵，这细碎、微快的脚步声是妈妈的！她那矫健的步伐，微微左右晃动的平展展的后背，似乎清晰地在我眼前晃动。这几年，母亲走过了多少艰辛的路程呵！自从五七年父亲被开除公职后，多少年，都是凭着母亲那快健的步履、那经得住摔打的身躯，为全家的生活操劳、奔波呵！我和哥哥又给她凭空添了多少罪名！呵，她老了吗？头发白了吗？精神还好吗？我多想早一分钟见到她！

一切又沉寂了，听不见动静，屋内的寒气不由使我打了个冷战。十冬腊月，这屋竟连个火炉也没有，只有一个自搭的木板床。北风在窗外呼号，寒冷的风撞着玻璃，发出尖锐的响声。我朝窗外望了一眼——奇怪，明明有位鼠样妇女的脸，正扒着玻璃向屋内窥望，见我看她，立即躲闪开了。

北屋为什么还没动静？我忍不住将门开了一条小缝，越开越大，只听飘来了惊异的一句：

“真的？罗锦回来了？在哪儿？”

我一个箭步就窜了出去，离开这冷酷的冰窖，奔向温暖亲爱之国——“妈！”

“孩子！”母亲辛酸地望着我，眼泪充满了眼眶，双手捂着脸哭了起来。她站在那儿抽嗒着，那茸茸的头发蹭着我的下巴，我只是傻傻地扶着她的臂肘，竟想不出任何话语来

安慰她……

晚上，两个弟弟到冰冷的南屋睡去了，我和爸爸、妈妈挤睡在一个木板床上。暗淡的银辉照着姥姥那惨白的面容，照着爸爸那做着不祥之梦的脸，照着妈妈那浮肿的闭着眼的面庞；孤寂的月光把天上的星星都吞没了……我睡不着。

"谁敢和我辩论？"

我仿佛又看见了三年前阴凄的一天，在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哥哥一蹦就跃上了工艺美术服务部门前的石阶，他那雄辩的口才把那些对立的和貌似折中的谬论驳斥得体无完肤。六七年一月，铅印的《中学文革报》为《出身论》而诞生了。今天听弟弟们说，每一期报纸人们抢购的情形真是难以形容呵！而哥哥写了六、七篇的雄文，每一期都登在《中学文革报》的第一版上。

"北京图书馆每期要十份，"罗文说，"他们保存着。"

"有一天人们一定会重新看到的。"……

我轻轻翻了个身，生怕发出响声弄醒将要睡着的母亲。母亲面向我躺着，象是睡着了。月光下，她那浮肿的面庞淡淡地发着青光，她那稀疏的、被剃过不止一次的短发茸茸的还没有长齐。她虽然纹丝不动，但我却相信她没有睡着，我睁眼望着她，往事又把我带到那可怕的一天……

在拿枪的红卫兵的监督下，我去给母亲送衣物。他们领我来到一片杂乱空旷的场地上，四周围着双层铁丝网。我

举目四顾，既无房子，又无人影。

"领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正暗自奇怪，忽然，天呐，从前面那块微凸的地里冒出个人来！那正是母亲！我的心猛跳着："妈！"

但使我惊恐的，不是母亲那死样的、灰白的脸和呲着的乱发，却是我从未见过的呆滞而没有生命的眼神、迟缓的脚步和怯怯无力的话语：

"孩子……我不要东西啦……你拿回去吧。我叫你来，是叫你把这表带回去……"她摘着腕上的手表。

我刚要去接，猛然省悟过来，急切地摇摇头，大声说道："妈，我不拿！您要坚强些，妈！刚才我去看哥哥，他在学习班精神挺好。他让我嘱咐您，一定要坚强！妈，不会总这样，以后会好的！您千万别寻短见呵！"

我说不下去了，咽了口唾沫，愤怒地扫了周围扛枪的人一眼，又嚷道："妈，一会儿我就上市委告状！您犯了什么法？他们凭什么这样对待您？"

"孩子……"母亲哭了，直到这时她才象有些知觉："看不见呀……地牢里伸手不见五指……又黑又潮……睡在两捆稻草上……看不见呀……手表，你还是带回去吧。"

"我不带，"我把表硬给她戴在手腕上，母亲只是低声悲泣着，听凭我的摆布。我把那几件衣服、毛巾被，一古脑儿全塞在母亲胸前，将她另一只胳膊弯过来，让她抱住它们。

"妈，别哭了，我这就去市委！"

我永远忘不了市委的办公室。大厅里人声鼎沸，告状

的“牛鬼蛇神”坐满一地，挤都挤不进去……其实，人们满怀希望而来，告了状又有什么用？而母亲却因“告状”这句话又挨了一场好斗！那以后，除了有病的姥姥，家里六口人各个都被专了政——我被教养，哥哥被捕，两个弟弟在学校被专政，妈被关在厂里，爸爸在街道被监督——竟有三个多月家里空无一人。

三年后的今天，除了哥哥，我们又团聚了。我想着哥哥那虚弱的身体怎样费力地向上挣、挣；决不低头的顽强的心，面对死亡仍不屈地奋斗着。呵，热泪在我心中滚流、滚流，我怎能睡着？——这是怎样的又一个不眠之夜呵！

“怎么？”

第二天中午，一位二十多岁的小警察坐在椅子上，跷起二郎腿，一手用力点着我的证明说道：“这就是你‘因事回京’的理由？你姥姥的病是多年的老病，算什么理由？这点理由就请十天假？你们三个都这时候回来，遇罗克在全市挨批斗，难道你们要回京劫狱吗？立刻回去！遇罗文、遇罗勉也必须回陕西农村去，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正说着，街道积极分子——那位鼠脸妇女大模大样走了进来，坐在床上听。她挑起眉，悠然地瞟了我们一眼，从烟盒里掏出两支过滤嘴烟，递给小警察一支。

“他们才回来四天呀！”母亲指了指走出屋去的两个弟弟，低声向警察辩解道：“同队的知识青年都回北京探亲了，他们连过冬的柴禾都没有，您叫他们回去怎么过冬呢？过了

春节吧。"

"春节？春节是给人民过的，不是给反革命过的！你们家的情况和别人不同！"小警察蛮横地说道："我不管怎么过冬，老乡们也没冻死嘛！回去，都必须回去！最迟不过后天上午！到时候我们来检查！不服从命令不要怪我们不客气！"

"瞧瞧你们这一家子，哪个不反动？"鼠脸妇女煞有介事地帮腔道："他们三个这时候回来什么意思？你们的儿女思想反动，与你们做家长的有直接关系！尤其是你，"她转脸向父亲训斥道，"长期以来没有正当职业，给你的儿女灌输什么思想？以至你儿子写了那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闹得满城风雨，传到全国各地！这个罪大恶极的政治犯，在狱中气焰极为嚣张，与你们做父母的有直接关系！后天下午街道开全体大会，你要在大会上好好检查对子女的影响问题，都灌输了什么？上次不深刻！这次再给你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你要深刻检查，一直到革命群众认为能过关为止！"

"听见了吗？"小警察再一次警告道："如果明天他们三个不走，后天下午你们全家五口一起上台接受群众批斗！"

没办法，决定明天晚上坐火车走。家里一个钱也没有，任何亲友都不再与我们来往了。母亲还欠着厂里的钱，月月只发半薪。我和弟弟们决定扒车。

次日中午，母亲临上中班，交给我一元钱道：

“孩子，没钱吃饭也得照张相，今天你们三个千万照好着点儿……”

“妈，您下了班，我们的火车已经开了……”

“唉！我不能送你们了，千万把相片照好着点儿。别送我，回去吧，免得街道积极分子又看见。”

母亲克制着心酸，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们冲出门，在楼梯那儿向下张望，管她什么鼠脸不鼠脸妇女！让她监视去吧，谁知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母亲！妈妈已走下楼梯，我们折转身来，奔到二楼的矮墙那儿目送她远去——呵，她那微微左右晃动的步伐，她那平展展的后背，她那稀疏的软发，隐藏着多少不幸！

晚饭后，天终于黑了下来。

“去吧，这时候行啦。”父亲郁闷地吸着烟，说道：“天黑了别人不容易看见。别一块儿出去，一个一个下楼，不然让那积极分子看见，麻烦又大了，连她孩子也学会了这一套。”

两个弟弟一先一后地走了，我望着老挂钟，等待着……那是多么难耐的五分钟呵，象有五年那么长……在老挂钟单调的滴嗒声和父亲沉郁的叹息里，我只感到没有生的权利的痛苦！我捏着手里的一元钱，象紧捏着虚伪和黑暗的脖子，我多想把这一元钱狠狠扯碎，掷向苦难的、阴暗的天空；我多想在天地间大声疾呼呵！

我们象“巴格达窃贼”一样先后溜下楼梯，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在粗大的电线杆子的阴影里，我们三个象“地下

党"一般聚会了，一起朝马路对面的照相馆走去。

一切行装都准备停当，三个破书包里各放着补丁布、水碗、一块肥皂和够吃三、四天的烙饼。

就要离开了，这日夜思念的、却一点儿也不快乐的家呵！

我和弟弟们坐在凳子上，望着爸爸，专注地听他翻来覆去的嘱咐：

"记住了吗？万一以后全家失散，千万记住每逢阳历一号和十五号，到各大街、各大路口、人多热闹的地方，看看有没有寻人启事，同时别忘了也贴上自己写的寻人启事。你哥哥的名字用'霞'代替，万一他有不幸……我，我就在信里写上'霞回老家去了'，记住了吗？"

他吃力地说出这句话，他真怕有一天会写这句话啊。因为我和弟弟每逢接到家信时，经常已被领导偷偷拆开，怎能不编个代号呢？

"记住了。"我们发呆地回答。

"千万把那些老朋友的地址保存好，什么都丢，这个也别丢。现在这些人虽都不和咱家来往，人家也准是倒了霉。可是一旦全家失散，也许能从他们那儿间接地知道咱家人的地址，记住了吗？"

"记住了。"

"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我给你们打电报，凡是下边的落名带姓，那内容的意思一定是反意的，一定是街道或公安局逼着我发的，或是不敢明说不得不用反意来告诉你们；如果

落名不带姓，那内容的意思就是正的，记住了吗？”

“记住了。”我们又一次专心地回答。仿佛父亲再嘱咐一百遍，我们也听不腻似的。

“要是人家轰你们下车，”父亲又叮嘱道：“可千万别跟人家犯态度呵。”

“我们都记住了，爸爸。”

“唉！走吧！”父亲难过地眨巴着眼睛。

姥姥昏睡着了。我们站在她的床边，握着、摸着她的手，心里向她道了别。

我们背上破书包，轻声地说道：“爸爸再见！”

大家有意将步子放轻，穿过黑暗的过道。

我们向楼梯走去，而爸爸就站在齐腰高的矮墙那儿，等着孩子们在楼下出现。

群楼挡住昏暗的路灯，楼下和楼上昏黑一片；四围的高楼象是魔鬼，威严地耸立在我们面前。

我们抬头望去，向俯身望着我们的爸爸挥手告别——只见他探着身子，一手扒着矮墙，一手扶着额上的眼镜，尽力目送我们远去……走了两步，我们又回头看看爸爸，他依旧是那个姿势，只是身子更向前探。我们三步一回头，再有一步将拐过楼去，前面就是灯火辉煌的大街。我故意走在弟弟们背后，最后望了爸爸一眼。啊，在那朦胧的光线里，在那昏黑的楼群中，父亲佝偻着身子，奋力向前探着，脊背弯弯地呈现出弧形，一手扒着墙头，一手扶着眼镜，那活生生的轮廓，那黑糊糊的色调，象一幅木刻一般，紧紧地扣住

了我的心弦！

三个年轻人象脱离了苦海，漫步在灯火辉煌的大街。穿着破旧的衣服，背着鼓囊囊的书包，大声说笑着、怅惘着、回忆着……就连提到受苦受难的哥哥，也是那么兴致勃勃、充满生气！仿佛这欢愉的心声，能顺着清新的夜空，飘到哥哥住的死牢！

"姐姐，马路上的行人奇怪地直看咱们。"弟弟好笑地说。

"让他们看去吧！"我挑战似地大声说："我们终于脱离了那沉闷的家，那苦海了！"

灯火辉煌，群星满天，天上的星河灿烂一片。我望着那瑰丽的西天，心里想道：看天上的这些星河，它们之中也有近似地球的怪事吗？它们也利用出身来压迫人吗？它们有到达共产主义的吗？那个社会是什么样儿？我多想坐着宇宙飞船去看看！……大块的浓云聚拢得象一只只黑色的天鹅，欲翱翔远去……我沉浸在幻想中，仿佛身体轻盈地升上了天空，溶到黑云里，变成了一只黑天鹅。我拍打着翅膀，一直朝死囚牢飞去……呵，那不是哥哥吗？被斗了一天的他，脸青肿着，血迹斑斑，戴着沉重的镣铐，象铁塔似地站在双层铁门前，正悲愤、渴望地向夜空凝视……我从天空俯冲下来，一把抓住铁条，用有力的嘴一根根啄断它们。

"快上来吧，哥哥！我要背着你，用巨大的黑色翅膀，和你飞到远远的天边，飞到没有压迫、永远自由的地方去！"

啊！我是多么神奇地把他救了出来！

讲到这儿，天已经黑了，维盈一动不动地望着我。那神态、那表情，好似全身都浸泡在忧戚和深情中；悲苦中含着温存，哀怨中藏着眷恋，看那神情，竟没有一点儿想走的意思。

我下了炕去开电灯，不巧，停电，只好点上了油灯。小油灯给屋子里蒙上了一层暖黄的、朦胧的轻纱，在这朦胧的光线里看维盈，他显得多美啊。

"这就是你们三个那天照的照片？"

他久久地低头凝视着手里的像片。那目光，不动地盯着照片上的一个人。我的心，羞涩和喜悦得微微跳了起来。一直到我把晚饭端上炕桌，他还在不动地凝眸注视着呢。

吃完饭，我说要歇会儿了，明天再讲。我留他睡在这儿，我去老乡家住。

我戴了头巾，穿上大衣，向老乡家——西边那距离五十米的"近邻"走去……夜色这么美，空气冷得爽人，此刻维盈在屋里做什么呢？回想着油灯的光线下，他脸部的动人的线条，啊，我多想有一天能把他画下来！

小小的油灯温柔地照吧，
照亮我朋友可爱的面庞；
让他象你一样幸福，
象你一样驱走忧伤。

小小的油灯慈爱地照吧，
照亮我朋友可爱的面庞；
不要让黑夜将他吞没，
愿温暖伴随着他的心房……

我随意作着即兴诗，不觉已到了徐大嫂家。

“吃了没？”

一进门，大嫂就招呼道。她正往灶炕里填柴禾，外屋充溢着一股酒肉的香气。

“怎么这时候还做饭？”我摘下头巾，问道。

“你大哥才从公社回来，进屋坐吧。”

她的丈夫老徐是我们大队的党支书，此时正盘腿坐在北炕上喝酒。炕桌上一大碗猪肉酸菜粉条腾腾地冒着热气，一盘切开的蛋黄通红的咸鸭蛋，另一盘是自家腌的咸菜。他正夹着一片猪肉往嘴里送，见我进来，笑吟吟地招呼道：

“吃了没有？再吃点？”

村西头的二宝也来串闲门，歪在炕上嗑瓜子。大嫂的三个孩子东一个、西一个地躺在炕上，已睡着了。

“开了几天会？”我问道。

“三天。今儿个才算完了。”老徐呷了口酒：“道儿真难走，雪厚的地方只能推着车，出了一脑袋汗。”

“晚上我得住你们这儿啦。”我不客气地笑道：“我家来

亲戚了。”

“嗯哪，”大嫂盘腿坐在南炕上纳鞋底，一边笑答：“你不嫌脏就住这儿吧。再来三口子也睡得下。今晚你和妞子就睡北炕上，行不？今天下晌北炕烧了一大锅猪食，还热着呢。”

“表叔，啥会开了三天？”二宝——这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和老徐沾点远亲的，此时捧过来一大捧瓜子，放在我身边的炕上，又依旧歪在北炕上嗑着。那瓜子皮利落飞快地从他嘴里吐出来。说真的，我和几个知识青年曾和此地人比赛过一次嗑瓜子，我们不得不甘拜下风呢。

“啥会？”老徐喝了口酒，抹抹嘴说：“第一天讲形势，由代理书记、咱公社武装部部长讲。又要搞运动啦，反对右倾翻案风。”

“怎么由他代理？”我问道，“吕书记呢？”

“一二把手都吓跑了咋的！”老徐叹了口气：“一个前天去了药泉山治病，约摸仨月也回不来；一个去哈尔滨疗养院请了长期病假。谁心里没数？这不是躲了？也难说，谁知道这运动又有多大？他俩刚走大字报就贴出来了，说是不打倒右倾翻案风决不收兵。看吧，又要有趁火打劫的了。”

“这年头的事真不好说，”二宝讥笑着，摇摇那因健康而红喷喷的圆脸：“六七年那俩书记受的罪可真够一呛！这好容易解放了，回了原职，谁不怕再有运动！”

“他们受了什么罪？”我好奇地问道。

“受了啥罪？”老徐下地盛了碗热楂子饭：“天天关土牢

里打得皮开肉绽，硬说他们是内人党！”

“内人党？”

“这内人党到底是咋回事，谁闹得清！”大嫂叹了口气。

“什么内人党外人党，”老徐瞥了她一眼：“想说你啥党就啥党罢了。大妹子，那会儿你们在北京没听说过？”

“没有。”

“咱这公社干部揪出了二十来个。”老徐大口地扒着饭：“说他们是内人党，那时我是大队副书记，也差点儿把我揪进去。谁见过那党是啥样儿？”

“全名是‘内蒙古人民党’吗？汉人怎么也能被扯上呢？”

“嗐！咱公社副书记不是朝鲜人吗？咱这儿不是达斡尔族自治旗吗？管你是不是蒙族人，反正你沾点儿少数民族的边，又想定你个罪名，不扯咋的！”

“这次反对右倾和内人党有啥关系？”二宝问道。

“那倒没说，可谁挡得住有人又想新账老账一齐算？要想说你右倾还不容易？要不俩书记咋吓跑了呢？”

二宝望着老徐那哭笑不得的神气，不由笑了。

“还说了啥？”

“今年再想种一万棵黄烟办不到啦。”老徐吃完饭，轻轻推开了碗，打了个饱嗝，拉过炕梢的烟笸箩，悠然地卷了根烟，划根火柴，点燃，香香地吸了一口：“去年秋天上边来咱省视察，批评说太落后，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阶级斗争的弦抓的不紧，社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松松懈懈。具

体地说，就是三多：自留地多，园田地多，分的粮多。今年要有限制。明天这些个都要在小队里传达。”

“咋限制个法？”

“房前屋后的园田地不得超过三分。”

“三分？”大嫂停了纳鞋底，抬头问道：“咱家园田就有八、九分，余下的咋整？”

“咋整？空着！宁可荒了地也不兴种！要不就算你自留地，一样。”

“自留地还是五分？”二宝不由坐直了身子。

“哼，上边的意思是嫌太多，可咱公社还想保持五分地。咱公社里哪个干部没有自留地？要是真兹扣了，一年少出多少钱？甭管他是左还是右，都会算这笔账。也别说，这也沾了少数民族的光——少数民族地区嘛，适当照顾，还是五分地！”老徐吧唧了几口烟，将烟蒂在炕沿上捻灭：“种啥可有规定——自留地只许种大田作物。经济作物要有限制。黄烟每口人二百棵，多一棵也不行，到五六月份组织检查队来薅苗，种那些变着法生钱的东西一概都不行。”

“啧啧，”大嫂将锥子在头发上抹了抹：“这是何苦来？种啥也得受限制！尽出花哨点子！”

“表婶，别不知足，”二宝接过去说：“前天俺姐来信说，她们辽宁省更惨，每一家才许种二百棵烟，连自家抽都不够！自留地一人一分，归集体种了菜大家分。园田地干脆没有，杀个猪都不随便，你又能咋的？”

“要不那块儿就有那么多落户姑娘了？”大嫂不满地哼

了一声。

我不由心里一动，叹了口气。

又闲扯了些别的，二宝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瓜子皮。

“表叔，那名额的事……可就拜托您给费费心了。”

“我记着呢，”老徐沉吟地卷着烟，望了他一眼：“不坐会儿了？”

“不了。”

“你放心，”老徐向着他的背影又找补一句：“我尽力而为。”

大嫂费力地把十二岁的妞子抱到北炕上，给我们俩抱了两床被褥，拉上了帷幔，我便脱衣躺下了。

跳蚤咬得我睡不着，我轻轻地抓着痒，而一边的妞子却呼呼地睡得极香，我不由想，北大荒人的血液里一定有种抗蚤素吧？

“大妹子？”忽听一声低唤，象是大嫂的声音，我不由微微睁开了眼睛。

“睡着了。”又听她说道。我索性没有吭声。

夫妻俩在南炕上小声嘀咕：

“二宝教书那事行不？”

“我说你呀，也是个懵头。他爹是富农，能行？到公社批，表格也得打回来。”

“不行你还答应人家？”

“嗐！我不会亏了他的两顿酒和一角子猪肉！我心里有数。”

“啥数?”

“大队里正缺个抓药的,当赤脚医生也不错嘛!”

“嗯。”

“咱大队就能解决,用不着公社批。”

“嗯……年下,该给吕书记送点啥了吧?”

“估摸他春节怎么也得回来几天。我看,把二宝那一角子猪肉拿去,再加三十斤黄烟。”

“那角肉得有四五十斤,不少了。”

“你懂个啥?我往公社提拔,全靠他点头呢!咱家还有多少干豆腐?”

“四十来斤的。”

“拿二十斤去。咱年下够吃的了。再拿两捆干粉,五条好烟,十斤酒。”

“啧啧!唉!”

“明天我叫队里给他拉两车豆稽去……”

我就在这一片朦朦胧胧的絮语声中睡着了,睡得香极了,梦见了小油灯昏黄的光下维盈的脸……

第二天,我接着给维盈讲下去。

六 往 事(五)

——河北省,找对象

回农场不久,农场根据上面的精神做了一次初试,即把极少一部分人,每人给了一百五十元安家费,有农村老家的

让回老家，没有的服从分配插队落户。我被分在河北省临西县的一个小村里。

初来那天是晌午，太阳暖暖地照着。三月下旬了，地里却一层白霜。奇怪，是下雪吗？后来才知道，就是这层“雪”解决了社员们全年的食盐问题，甚至将这盐拿到集市上去卖两个零花钱用。

一百五十元安家费直接拨给了生产队，生产队如获至宝，拿这钱去添置队里的农具和种子——生产队欠公社的账还没还清呢。

我问大队书记：“钱都花了，盖房怎么办？”

“盖啥房？还不是早晚结婚一走了事？”他不在意地笑道：“先借住老李家西屋算啦，二十三啦，也该说对象啦，一个人咋过？”

对象……我很快就该二十四岁了，却没有成家立业的心。虽然在这儿时间不长，倒有三位大娘上门来提亲。这儿结婚还是老习惯，媒人提，再相亲、定亲，婚后妇女一般不下地，在家织布、纺线、做饭，养些羊、兔等等。

提的对象并不是村里那几个已到中年的单身汉，也并不是那两三个出身地富但人却很好的青年。这三个人，两个是本村青年，一个是外村的，虽然他们都挺好，可是，我和他们之间一点儿爱情也谈不上呵。

我长这么大，有没有喜欢过谁、爱过谁呢？

我四岁上幼儿园，曾经喜欢过我邻座的小男孩。他有个女孩的名字——石书英。他白净得象只小白兔、小绵羊，

说话、行事都象个小姑娘，总爱穿花汗衫。如果别人跟我借彩色铅笔或要玩我手里的玩具，我是不爱借的，唯独对他没吝惜过。有一次我忘了带橡皮，跟他借，他却舍不得，我好象第一次认清了他，从此我们的“爱情”告吹——不然，我怎么记得这样深呢？

上小学，我曾喜欢过一个叫淮淮的男孩子。他就坐在我后边。他聪明、淘气，功课很好，典型的男孩子性格。上课时，我一分钟也想不起他，可是一放学、下课或上学（尤其在五、六年级），我总希望他能注意我，我总希望能看见他。毕业了，我考入女十二中，他考上另一个学校。初二时，我忍不住给他去了封信，并没有提想交朋友的话，只假说有一位老师想打听他。而他好象一下子便猜透我的意思，立即热情地回了信，写了一大篇，并希望我回信，我的高兴劲儿就别提了！通了半年信，我们终于觉得应该见见面——那时已上初三。然而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个我几乎认不出的人——粗嗄的嗓音代替了儿时清脆的音喉；微黑的茸茸的胡须代替了儿时那坦朗活泼的面容；膀大腰圆的个头代替了儿时嬉笑跳蹦的神态——三年的变化多大呵！也许是出于拘谨、害羞？小时那可爱的影子全不见了，全不见了，我只感到失望！……吹了！

接着便考上了工艺美术学校，那时我还没退队。开学的第一天我就爱上一个同学，我想，这才是真正的爱。我喜欢他正直的相貌和沉稳的性格。他是学习委员。然而，当我肯定自己喜欢他以后，我却冷淡他、疏远他，四年的住宿

生活没有和他说过五句话——而对那些我不喜欢的同学我却很随和！这是我的怪僻吗？不。我想叫他佩服我的心远远胜过盼他喜欢我的心。我深知，他是不会喜欢一个他不佩服的人的，正象我一样。而这佩服，唯有在学习上取得优秀。我奋发着，努力钻研业务，刻苦练习绘画，虽然是想为人民有所贡献，但也是为了他。

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有的是，但我全都放弃了。我以为，真正的爱情是不用着急的。他必须象我爱他一样我才满意，否则，我以为就不是真正的爱情。六五年毕业时我十九岁，我们只互相瞥了一眼，就默默无言地分了手。一年很快过去了，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他。一次，在哥哥的小屋里，哥哥偶然问起我有没有朋友，那时他想给我介绍他高中的一位好友，我如实地告诉了他。

"你应当主动给他写封信。"他鼓励我说。

"多不好意思。"我反而没有初中时的勇气了。

"你还封建？古代有多少卓文君式的佳话？这有什么！"

终于，我鼓足勇气写了一封信：

×××同学：

毕业已经一年了，多么遗憾，四年的美术学校住宿生活，我竟没和你说过五句话。

从开学的第一天，我就喜欢你。你眼睛的闪光正象你的心灵一样，四年来证明是最美、最好的。我总想用超人的学习成绩来博得你对我的爱。虽然并没超过你，但确实在这么做。每当

我独自到公园去写生的时候，多希望你正好在面前，能给你画在纸上，留作纪念！每当我看到迷人的风景时，多希望你就在身边，能和我一同欣赏，画下它们！我常幻想，在那场合你我会有多少共同的感想和语言！

当三、四年级时我接到高年级和同班同学给我的信或条子，表示希望和我做朋友时，我总惋惜地想：这写字的人要是你该多好啊！这就是五年来每分、每秒的心里话。你相信吗？

我签上了名字，写上了日期。我托着那封信呵，在邮筒旁边站了半天，左思量、右犹豫——假如他拒绝我，我将羞得无地自容！我能保证他不拒绝我吗？……然而，我还是勇敢地把它投进去了！我的心，那时跳得象揣个小兔子……

三天了还没接到回信。完了，全完了，我浑身都象没了力气。正当这时，传达室的人说：

"有你一封信！"

呵，我忙去取，用手轻轻地掂了掂，拿在阳光下照了照，才在没人的地方偷偷拆开——我多怕他拒绝我呵。

遇罗锦同学：

来信收到了，今天才给你回信，请原谅。正象你所说，四年来，我们的接触太少了，很是遗憾。我希望今后用我们双方的进一步了解来弥补这个遗憾。

我被你的深情所感动，将你的信给我父母看了。他们都很想见见你。你看在什么时候合适？最好面谈。如果你不愿面谈，写信也行。若面谈，时间由你定吧。

祝好

我还没来得及回信，正想进一步了解他和他的一家的时候，谁想到就出了日记问题，就抄家，就把我当阶级敌人监视起来了呢？紧接着就扭送公安局去教养……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恋爱象个微弱的火星，刚想燃烧，就突然来了一阵冰雹，把它彻底砸灭了。他的父亲是工程师，他一家人在文革中若没受罪，也是提心吊胆。而我呢，早已认为失去了再和他恋爱的条件——我的政治问题、户口问题、工作问题，他的父母会重新考虑我的，不会再把我当成一个可爱的小姑娘。而我也决不忍心叫他找一个“这样”的爱人，我深知他是孝子，大约不会违反他父母的意志的。

因此，我虽然爱他爱了五年，却早就对我们的爱情不抱幻想了。

清明节那天，我和几个穿红着绿的姑娘们在绿油油的麦田里锄草，美丽的风景，自由的笑声，多畅快呵！我想着哥哥，想着我若能写封信，告诉他我的愉快！

邮递员从身后的田埂骑车而过，停下来，叫我去拿一封信。我高兴地跑过去，湖南？表姐来的？我把信打开，奇怪地看下去：

“……罗克弟怎么死的？什么病？为什么不及时抢救？舅舅没告诉我们，看来老人十分悲伤，不忍心写信问他……”

什么？——他死了？他没有被幸免?！死了！！

“小遇儿，快来呀！”姑娘们拄着锄把，一个个回身望着我，愉快地招呼道。

我站在那儿，愣愣地望着信上的“死”字，不想动。

“遇儿，快来呀！”

“家里有啥喜事儿？快说给俺们听听！”她们那尖脆的呼唤声象针扎一般难受。

我不想动，但必须动；我必须装做若无其事和高兴的神情，才能免除村里喊喊喳喳议论，甚至一场轩然大波，才能免除给我这“反动分子”增添加倍的苦闷……

“你娘邮钱儿来了吧？”她们望着默默走来的我，七嘴八舌地问道。也许，她们认为只有邮钱是最愉快的。

“没邮钱。”我勉强笑了一下。

“谁说呀？”她们撇撇嘴：“你们城里人还能没钱儿？象咱这穷地方。”

“没邮钱儿也准有高兴事儿！”她们审视着我——假如她们识字的话，她们早就掏出信来看了。也许正因此，她们的生活才能平静如一汪水，永远那么和平、幸福。

“快说说，遇儿！”

“还不是家常话，”我笑着打断她们：“有啥高兴的事呀！”

我拾起锄头，闷头锄麦，为了避免她们的磨缠，尽快地锄在她们前面……

夜里，人们都睡了，村里静极了……

我靠门坐在门槛上，仰望着苍白的月亮。

死了！他真的死了吗？泉涌的泪水无声地滚下，滚

下……他真的死了？

不，他没有死。就在那儿——那芦沟桥畔苍茫的深郊旷野里，夜，也是这么黑，星星，也是这么稀疏和遥远；月牙挂在深沉、寂死的夜空，只有令人窒息的空气在发出一丝微弱的、冰冷的颤动……

他，躺在湿土里，用手指掘动那未压实的土，慢慢地站了起来……四周是死一般静。他抖了抖身上的土——呵，月光下，脚下露出那横七竖八的尸体，血还没有凝住……他呆望着，不禁深深打了个寒噤！他沉思地站了会儿，转过身，缓慢地、坚定地向前走去、走去……向那遥远的、透出鱼肚白色的霞光走去了……那背影越来越小，东方也越来越亮——那可爱的、熟悉的背影呵！

他一定走到霞光里去了，哥哥！我亲爱的哥哥！

心爱的人没有了，可钦可敬的人也失去了，我不相信自己能再有翻身的日子。如果我相信，那必定是在我死后。因此，也决不相信再能遇见使我动心的人。

迫在眉睫的还是经济问题。这个穷队每年的工值没高过一毛钱。去年一个工是八分钱，妇女最高分一天记八分，我初来，给我订七分。七八五十六，一根冰棍还剩六厘。一天就算吃一顿饭，一天工钱也不够哇。没办法，只好向母亲要钱了，每月她寄来十元做为伙食费，将就维持生活。无怪乎一个打光棍的壮劳力干一年反而欠生产队许多钱，也无怪乎队里年年吃返销粮了。

在陕西插队的两个弟弟也和我一样穷，他们的工值每年不高过一角五，从未分过红，常常连邮票钱都没有。想起母亲每天带病上班，工资不发全薪，要养活姥姥和爸爸，还要给我和弟弟寄钱，我的心就揪紧了。怎样才能不要母亲的钱？万一妈妈死了我们又将如何？而那三位大娘又不止一次地来催："我提的小伙儿你爹娘同意了吗？"

是的，结了婚就可以不要母亲钱。甚至，万一母亲死了，爸爸和姥姥也可以来找我，不至于沿街要饭。对，结了婚就可以不要母亲钱！——有一碗饭吃就行了嘛，他们是乡里人，有的是生活的道道。可我，却没有这本事——无论我怎样天天出工劳动也还要依赖母亲，这怎么行！

爱情，爱情早已等于"〇"了，能活着就不错！我这辈子还能遇见什么可爱的人？见鬼去吧！结婚，什么叫结婚？无非就是和男方一家人和睦相处罢了，我想自己是能做到的——这些人再不好处也比教养所的人好处哇，我在教养所和谁闹过别扭呢？说不定我会讨得男方一家人的欢心呢。让我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只知拉风箱做饭、缝衣纳鞋底的小媳妇吧。

想好了，我才把村里提亲的事写信告诉了父母。

"爸爸！"我站在尘烟四起的汽车门旁，高兴地伸手去搀扶他，帮他拿下背上沉重的手提包。爸爸那混浊的眼珠六神无主地乱转，使我不由害怕起来——莫非因为哥哥的死，他精神上有了毛病？

"走吧。"

我望望显得更为苍老的父亲，背上背包，和他向十几里外的村子走去。

灼热的午日无情地蒸烤着黄土道上的行人，没走多远就汗流浃背了。

"您这次来，街道没刁难吗？"我打破这难耐的沉默。

"唉！可难啦！北京正提战备疏散人口，传达一号文件。要不是我让你拍来个病重的电报，街道哪儿放我走？唉！"

"疏散？您信上怎没提？"

"咱们上那棵大槐树底下坐会儿，我慢慢跟你说……"

原来是这样的：北京正根据上边的文件，大张旗鼓地宣传疏散人口，一切为了备战云云。前几天，母亲所在的工厂和街道革委会已将我和弟弟的地址要了去，不客气地说：

"一旦疏散，你们家是第一户该走的，或找你女儿，或找你儿子。"

"……唉！"父亲叹气道："我临来，和你妈整商量了一夜……"

"您们怎么商量的？"

父亲似乎一转念，并不直接回答我，却反而问道：

"村里给你提的那三家你有没有中意的呢？"

"没有。爸爸，说心里话，要不是为了减轻我妈的负担，我真想一辈子都不结婚。"

"爸爸知道……"他的脸色阴郁而悲愁，象是为自己的女儿感到无限的委屈。这反而加重了我受屈的心情。我站

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催促父亲赶路。

“你信上说这儿年年不分钱，一天才合八分钱？”父亲边走边问道。

“嗯。”

“队里为什么不搞点副业？”

“上边不让。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割还来不及呢。”

“老乡们不够吃怎么办？”

“用细粮和小米换白薯干和高粱，磨了面，掺水蒸窝窝，有时也掺点糠。”

“光吃这个？”

“那哪儿行？得搭稀的才够吃，每顿都喝糊糊。”

“什么糊糊？”

“高粱面熬的，有时掺点干白薯叶。”

“菜吃什么？”

“用地里的盐腌一大缸葫萝卜，够一年吃的了。”

“有自留地吗？”

“原来有，后来又收回去了。一人一分，归队里集体种菜用。”

“为什么不养点猪、鸡、羊、兔？”

“人都不够吃，拿什么去养？庄稼因盐碱地都不爱长，连草都少有。除了村边那几户，村里的鸡都不爱下蛋。”

“整年没钱，怎么活？”

“老乡们主要靠卖布票。”

“布票？”

"一人一年不是十八尺吗？刚下来布票八分钱一尺，春节前就可以卖到四毛五一尺。小病抗抗，大病才吃点药，老喝稀的，又不吃荤，得大病的倒不多。再卖只小兔，零花钱就出来了。"

"都卖了布票穿什么？"

"家织布，连男的都会织布。别瞧穷，很少有人穿补丁衣服，刚一破就打袼褙做鞋底了。"

"分的棉花多？"

"不多。摘棉花时，每个妇女都穿上最肥最肥的裤子，两个裤脚扎起来，队长那两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布票能公开卖？"

"不能。集市上，他们有不言而喻的地点和暗示，搭讪好了，上较远的村子里去讲价钱……"

正值晌午，碧绿无边的田野象是睡熟了，象孩子般宁静。盛夏那干热的旱风，无情地吹舔着手、臂和脸。衣服被汗水湿透了，寂寥的田野里远近没有一个人。座座村落，在蔚蓝的天空映衬下，象在静静地想心事……我和父亲缄默地走着，彼此的心都被一件难言的事揪扯着、牵动着，谁也不愿先开口讲话。

"你哥哥……这么好的孩子……"他终于忍不住地哭泣起来，悲恸地放声大哭了，那衰老的身体撑不住满腔的郁愤，不由得弯下了腰。

"爸爸！……"我双手搀住他，想停下来。但他却摇摇头，坚持地向前走，悲号着、哀泣着……

“孩子……为了纪念你哥哥……你一定要写下你哥哥!”

“爸爸,放心吧！我一定、一定写他……”

沙沙的麦田低语着,象是在应和这位老人无边的伤痛,那再也治不好的伤痛……

我一手搀着他,另一手揿着肩上沉重的背包,费力地向前走。心里只有一句话：

“让爸爸哭个痛快吧！”

月光透过纸窗给土屋里淡淡地铺了一层银灰……耳边还回荡着父亲白天在屋里说的话：

“……你哥哥被枪决那天,上午我正在家做饭，警察进来喝道：‘你儿子遇罗克被枪决了，你有什么意见？快签字吧！’说着把判决书往桌上一摔。唉……我好不容易才想过味儿来，坐在地上就哭起来，站都站不起来了。他挺不耐烦,等我签了字好去交差。我一狠心,哭什么？我当着他的面哭什么？我使劲站起来签了字，他扬长而去……人都死啦,还问有没有意见！我哪儿有心思再做饭哪！……你妈下了班,我还在那儿痛哭。她在班上就知道了,你说她可不可气,硬不叫我哭,还喝斥我：‘要哭，你上外边哭去！’她硬是一个眼泪没掉！我哪儿有她那么大毅力？唉！……第二天,我和你妈搀扶着去监狱取你哥哥的东西……送去的那个新背心你哥哥还叠得整整齐齐,一直没舍得穿。一个脸盆,一根塑料皮带,一个钱夹,一个工作证，钱夹里只有几张饭票和五毛钱……一支自来水钢笔……孩子，这支笔我给你带来

了，你留下吧，我想，你一定最希望要它……”

此时，我把这支黑杆钢笔贴在面颊上，亲吻着它……哥哥，我一定要对得起你留给我的笔呵！哪怕我只写出一篇很短的文章，也一定要写下对你的爱和怀念。我要用生命写我的实话文学，哪怕只能成为遗作。为了这，一切我都可以抛弃！难道在十五岁时我没有这念头吗？因为你雄鹰的性格已展现在我眼前！难道我在专政机关没有记下你吗？因为我相信你会被人民纪念！哥哥，我可以没有爱人、没有孩子、没有我自己，但决不能没有你的笔！笔就是你的灵魂、就是武器、就是真理，就是我心爱的一切！

我凝视着被烟熏黑了的棚顶，回想起父亲那些使我羞涩、但又茅塞顿开的话：

“……我和你妈整商量了一夜……孩子，你这儿太苦啦，不能在这儿成家呀。罗文、罗勉那儿也和你这儿差不多，我和你妈投奔你们谁，都得受穷，咱们还没有社员那两下子哪……反正你也结一回婚，为什么不找个富裕农村呢？将来我们投奔你去，也好落脚呵。直接从北京下去户口好落，一旦全家的户口都到了农村，即便你有了好地方，一家子户口也难落了……”

我转脸望望父亲，他虽闭着眼，却不象睡着。

“爸爸……”我轻轻唤道。

果然，他一下子便睁开眼睛，在月光的照映下，正等着我要说什么。

“爸爸，您说的话我都想了。正象您说的，一个人户口

好动。索性是结一回婚，干嘛不找个富裕点儿的地方呢？弟弟来信也常说，他们总幻想到人烟少而又富足自由的地方去。看来，如果能走这步棋，全家就不必为生活发愁了。爸爸，您写信吧，明天就写吧，把您所有想得起来的亲友，每个人都写上它一封，好让咱们有更多的地方可供选择！”

“孩子……我和你妈实出于无奈呀……”

“别说了，爸爸，我了解您。”

这晚，爸爸主动给我讲了他的历史。我躺在炕上静听，心里却在想，他无非是想表明他的心地是纯洁善良的罢了，难道我对自己的亲生父亲还会有什么怀疑吗？那样不等于怀疑了我自己？

万万没有想到，一向清高的我，竟会做出随便嫁给谁都可以的决定！如今若有个妓女院我也想去，只要家里能过得好些！这个突变谁能想到呢？

当“婚姻”这个词汇第一次降到我头上时，我只感到屈辱。我伤感吗？心酸吗？悲痛吗？不，一切感觉都变得麻木不仁了。只知道为了生活，必须要这样做。想想我们的自由婚姻法，心里只有苦笑。

第二天我去干活，父亲就在屋里写信：

……我有个女儿，二十四岁，高中毕业。相貌说得过去，身体健康。因此地太贫穷，虽有提亲的，并不想考虑。希望到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村去，只要对方人品一般就行。文化、年龄您看着办，我们不做为条件。如要像片，立即寄去。……

中午收工回来，看到一贯提笔成章的父亲来回涂抹着，终于起成这样的草稿时，我才深深感到这内容多么刺痛我的心！

此外又怎么写呢？写必须高中毕业？品貌必须优秀？必须好学、有思想？只能说，父亲写得恰到好处，无可挑剔！

“爸爸，”我将草稿若无其事地递给他，装做轻松愉快地说道：“您多写几封吧，我看挺好。像片我手头就有，寄去算了，何必费二道手呢？”

“不，”父亲接过草稿，沉闷地摇摇头：“先不必寄去，宁可费二道手。”

呵，仅仅从这简短的一句话，就可知道父亲是多么器重他的每一个孩子啊！依稀记得我五岁时，爸爸抱起我来，亲了一下说：“等小妹妹长大了，我一定给你找个工程师！”……但适才他那屈辱的一瞥却象一把钻拧到我心上，我多想把它驱逐出去，永不再看到这屈辱的光！但愿我能给他们换来幸福！

那是个集日，父亲去发十几封同样内容的信。晌午他回来，吓了我一跳——满脸泪痕与额上的汗水交融成一片……他说他在寂静的田野里想起了哥哥，然而，又何尝不是想到我呢？

要下雨了！黑云滚滚而来……大雨倾盆而下。电闪当头，霹雳震天，竖起的银龙般的闪电就打在这小院里——离屋门二米远的地方！我们赶紧关了门，躲到里屋去。

雷，在门外怒吼、咆哮……

“爱情、自由！人们要的就是这两样！”

在那奔腾的雨声中，在那激烈呼唤的霹雳中，我仿佛听见了哥哥那愤怒的责难……

别责备我，哥哥！别在雷声中痛斥我吧！我并没想到自己……悲哀、痛苦、绝望的心情与雷雨声混成一片了。

门“哐啷”一声被带雨的风撞开了，刺眼的一道闪电跃在当头，好不吓人！一声裂天的巨响，夹着狂风，象要吞噬整个世界。

“来！快把门顶住！”父亲嚷道。

我急忙找来了顶门柱。

雷、雨、风在门外盘旋……

哥哥！要是你处在我的处境，该如何做呢？也许你会说：“我们还不算太苦，即使再苦，也不能把婚姻当做谋取生活的手段！”是吗？可是，我没有勇气象你那样做！一家人怎么生活呢？

雨，渐渐小了……隆隆的雷声散开了、渐渐远去了……好象哥哥不再和我们争辩。

我推开门，湿润的空气扑入心怀，沉郁的心象灌进了一道清风，爽快了许多。天又露出了蓝色，一块块泼墨似的雨云从头顶上疾驰而过。

雨后的云飞驰而过，是这样匆忙！我多羡慕那群云呵，它们疾速地奔向远方！

云在疾飞、在前行、在不顾一切地离去……我忽然悲哀地感到，那是哥哥轻蔑地走了，轻蔑地走了！

十几天过去了，所有的亲友都没来信，我和父亲几乎绝望了。在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刻，母亲的信使我们大为振奋：

……我一直在为罗锦的事托人想办法，但毫无结果。北京的形势仍和你走时一样。昨天意外地碰见赵大姐，说及罗锦的事，非常凑巧，她说她儿子志国就在东北插队，当地去年一个工值合一元八角九分。年年不下一元七。她可以托志国想办法给罗锦找个对象……

"赵伯母是谁？"我问爸爸。

"唉，你不认得。你离开家以后，你姥姥买菜、开街道妇女会认识的，后来咱一搬了家，就不来往了。"

"您见过志国吗？"

"咱全家都没见过。认识他们家时他已经插队去了。"

于是，我和父亲整天盼着母亲回信，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

不久，母亲来了信，叫我们回北京，说有事相商。原来，志国来了信，写着：

……这儿的人结婚很早，十七、八就订婚，二十多岁都有两三个孩子了。一时没有合适的对象。如果罗锦姐愿意来，不妨到我们这儿住一个时期，我们村只有三个学生，连饭都做不熟。那时罗锦姐若看有合适的，也可以亲自物色……

看来，路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去北大荒看看，如果能落

下，就尽快落上户口。

命运的安排多么奇妙，我决定去闯北大荒！

七　往　　事（六）

——闯关东，结婚

“路费成问题呀，”母亲发愁了：“光火车票就二十六块钱，还不算汽车，不算火车上吃饭，怎么也得带几块零用吧？没有三十下不去呀。”

我和爸爸望着她，都无法可想。

“卖东西吧！”母亲忧郁地打量着屋子。

现在我们已经搬到了两间狭小的小平房——每搬一次家，环境和住房就要次一些；每次搬家，都幻想着当地的街道也许能对我们好一些——不要老拿我们当做敌对分子，然而，这也只是幻想罢了！此时，我和父亲也打量着屋子，四壁空空，有什么可卖的呢？

“来，罗锦，你帮我把褥子抽出来，”母亲走到木板床边，掀起褥子的一角：“你去委托行跑一趟，这两条棉被褥怎么也能卖十几块钱吧。”

“那您铺什么呢？”

“嗐，”母亲不耐烦地皱皱眉：“你没看你姥姥活不了两天啦？你姥姥一死，不就有褥子啦？犹豫什么？快去吧。”

……“七块。”验货人不屑地把目光移到了玻璃窗上。

我犹豫了几秒钟，一狠心，把户口本递给了他。这笔交易没用三分钟就完成了。

母亲一听这钱数，也意外地愣了愣。怎么办？就说先不算回来的路费，还差二十三元呢。

“我扒车吧。”

“不行，现在对扒车的知青可紧了，不打票的送车站派出所，你再进去？是闹着玩儿的？”她又叹道：“唉！哪怕家里有块表呢！……”她象想起了主意，转身对坐在那里闷头吸烟的父亲说道：“我看……你能不能上孙大嫂那儿去借十块钱？孙大哥是你的老朋友，你不去，我不好去呀。你头一回张口，总得有个老面子吧。”

“我……唉！”从没张口向外人借过钱的父亲踌躇了半天，一咬牙，才起身去了。

我趁母亲不注意，溜出了家门，去退那条父亲去河北时带给我的新裤子——我一直没舍得穿它呢。

……“有发票也不成，”售货员不满地说：“买的日期太长了，你不喜欢这颜色早干嘛来着？再说，这蓝色也很普通嘛。”

“求求你了，好心人。我实在是东北插队的穷学生，回去没有路费，只好把它退了。”

“那么穷还买裤子，买了裤子又要退？商店都是为你开的？”

“当初怪我没考虑好，行行好吧……难道，您就没有插队的弟妹或亲友吗？……”

一直到眼泪涌上我的眼睛，她又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裤子和发票，才终于发了善心，开了张退票。

“总得穿件整齐点的衣服出远门呀，”母亲听说我退了裤子，埋怨道：“就穿这身破衣服去？”

“破衣服怎么了？说不定因此户口落得更快呢。”

我心里只有苦笑——脸皮都不要了，还穿什么新裤子？

三千五百里的北大荒啊，带着父亲烙的够吃几天的饼，我要闯关东去了！

父母送我到车站。象个好儿男，我觉得自己是多么勇敢、果断和英雄！我知道，父母将多么惦记我，怕我有个好歹。我尽量做出快乐的神情和他们说东道西，不愿沉默和冷场。

“妈，爸爸，听我说呀！”我兴高采烈地大声说：“我总有个预感，一定会一帆风顺的！您猜怎么回事？猜不着？告诉您吧，昨天晚上，我故意把棉鞋里子绷了块红布——说不定我该走红运啦！到那儿就能落上户！您放心，妈，爸爸，只要我一落上户，就把弟弟们的户口先弄过去，您等着我的好消息吧，我会很快回来的！”

站在车厢门口的女列车员望着我那高兴的神情不由笑了，虽然她肯定没听清我说的是什么。母亲也朝她回头一笑，尽管她是强做欢笑。我才觉出，替母亲担心其实没必要，她脸上一直就挂着假笑，正做得比我还出色呢。母亲的毅力和自制力是少见的，连哥哥都佩服她这点，何况我呢？

而父亲却一直苦闷得说不出话来，忧郁地看着我们演戏——其实，不演戏，哭又有什么用呢？正象母亲说的："要有用，咱们都哭！"

火车就要起动了，这假面具一直到车轮响了，我扒在玻璃上向他们告别时才算撕去。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蹒跚地随火车紧走着、紧走着，父亲老泪纵横，母亲哭笑皆非，我将脸紧贴在玻璃上，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呜——"

火车发出冲天的巨响，象咆哮的猛兽冲向前方！这巨响，是狂啸的风，轰鸣的雷！我的心，随着火车疯狂的节奏声，也狠狠地发下誓言：

"妈，爸爸，看着吧，落不上户，我决不回来，哪怕去北山里当黑户、去讨饭，也决不毫无收获地回来！"

两天一夜的火车，我不敢想哥哥，不敢想美术学校的那位同学，似乎一想他们，对他们都是个污辱。我不配想他们，现在我不是人，而是个商品！

我眯着眼，强忍着一腔的泪水……想起四年前给那位同学写信时的情景，怎能想到，竟有这厚颜无耻的一天？我是人吗？我在毛遂自荐地向北大荒人宣布，大声叫卖自己：

"谁要我？"

难道，我还有做人的尊严吗？

没有了，一点儿也没有了！我是在叫卖自己呵！

漫长的夜，多么难熬！我只好用一个美妙的故事来排解时时涌起的心酸——呵，在那无人迹的茂密的森林里，鹅

毛大雪纷纷扬扬，我踏着积雪走呵，走呵，手脚冻僵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正在绝望中，忽然象童话一样，瞥见了一所小屋。那窗户亮着金黄色的灯光——朦胧的光，温暖的光……我仿佛感到了屋里扑脸的热气和主人善良的心肠，我仿佛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儿，看到了柔软舒服的小床——那是多么可爱的一间小屋呵！

……当我走下火车时，透骨的寒气袭来，我才第一次领略北大荒的秋夜！我在火车站蜷缩着蹲了一夜，等着天亮好乘汽车赶路。

起伏不平的北大荒的原野呵！上了摆渡，过了那条宽阔的嫩江，又走旱路。该收割的苞米、黄豆在茂盛的荒草里象个受气包。走十来里地，也不见一个人影，村子远远的，荒草甸一片又一片。这儿不是牧区，并没有放牧的畜群。人少地多，大概这就是北大荒富的原因了。

路边一小堆一小堆烧焦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蹲下来一看，呵，烧黄豆！是收割的人们间歇时吃剩下的。我扒开柴灰，捡起两个大而圆的焦黄的豆子嚼了起来，香极了……和河北真是天壤之别呀！虽然它显得如此荒凉和粗犷，但它正象一位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的巨人，与那纤细、秀美、但却病入膏肓的河北省怎么相比呢？

老天保佑，凭着“极高、皮肤油黑”的特征，我没有认错人，免除了村里一场“假认亲”的风波。

志国安排我住在村东头老严家。

“我们胜过桃园三结义，”志国说：“你就住在他家吧。”

于是，我每天去村西头社房给三个男学生烧饭，和他们一起吃，晚上就在严大哥家睡。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我的户口什么时候能落上？每天我都象度日如年地过着……我和志国假说是两姨亲——我们的母亲是表姐妹。然而，我还未进村，全村就知道志国有个要来东北找对象的表姐了。脸皮是早已豁出去了，为了生活顾不得羞耻。为了求得他们的帮助，我把家里的难处都和志国讲明。而且，也把疏散人口的事对严大哥一家讲了。

“别着急，”严大哥安慰道：“明儿个志国去装三斤酒，我让你大嫂炒几个菜，请队委们喝一顿，提提落户的事。”

“要是去年就好了，”大嫂说道：“去年你大哥当小队长。今年队委这几个人，和咱关系都一般，不是很知近的。你既来了，总之得给你想办法，要不老人在北京多着急呀。”

那天，我帮大嫂烧火，大嫂炒了不少菜。大哥、志国和另外两个知识青年陪着队委们在社房喝酒，从中午一直喝到天擦黑。

“光闲扯淡，”大哥一进屋就生气地说：“从晌午到这会儿我说了有三四遍落户的事，就是没人搭茬儿——那两个青年搭茬儿管屁用？酒才喝光，二赖子就发起酒疯来了，一下子把酒桌翻了，谁知道是真醉假醉？乱哄哄大伙儿可不散了咋的？折了我这一身酒和菜！”他一边脱着那脏了的外衣，一面骂道：“这二赖子真他妈王八蛋！”

“谁是二赖子？”我奇怪地问道。

“这小子顶不是东西！”大嫂说道：“村里谁都怕惹他，他表哥又是大队书记。前年他把他媳妇胳膊打折了，他媳妇跟他离了，撇下个小子，今年都九岁了。你来信要找对象的时候，正好他来串门，听见了，央求我给他介绍。甭说我知道不行，志国也不干哪！你瞧，这他报复了不是？有他捣乱就难落啦。”

正说着，志国带了一脸的盛怒进屋，一进院门就嚷道：

“我他妈揍了那小子了！他妈的发什么酒疯？装疯卖傻！连酒杯都让这王八蛋砸碎了好几个！我真想揍死他！今儿个让他也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恕我嘴直，大个儿，”严大哥的父亲盘腿坐在炕头上，吸着长烟袋，这时掀动了眼皮，慢悠悠地说：

“平时你们也没注意维护好关系。这不，求到他们头上来了……唉！”

似乎他还想说什么，却又住了嘴。

“别着急，”大哥劝慰道：“说什么也得帮你表姐落上户，我再想办法……”

于是又请了一次没有二赖子参加的酒席，地点在严大哥家。除了队委和大哥以外，连志国和另外两个青年也没让来。

这次我亲眼看到严大哥陪着小队几个干部和大队书记喝了大半天。酒过三巡，大哥才提到正事。

“我的章丢了，”正小队长望着酒杯说：“前几天翻遍了

箱子、炕头，也找不着。过两天我得刻一个去。”他抬起那充满谎话、无精打采的眼睛：“真的，没有章哪儿行？说什么过两天也得刻一个去。”

“我的章也丢了。”副小队长也望着酒杯说。

究竟为什么志国得罪了队里的人呢？我问大嫂和大爷。大嫂却和大哥一样回避道：

“大个儿不错。就是爱打抱不平儿。也许因为这个？也没见那俩队长，谁息见？章丢了他妈个八！”

“恕我嘴直啊，”大爷欲言又止地道，“青年们不会处啊！往后你要来，兴许能好点儿。”

没有小队同意，尽管大队和公社已表示同意，也不行。我想到父母在北京一定焦急地又多添了白发，心里真急出火来了——嘴上一连起了一串泡。我忧愁得吃不下饭，万一这时北京疏散可怎么好？

“我倒有一个主意，”这天大哥说：“你和志国不是两姨亲吗？”

“是呀。”

“那就有主意了，保你能落上。”

我奇怪地望着他。

他含笑说道：“咱们这儿，两姨亲算真亲，可以作亲。更甭说你们还是表的。干脆就让志国说，你是他未婚妻，上两次没好意思明说。知识青年要结婚了，国家支持！你小小的生产队敢不开证明？这还用不着全小队讨论了呢！这个法儿，又快又好。”

“那……”这真出乎我意料，为难地道：“这不明明是假的吗？志国也不干哪？”

“他保证干，”大哥笑了笑：“你放心，我一说他准干。”

“可是……我比他大四岁呢，人家也不信哪。”

“谁不信？”大哥满不以为然：“你比他看上去还显小，谁不说你倒象他妹妹？再说，大几岁就不合婚姻法啦？”

“那……以后人家要是笑话志国，我也对不起他呀。他的脸往哪儿搁呢？”

“笑话啥？为了落户！怎么啦？人人都得佩服志国的高招儿呢！”……

万没想到，当大哥大嫂把志国叫来，说出这办法时，志国竟红着脸，一口应允了。

当我拿到公社开的准迁证明，我的心哪，才如一块磐石落了地！望着那“未婚妻”三字，我回想这一趟来东北志国对我的无私帮助，又给我拿钱买火车票，只有加倍地感激他！我在心里下了决心，不管他有多大的缺点，我也会说，他是最侠义不过的，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他！

准迁证到手的第二天一早，我就上了路。志国一直送我到汽车站。当我在汽车里伸手向他告别时，他忽然有些羞赧地对我说：

“你的书包里有一封信，上火车再看吧。”

火车上……

我从书包里掏出那封信。

罗锦:

你就要走啦，盼望你一切顺利，尽快回来。我对你照顾很不够，请别生我的气。望多提意见，以便做得更好。我多希望迁户口的理由是真的呀。

祝伯父伯母大人安好。

一路平安！

志国 1970、10

看了这封信，我的高兴和感激反而减淡了……看起来，谁也不能白帮谁呀。我自嘲地一笑，把这封信又放进书包，不由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唉！要是哥哥换了他，会怎么做？他决不会说出那句话的。可是，志国比起那些非要结了婚才帮你落户的人，不是显得要好得多吗？

到了北大荒，我才知道“落户姑娘”在当地是司空见惯、并不稀奇的事，只不过见到城市里有这样的人，还是第一次罢了。那些“落户姑娘”大部分是辽宁省的——因为那儿最穷。她们嫁给一个人，什么财礼都不要，条件是把全家的户口带过来。

志国的信，不由使我思索起来……现在，我还有爱谁不爱谁一说吗？根本就没有。即使我这次拿到了准迁证，我也没幻想着今后要找一个理想的爱人——我不会遇到再能使我动心的人了！现在是，怎么对弟弟们落户有利就怎么做。只有弟弟们的户口迁来，父母们才能来投奔我们。如果弟弟们的户口不来，疏散时强行让父母落到弟弟那儿去，

又怎么办？那时四口人的农村户口更不好动了。

如果我拒绝志国，很可能弟弟的户口就落不上。通过这些日子对他的观察和了解，我想如果我拒绝他，他会要报复的。如果我答应他，尽管他不会同意两个弟弟来，可是为了讨得我的欢心，他是会帮忙的。我初来乍到，需要他的帮助。这样，我决定答应他。

回家以后跟父母说这件事吗？如果我只说他侠义地帮助我，他们会多么感激他！如果我提到这封信，他们那感激的目光立即会变成屈辱的光——我怕看到这样的光！难道我还要欣赏他们的脸色？听他们的叹气？

屈辱是注定了的，在河北就已经开始。难道我回去再给他们增添一份屈辱吗？苦滋味我一个人尝就行了，只要我完成了户口的事，就算完成了任务。

象这样结婚决不可能得到幸福，还用征求父母的同意？想让他们祝福我？他们不是早就同意我嫁给谁都可以了吗？可笑！

"就这样我和他结婚了。"望着窗外开阔的雪原，我一手托着腮，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继续讲道："费了好大劲，终于尽快把两个弟弟的户口办来了……就象你见到的现在这样子。其实，疏散只是叱咤风云地闹了一通，并没有实行。父亲在北京整天挖防空洞，一分不给，还受气。两个弟弟一来，他便也来了，在这儿养鸡、养鹅又养猪，忙碌而愉快。姥姥在我去河北迁户口时，就死了。母亲上月退休了，来信说

要到这儿住一阵。现在我弟弟他们每年收入一千多元，房子、用物都添齐了。一个是小队会计，一个是小队木匠，过得都挺高兴。唉！我的任务总算完成啦！”

好一会儿，我才觉察出屋里肃静得出奇。一回头，嗬，原来维盈正低着头，双手塞在腿下，紧闭着深深的嘴角，泪水早都滴在镜片上了。

“你怎么啦？”我吃惊，却又极为感动！有谁比我更体会他的心情呢？

“你瞧你，”我叹了口气，下了炕拽下干毛巾扔给他：“你怎这么软弱呢？讲故事的主人都没哭，你哭什么呢？”

他什么话也不说，好似为自己的眼泪觉得羞愧。只是摘下眼镜，用衣角静静地擦着镜片。我想，他一定不愿意我盯着他看，因此便走出里屋，去外屋往灶炕里填了满满一下子碎柴禾。我又磨磨蹭蹭地洗了洗手，假装若无其事地走进屋来，仿佛我从来不知道他哭过似的，轻松地抓起两块糖扔给他：

“吃吗？我给你倒杯热茶怎么样？”

这举止果然使他象轻快了许多，他又渐渐恢复了常态，剥起一块糖含在嘴里，深深地瞥了我一眼，望着窗外出神。

“哎哟，”我忽然想了起来：“鸡和猪都忘了喂啦！”

等我忙完回来，已到下午两点，便烧火煮饭。

“我帮你烧吧！”他走出来，轻声说。

“给——”我把烧火棍递给他，自己削土豆皮。

他蹲在那儿，火光映着他的脸，真好看呵。

“你和志国感情好吗?”他忽然抬起头来,望着我，温和而郑重地问道。

“怎么说呢?”我随便地一笑:“他是好人,不是爱人。也许,我临死前回想自己的一生,不承认自己有过爱人。”

他低着头,絮絮地往灶炕里填柴,什么也没说。

“可是他每次到我们那儿去，都夸你……”他注视着我说。

“是吗?又夸我又打我,真有意思!”

“他打过你?常打你?”

“嗯。”

“为什么?”

我不由踌躇了。告诉他吗?可是,我希望他都能了解。

“只因为三年多我只跟他睡过一夜，一共只有一分钟，却有了孩子。他怪我跟他没感情。就是因为这个。”

维盈的眼神使我暗自惊奇——那是完全信赖的、谅解的、哥哥一样的眼神!在那眼神里,既没有疑问，也没有想象的意思,那么坦率、真诚、友好、信赖!仿佛他是一团空气，对我新婚那一夜的始末因由都了如指掌、完全了解似的!这目光实在使我感动。

我一生也忘不了这目光和神情!

“这不可以称为童话吗,维盈?”吃完饭，我给他倒了杯热茶,背着手,在地上来回踱着步,象做什么报告:“我以为,过去的故事可以称为童话。哥哥已经化了神,成了仙,我每天看得见他，觉得他一点儿也没死。他在大自然里——蓝

天里、日光里、松涛里、晚霞里……一切自然现象好象都有他，你不觉得吗？我希望有一天，维盈，你也这么觉得，这么爱他！我以对他的爱为骄傲，自称是天下最爱他的人。胜过爸爸，因为爸爸没有行动，只会唉声叹气。而我，却要把所有关于他的回忆写出来，五十年、一百年，没有关系，我会交给可靠的人，让这本书一代一代传下去，早晚有一天让它发表！也许，我会为这掉脑袋，但我相信，在对着枪口时，我会说，哥哥，我爱你，请你原谅我过去的一切糊涂吧……可惜，我只怕写不出感人的故事来。”

“把你刚才的回忆写出来，就能感动人。”维盈满怀爱慕地望着我，这眼神，给了我多大的温暖呵。

这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连想都不爱想的新婚之夜……

“咱们快睡吧，”还不到九点，志国就催促道。

从他那略带忸怩、羞涩的眼神里，我好象发现了什么令人不安的、不光明的东西。这眼神里的隐秘意味着什么呢？

直到此时，我们还没谈过一句恋爱的话，还没拉过一下手呢！这真叫“先结婚、后恋爱”，富于中国气派！我本是中国人，对中国气派并不反感。可也谈不上高兴——我根本就不爱他呀。

今晚该上结婚的第一课了——这堂课的内容是什么？将是什么样子？将是什么感受？此时我的脑子里，如同一张白纸。医书从未看过，黄色小说从未读过，父母从未谈

过，学校从未教育过。而和我相好的同学，又都是气味相投，从未想过这问题。

直到进教养所，时常听见小流氓打架时互相谩骂，那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吵得大院里都能听见，才使我恍惚知道点什么。可惜这“性教育”竟首先是从小流氓的谩骂中得来的！然而我们“思想反动”组在大院里和他们又无来往，既不在一起住又不在一起劳动，“反动组”的人又从不谈这个，因此无怪乎到了二十四岁，自己还在这方面是个白痴。

而今，又意外地结了这场婚。我一边铺被，忽然象闪电般想起小流氓的谩骂——果真是那样子？但我立即不愉快地把它排挤开了——好人和流氓怎能做法相同？志国究竟不是流氓呵！

“把两人的被铺到一块儿。”我刚刚铺好，志国又带着那奇特的眼神命令道。

我顺从地改变了被窝的形状，更加不安起来。志国在外屋洗脚，我脱了外衣，先躺下了。

每个女孩子人人必过的一关，难道今天就要轮到我了吗？心里七上八下的。

喜悦吗？……不。羞涩吗？……不。幸福吗？不。满意吗？不。害怕吗？是。担心吗？是。痛苦吗？幻想吗？……我将脸扭过一边，不愿看见志国进屋时那瞟过来的眼神，真俗气！我闭上眼，静悄悄地幻想起来……

好象我那些痛苦的往事，都应当在这一夜得到抚慰和温存……

工作被剥夺了，四年的玩具专业知识全白扔了，思想反动的帽子戴上了，监狱的铁窗滋味尝过了，初恋的萌芽还没点燃就熄灭了，欢乐的家没有了，可爱的哥哥被枪决了，破着脸皮到北大荒叫卖过自己了——啊，这一切，一切的痛苦，难道不应在今晚得到这位"买"我的人——我的丈夫的温情吗？虽然我们的结合象是一场交易，但我究竟不是丫环、不是农奴、不是妓女呵！诚然，我嫁给他觉得屈辱，可是现在，我却希望这屈辱能被他的温情赶走，能叫我发现他的哪怕是一星星可爱处也好……

或许，我们躺在被窝里，友好地握着手——做出我们的第一次接触。他温柔地抚摸我的手，把我轻轻地抱过去，抚摸我的头发、脸蛋，深情地望着我，把我当做一个可怜的孩子。他应该如此抚慰我，他的痛苦比我少得多。我在这无言的爱语里，在感情的交流中感到深深的满足、甜蜜和幸福。我心里的一切不快和痛苦都将化为乌有……他那好听的呼吸声将象是一副洗涤剂，把屈辱和痛苦全洗干净……我就在这柔和的爱抚中睡着了，一夜没醒，做着香甜的梦。第二天、第三天，不知过了几天，这"买"我的人一直都如此温柔地对待我，我一天比一天爱他，一直到我觉得非要更深地爱他不可。那时我也许会说："我给你生个小宝宝吧。"——从那天起，我才算真的结了婚……那该多好！实在话，我们真应当有个恋爱的过程呢！

也许，我会由于他对我的温存和尊敬加倍地感激他、敬爱他，不管发现他今后有多大缺点，想到这第一夜、第二

夜……我都会加倍地原谅他。

……突然，一只大脚踩在我身边的被子上，我从幻想中睁开了眼睛。那是穿四十六号鞋的大脚，真大得吓人！我胆怯地抬眼向上望去，他——这一米八的大个子，正站在炕上脱衣服，距离我幻想中的君子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不由闭了眼睛，缩缩脖子，裹紧了棉被，心里象块铁板一样凉飕飕的。

只感到他用大手轻轻一撩，就钻进了这大被窝。那冰冷的大脚，硬邦邦的腿骨碰得我身上发痛。美好的幻想象点燃的鞭炮一样破碎得四散而飞。我躺在那儿，活象一个恐惧的木偶，一条将被宰杀的鱼。人生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痛苦！

这是梦吗？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噩梦，这样的怪梦，可怕呵！……痛苦的事给人印象最深。后来我多次回想起这场噩梦，总是马上就把它丢开，用各种各样的幻想来转移自己的思路。想那秋天飞在蓝蓝的天空上的大雁，想那春天开遍原野的鲜花，想那小河清清的流水，想小时候在母亲怀里撒娇的情景。

如果人生也能象我的思想一样，能够用美好的幻想来代替丑恶的现实，那该是多好呵！

我这才懂得，旧时代那些出卖肉体的妇女，那些屈服于暴力下的妇女，那些受尽主人侮辱的妇女，那些不被人当作人的妇女，是多么痛苦！可是我的痛苦是我自己找来的呀！……难道真是我找来的吗？难道为了活命就非受这样

的苦不可吗？难道我从小不是一样的受父母、老师和同学们的疼爱吗？难道新社会没有用温暖的手抚摸过我吗？为什么世界突然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这才懂得，哥哥为什么不惜一死，他是想阻止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变坏呀！

……还未等我想过味儿来，他全身的重量已压在了我的身上，两只粗硬的大手将我的头紧紧把住……我拚命地想别转脸去，可是怎样也无法躲过。

……难道结婚就是这个样子？我宁肯死，也决不愿意！想到这儿，我浑身的血液似乎在往上涌——这可诅咒的新婚之夜呵！我迅速打开箱盖，嗖地抽出一把剪刀（那剪刀本是新买来准备做衣服用的），那锋利的剪刃在银白的月光下狰狞地闪着青光。我一个箭步窜上炕，右手紧握剪刀，威逼地盯着他，一字一板地说道：

"告诉你，志国，如果你今后胆敢再动我一根毫毛，我不要了你的命！我宁肯去偿命，也不叫你活！你看着！"

他惊骇地嘴张得更大了，愣愣地望着我从他身边拉走棉被褥，铺到炕梢去。半天，他才象透过气来似的，从嗓子眼里惶惑地咕噜出一句：

"……我怎么了？……怪性格！"

我把剪子塞在枕下——从今起，它将永远陪伴我了！我用棉被将自己连头带脚蒙了起来，只感到在炕头上躺着一个浑身长满黑毛的大猩猩，连他的呼吸也不愿意听。脑子里乱得象一团麻，不知该先想什么、后想什么，哪一根也理不出头绪来，一丝睡意也没有……

很久，仿佛一切才静了下去。那个“大猩猩”似乎也睡熟了。我慢慢地撩开被坐了起来。就着满屋月光的清辉，厌恶地瞥了他一眼；他那睡梦中微张的嘴仍使我恶心，他的睡容中仍含着惊惧和不解。我赶紧把脸转向窗外，望去、望去……

月亮！难道，这就是你给我的幸福吗？

他懂得什么是爱情？什么也不懂！我赠给他的回答只能是剪子——如果我还想活的话。这一夜是我们结合的内容，也是我们分离的起始……我永远不承认他是我的丈夫，也永远不想做他的妻子。今后怎么过？明天真的离开他？到哪儿去？弟弟们的户口还没办好，爸爸还在北京受着罪，妈妈也正忍着失去儿子的痛苦带病上班，象我一样在生活线上挣扎，姥姥已奄奄一息了……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完成呵！只要想想我到北大荒来是为了什么！……

从我三岁上幼儿园起，老师就告诉我们，口腔是传染病和繁殖细菌的温床。深深记得五岁时爸爸亲了亲我的脸蛋，有一星星唾沫沾在脸上，我迫不及待地到了里屋，用湿毛巾擦呀擦呀，心里既生气，又怕爸爸看见会不好意思……我只知嘴巴是用来吃饭、说话和唱歌的。进教养所，才知也能骂人用，而且那些词汇在《世界大词典》里简直找不到。虽然从小说里知道嘴巴可用来亲吻，但毫没想到是这种方式！

爱情在志国这里变成了什么？在他——兽欲代替了爱情，粗鲁代替了温柔，庸俗代替了高尚。而这一切恼恨的根

源，并非是志国，而是自己找到北大荒的门上来的！我只有恨自己、厌恶自己，还有什么可怨？

月亮！难道我们的社会没有一丝责任？我们在性知识方面完全象个傻子！连个思想准备都没有！我们在这方面天真的程度简直与我们的年龄不符！有多少女孩子必定都和我一样可怜！难道，这不应当作为一门知识教与我们吗？

记得母亲说过，日本早已设立了一些专门为未婚女子办的学校，告诉她们成立家庭后的一切常识。没有毕业证书是不能结婚的——这有什么不好呢？可我们无论从父母还是学校那里，都是一无所知。仿佛一提"性"字，就多么见不得人，大逆不道似的。既然每个女子人人必须有这一天，难道这一夜的知识必须是隐晦的、保密的、让各色各样的男人按照他们自己的五花八门式的方式教给我们的？

难道就不能有更正当一些、更使我们愉快一些的方式？难道就不能一提起那一夜，我们不为男人脸红、感到庸俗，而是幸福地说出他的温柔和高尚？

不用说中国解放后从没有过"性教育"，就连平常的教育、人们所需要的精神生活又何尝够用？

再想想自己，认识自己吧。在河北时，我曾以嫁给谁都行当做寻找富余生活的条件。而今天通过拿剪子这一举止，才知道心灵中要求的精神生活是抹不掉的。那么当初又为什么自欺、又要欺人？

如果志国不被这剪子吓住，又会怎样？真令人后怕

呵……

八 知 己

从这儿以后，和维盈的交往呵，真使我愉快！他一星期至少来一次，有时两次。我对他说，可以不必这么勤，多干点正事，一星期来一次满好。

可是他却常说："忍不住，又来了！"

有时他来，我正在写着，他不去打扰我，不出声息的在旁边看报，一直到我停下笔；有时我正在喂猪，他远远一来，我便高兴得蹦三尺高，猪吓跑了，维盈直笑……那时我们的笑声在无垠的原野上飞翔——多么好听的音乐呵！有时我正在洗衣裳，他帮我洗……谁也不知道，在这可爱的冬闲里，我爱上一个朋友呵。

可是这种爱，只是知己的爱，朋友的爱，倘若他是个女的，我也会同样爱她，程度和愉快的心情不会减分毫——说实在的，我倒真希望他是个女的呢！也许那样我们来往会更随便、更频繁。我们一见面，总有许多话说不完，即使沉默着，也好象是一种语言——融洽的语言。每次都没有聊够就分手了，总盼着下一次再见——知己，真是人生最大的乐事呵！

我想，即使我一辈子没有爱人，也可以了。有这样一位知心朋友，你的一切心里话都可以告诉他；你的一切烦恼、忧伤都可以叫他分担；你的一切快乐、欢欣都愿让他共同分

享，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没有任何利己的、损人的念头——这种友谊，是多么崇高、使人幸福！

仿佛我有了第二次生命，第一次觉得我是活着；第一次觉得我是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唤起了我在美术学校那朝气蓬勃的生活。不，比那幸福得多，那时，我只是压抑自己的感情，甚至用冷淡做为装饰自己的外衣。现在，我觉得那真是又蠢又傻！为什么要装呢？该怎样就怎样好了！我的心象关不住闸的水，奔流着、奔流着，把我的一切愉快和幻想，把我对一切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写在"儿童"诗里。我买了一个本子，打算写一本诗集，送给维盈。

在这天蓝色封皮的本子里，第一首写什么呢？首先我不应当忘记哥哥，第一首我必须要写哥哥。于是我写了一篇叙事诗，叫《哥哥的小屋》——通过他那小屋，写出他一生的历程，结尾是：

……就在那被捕的一天，
《工资论》还没有写完；
桌上摊开的日记，
还记着昨天的誓言：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他再也没活着回来，
因为他不认错，拒不交代；

他受尽两年多的折磨，
终于到临死的这天。

蓝天、白云、上万的人，
壮观的体育场，
这就是他——
大学毕业的盛典。

他是多么杰出的学生，
值得有这壮观的场面！
他交出了第一篇论文，
光华灿烂——
然而代价必须是
他的头颅。

拿去吧！
他大笑着。
宁可付出这代价，
也决不屈辱地生存。

他——
在人间的大学毕业了。
蓝天、白云、上万的人，
壮观的体育场，

这就是他大学毕业的盛典。

…………

小屋的灯光灭了？
不，它还在朦胧地放光；
小屋的灯光灭了？
不，它仍是深夜的导航……
小屋的灯光灭了？
不，它仍辉映着人们的心房；
那火炬何曾灭掉？
它明明分外红亮！

每逢我走进院内，
仍是深情地凝望；
寂静、深沉的黑夜，
桔黄、黯淡的灯光。

每逢我走进院内，
仍是深情的凝望；
寂静、深沉的黑夜，
　桔黄
　　黯淡的
　　　　灯光……

第二首写谁呢？还想写哥哥。许多往事，都成了叙事

诗，在我的笔下涌出。《哥哥的眼睛》、《画像》……这些诗的旋律是谁给我的？我从没觉得我会成为"诗人"，然而，给我振奋和力量的，正是维盈。

写完哥哥，又写了一首长诗《母亲》——妈妈的一生，她那特殊的性格。这些诗，维盈每次看完以后，都沉浸在感情的波涛里。好象，他和我有相同的体会呢！

生活里到处都是诗，那些幻想诗，全是送给维盈的。我幻想着五、六月份当海棠花盛开的时候……

五月的鲜花遍开，
四季中最好的时辰；
满树繁密的花朵，
象思念朋友的心。

可爱坦阔的原野，
五彩的野花缤纷；
阵阵扑怀的清气，
象思念朋友的心。

我在草原上奔跑，
寻访于百花芳群；
找出最美的花朵，
让我的朋友闻闻。

每当我下地窖去看我的那箱蜂时，想到春天它们将

飞出来采蜜，到冬天就能分出三箱蜂，我的心哪，便又涌出了诗。

我总想象有那么一天，
蜜蜂引我到你的乐园；
它们嗡嗡快乐地引路，
说我是它们久盼的伙伴。

蔚蓝的天空为我照镜，
轻柔的白云为我洗面；
山谷的太阳向我微笑，
温和的春风问我平安！

斑斓的野花向我点头，
我弯腰吻它们可爱的笑脸；
绿色的园田向我招手，
叫我去梳碧绿的发辫……

你高兴地从草屋跑出，
欢乐的河水为我们奔流；
你高兴地从小屋跑出，
我带来的礼物是勤劳的双手。

白天我们愉快地劳动，

象蜜蜂一样不知道忧愁；
夜晚享受蓝天的诗意，
还有星星、月亮的明眸……

这首诗维盈看了忒高兴——我们也仅仅是高兴而已。我们把那幻想的生活仅仅当成诗，从没想过能成为真的。

“这幻想能成为真的吗？”——我们从没说过一句这样的话。甚至这些诗，我想，他将来的爱人也可以看，说不定会和我们一样高兴呢。

我到他那儿去过两次，发现他是一个很会料理生活的人。炕热乎乎的，屋子明亮干净，总之，他给自己的“小窝”弄得很舒服，这是一个会生活的人。

那天，我一眼瞥见他的枕套破了，没说什么，就去商店买了三尺浅粉色的布，又买了些丝线，给他绣了一个枕套。又给他做了一副灯心绒面的棉手套，真巧，那枕套和手套正合适！为这合适，我高兴地作了一首诗：

愿你安睡在甜甜的枕上，
驾梦神的翅膀在云天飞翔；
你穿过清风越过小溪，
飞到你想念的朋友身旁。

在那儿我日夜将你思念，
在那儿我盼望骄阳快出现；
苍郁的树木发出浓香，

花草和小鸟都齐声欢唱。

忽然你飞到了我的身旁，
送给我晨雾做成的衣裳；
你摘下早霞给我做头巾，
闪烁的露珠镶缀成花样……

这天，他把我送得很远，几乎走了十里地。土道两旁是高高的白杨树，他感叹地说："夏天在这儿散步多美呵。"

"回去吧，"我又一次说。

"不，我再送你一程，"他忽然调皮地笑道："你别打扰我好吗？什么时候我不想送你，我自己会说的。"

"好吧，"我笑道："送我二十里地才高兴呢。"

"你想知道我们家的事吗？"过了会儿他问道。

"怎么不想？"

"这些事，我从不愿意告诉别人，我们青年点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吞吞吐吐地说道。

我好奇地等着他说下去。

"我和维力并不是亲兄弟。"

"真的？"

"是一个父亲两个母亲。"他又补充一句："他母亲是我二姨。"

"你父亲为什么被镇压？是反革命吗？"

"不，他是人贩子。专买卖无辜的女孩子。我父亲一下

子就看中了我母亲和二姨，把她们霸占了。我母亲十岁没了父母，一个亲人也没有。我父亲五〇年被镇压，是罪有应得。”

“那么，你们都住在一起？”

“一直住在一起的，老姐妹俩相依为命。多少朋友劝她们改嫁，那样生活也许会好一些，可是她们总怕我们万一受后父的气。我母亲一直没工作，在家操持家务，全靠我二姨教书维持生活。她是小学一级教师，工资八十多元。可是……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的时候，小学生们斗她，把她打死了……”

好一阵我们都没说话。

“我母亲原来漆黑的头发现在全成了银白，一根黑的也找不到了，心绪不好，弄了一身的病……”

他走后，我总回想着这些话。他的母亲是位可尊敬的人，操劳了一生，多不容易！他爱他的母亲。如果说他的母亲变得很胆小，那也是生活的艰辛造成的呀！我写了一首《母亲的白发》送给了维盈，他高兴地说，他一定寄给他母亲，并且告诉她作者是谁。

“也好，”我笑道：“顺便问候维兰一声，我还挺想她呢！”

母亲的白发！哪个母亲没有这些白发呢？

满树的繁花象是雪团，
沁人的清香飘入云天；
五月的梨花再白、再美，

美不过母亲白发斑斑。

巍巍的高山冰雪晶莹，
凛冽的寒气袭进心胸；
巍峨壮丽的连绵雪峰，
寒不过母亲白发飘零。

悠悠的蓝天柔云在翔舞，
丰采地变换雪白的裙衫；
美妙的舞姿千奇百变，
多不过母亲头上的银线。

阳光把一切都赋予这大地。
迢迢的莽原望不到边际；
看见雪原就想起家乡，
想起母亲白发苍苍。

闪闪的水波泛出银光，
跳动的波纹象鱼儿的衣裳；
小河潺潺地轻轻低语，
又忆起母亲慈祥的面庞。

月亮洒出银色的光环，
抚照着远方熟睡的脸蛋；

静谧的月光笼罩着亲人，
母亲的白发饱含着思念。

无论是梨花、冰雪，
还是那白云、光环；
它们都没有魂灵，
决无历史的辛酸！

母亲的每一根白发，
都有它深切的衷情；
想想无数根白发，
该有多少个故事可听！

生活象蜜一样灌进了我的心，多美、多好呵——生活！

九　月　夜

三月底，志国从北京回来了，听我说认识了维盈，心里虽不太乐意，嘴上又不好意思反对。维盈仍象以前一样常来，志国每次见了，虽然很热情，但每次他走，他都骂骂咧咧："咱们的豆油给他们吃？我心疼！"或说："这号人来干嘛？不说在自己家好好呆着！"

我苦恼地想，能说志国不对吗？就算他有涵养，不骂骂咧咧，他也不会高兴的。因为他爱我呀。事情就怕反过来

想，我处在他的境地，我也不会高兴——自己最爱的人对别人比对自己还热情，谁会高兴呢？这不是忌妒，这是人之常情。看起来，如果维盈也有爱人，她见了我的"儿童诗"，也不会高兴，过去我的想法，不过是自欺罢了。

我多希望，自己法律上的爱人，在自己眼里，是最可爱的呀。如果这样，就不会给爱人任何苦恼了。

在认识维盈之前，我曾和志国提过离婚。但一想到孩子不能割舍，而志国又非要不可，离婚的事就拖了下来。现在，我只好悲哀地想，维盈偏偏是个男的，真不幸！不叫他来？我又想念他；叫他来？志国又多心，又不高兴。就算我们没有孩子，早已离了婚，维盈也不见得不结婚，他的爱人也许会象志国一样……唉！他要是个女的，一切麻烦都没了！这苦恼似乎无法解决。

四月中旬，两个弟弟、几位社员和志国经生产队同意，要去北山里放一次木排，与旗物资局签订了合同。

我也非要去不可。除了志国，大家全说："从没有女的去山里放排的。到那儿你能干什么？"

"我可以做饭、看家呀！"

我一再要求、要求，而后来他们居然同意了。为什么呢？这不妨用弟弟的话说明：

"也好。真要和志国分开半年，说不定你们的感情更糟糕。换个环境呢，倒许好了——我们是因为这才同意的。"

真好笑，他们真不了解我！难道，我的爱情会决定在距离和空间上吗？我和志国在一个炕上，从没有一天这颗心

是属于他的；而我所以要到大森林里去生活半年，正是想要写一本《放排记》，送给我心爱的维盈呀！

后天就要走了，无论如何必须去告诉维盈一声——这几天他没来，还不知道呢。

一路上走着，我的心哪，象小鸟在春天的风中唱着歌……每次我到他那儿去，都高兴得象过节一样。我想过和他在一起生活吗？那些诗里早已写过了，但我从没认为能成为真的，因为我不配。他完全能找一个比我更好的人——想到这儿我悲哀吗？似乎只有一点点。他总是要成家的呀！我甚至不止一次地想过，他征询地问我他未来那女朋友好不好时，我会用我生活过的眼光如实地告诉他我对她的印象和了解、她的优缺点。我希望他能幸福，不要象我一样使婚姻成为悲剧。我永远想把他当做知心朋友，我对他什么也不隐讳，只要想什么就说什么，把我的快乐、苦恼、幻想……一切思想都寄托在那儿，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都希望让他和我一起分担，他是我思想的大仓库。只要他乐意保存我那些思想，能够互相尊重、互相信赖、互相提高，我就感激不尽了。

世上能有一知己，多不容易呵！

快走到他的村子时，我的心不安地跳了起来——可别不在家？

啊，高兴地看到他的门前晾着还滴水的衣服，晒着里子雪白的棉袄，他一定在家！望了一眼那干净的棉被，我不由

想，和他共盖一条棉被的人该多么幸福呵。

“维盈！”

我在窗外唤了一声，没人应，便推门走了进去。

一看，原来他才洗罢衣服，还挽着袖口，靠墙坐在炕沿上，正翻着我写的诗和回忆片断呢。他听见脚步声，一扭头看见了我，惊喜地道：

“你怎么来了？”

“我叫你，你没听见？”

“我……看得太专心了。”

“你真爱看？”

“真的。”

“那算我没白写，”我笑道：“能遇见你这么一个爱看的人。”

他把本子收在箱子里，锁上。又从另一只小箱里拿出巧克力糖和蜜饯，冲了碗可可粉，端到我面前。

“你太讲究了，”我不满地说道：“你家条件并不宽裕呀。”

“我有什么办法？”他温和地笑道：“这又不是我要的，我母亲老这样。”

“应当报喜不报忧才对，为什么老叫她这么惦记呢？”

“昨天还接到她一封信呢，都什么时候了，还叫我回北京呢。你看看就知道了。”

他微笑着把信递给了我，我打开看到：

盈儿：冬天为什么不回北京？力力回来说，因为你没有路费。我给你寄去了三十元，一直盼着，可是直到如今，春节早过了，还

不见你回来！我真怕你在冰天雪地里病倒。最近我神经衰弱的老病又厉害了，每天夜里两三点钟就醒，一醒准是想起你，再也睡不着。做儿子的什么时候能体谅母亲的心情就好了！哪怕你回来住上几天，我也好放心。回来吧，六七月份再回去也不迟，不然你那儿也没青菜吃。

又：咱家绣球开了，粉红色的，可爱极了。文竹又窜出三根嫩绿的莛。回来住些天吧！前两封信收到了吗？

妈妈　七四年×月×日

"那两封信也是同样内容？"

"比这还邪唬呢！"

"母亲的爱多不一样！"我感叹道："象我母亲那种大气量的爱真不多见，可是我倒认为也很好，倒把我们锻炼出来了。"

"你以为我喜欢我母亲这样疼我们？"他轻轻笑了，摇了摇头："在家里，她连茶水都不让我们自己倒，都要她去做她才高兴。弄得我们也腻烦。每次回北大荒，她都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其实有什么用？哭不是也得走吗？"

我不由想，他们真象温室的花呵……

"书归正传吧，我今天是来向你辞行的。"

"辞行？"

"就要放排去了，半年才回来。"

"半年？"他惊讶地望着我。

"当然，半年。多好哇，维盈！"我高兴地说："我回来给你带一本好书，《放排记》，你看怎么样？你想不想看？"

“想，想呵！”他茫然地点着头。

“一晃就会回来的。昨晚上，躺在被窝里，我连跋都写好了呢！给你，”我把那首诗递给他：“放到我那本子里吧。”

他拿过去刚看了两眼，我又夺过来，笑道：“来，我给你朗诵吧，好吗？”

“好。”

“《放排去》。”我有声有色地背诵起来：

我将爱情悄悄地带走，
奔赴遥遥的北方；
我把渴望暗暗地匿藏，
驱往莽莽的林乡。

荆棘、坎坷和刺丛，
决不是舒适的天堂；
潮湿的冷风吹进篷帐，
抚慰疲劳的心房。

然而我却勇往直前，
是那爱情的力量；
热爱自然、渴慕森林，
终不流连在梦乡。

我愿体会森林的雄厚，

和那蕴藏的力量；
我愿倾听森林的沉默，
别人不晓的乐章。

我愿在那苍苍的林海，
陶醉于松涛的低唱；
我愿步入晨曦的雾中，
裹上白纱的衣裳……

我愿踩踏松软的落叶，
欢乐、欣喜地跳跃；
我愿饱闻清馨的空气，
忘掉忧思和疲劳。

我爱看那丰采的阳光，
自由地将森林照耀；
静听鸟雀动人的歌声，
欣赏野花的笑貌。

我愿拨开丛丛的杂草，
寻觅蘑菇的软帽；
在那潮润、霏霏的雨天，
喜遇木耳的窝巢。

我爱看那暴雨和闪电，
强劲地劈进林间；
更愿看那呼啸的山林，
抖擞地抵挡雨箭。

我愿走那林中的小径，
幽远得引人神往；
凝望安详、慈爱的满月，
洒下神秘的银光。

我爱迎接起床的朝阳，
羞红层层的绿叶；
尤爱深夜闪烁的繁星，
亲吻参天的松杨。

夜晚听那森林的低语，
悲沉诉怨地歌唱；
告知白云心底的秘密，
托它飞往异乡……

“什么秘密呢？”维盈笑问。

“秘密吗，就是我想不想你，你一看白云就知道了。”

“怎么讲？”

“如果今天的云特别美，那一定是分外想你——”

“如果是阴天，那一定是不想了。我的幸福都决定在天气上，呜呼！”

“哈哈哈！”我笑得前仰后合。

他坚持叫我吃完晚饭回去。

“我帮你做吧。”我卷起袖口去洗手，发现自己的指甲已该剪了。

“你有指甲刀么？”

“有三个呢。”他拉出桌子上的小抽屉挑起来，找出一把最好的，说道：“送给你吧。”

我接过来。

“来，我给你剪剪吧。”说这话时，他象鼓了很足的勇气，然而又那么当机立断。他就没想万一我会不同意呢？

“好吧。”我高兴地把手伸过去——我怎能不同意！

我们坐在炕沿上，他轻轻地捏着我的手指，一下一下地剪着。幸福的心情伴随着钟表的滴嗒声，传遍了我的全身。我从没这么幸福过！我多希望时间慢一点走，多希望他老这么剪下去呀！而他的额头几乎挨着我的头发，他的呼吸和我的呼吸无比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从他温爱的、默然不语的神情中，我体会到他同样幸福、复杂的心情……

“你的手怎这么凉？”他已经剪完了，又将他那热乎乎的手握住我的手，温柔地问道。

“嗯，”我有些郁闷地低下头去：“想哥哥想的。”

他不禁轻轻地笑了，好象并不相信这理由的存在。其实他怎么知道，在我得浮肿病之前手脚从来不爱凉，而这浮

种病确实因为那次提审，使审讯员大为恼火，过后为哥哥担惊受怕得的呢！

“来，我给你焐焐吧。”他温存地握住我的双手，那暖暖的热气似乎在包着一块冰坨，而这有知觉的冰坨却心甘情愿地溶化了、溶化了……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幸福，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温情……然而这幸福是真正的吗？不，我的身后还有丈夫，还有孩子，那两个人象在黑暗中正站在身后指责我，说我轻浮放荡……这温情能长久吗？不，做为有夫之妇，我是不应当、也不配接受这种温情的。

我悄悄地望了他一眼，他一直没望着我，而满腹思绪地凝视着身边的桌面。那神情，说不清是幸福、是回忆、还是感情在心底里奔流……或许，他就希望这样坐上三个钟头？假如我现在是他的爱人，又何尝不想坐上六个钟头呢？也许那时还会撒娇地说：“不，我的手还没暖和呢！”

手已经暖和了，并没辜负他的好意。何况不暖和，我也应当抽出来了。亲昵的举止应该走在了解的后面，而不应当相反，否则就是轻浮。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免除不必要的烦恼和不安，才能促进双方更好地了解。

“好了，”我抽出手，高兴地说：“暖和了。你的手真象个小火炉呵。”

他只是温文地苦笑了一下，并没有说什么。似乎他觉得我这个人太不懂得享受“感情”呢。而我就装出毫不在意的“野小子”神情，催促他做起饭来。

晚饭后我该回去了，虽然说这话时心里是多么恋恋不

舍呵！

“我送你一程，”他立即戴上棉帽子。

我们走出屋子。呵，满天星斗，在天边俏皮地闪着光。多好的夜啊！初春的晚风擦过树梢，奏起一阵轻微的沙沙音。夜，宁静得象个睡熟的婴儿。

家家都在吃晚饭，村子里没有一个人走动。只有远处的一两声汪汪的狗叫，表明它们在忠实地执行着守卫的任务。炊烟里夹杂着隐隐的饭香，飘荡在肃穆宁静的夜色里，使人感到浓重的生活气息……多美呵，我不禁快慰地深吸了一口气。

“多好呵，维盈！”我们顺着月光映照的土道向前走去：“你想过吗？等有一天，我们都老了，头发白了，胡子白了，就象你母亲一样年纪的时候，我们还能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放排时给我们的一切新鲜感受吗？我不善于思索，不爱钻研理论书，只是凭着直觉活在这世界上。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是！永远凭着第一感觉认识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也许，我象个儿童，但却愿意永远怀着童心，不抱成见地看待社会，永远乐观地对待生活！那时候，我们都老了，除了记得森林里蚊子和瞎蠓有火柴盒那么大，除了记得林子里又潮又闷、小咬儿一个劲儿往头发里钻、许久吃不到青菜以外，谁又能记住，当第一棵大树倒下时，我们的心情和想法？谁又能记住，当我们搭帐篷、安营扎寨时所说的话？谁又能记住，我们为富裕生活付出努力时那一点一滴的感想？这些就是生活！就是作家应当描写

的东西，真实而富有生气的东西！决不应当让那些只会骗稿费、连作者自己也不相信的胡说八道充斥我们的文坛！我们要告诉人们应当怎样生活，我们要让人们知道这富饶的国家是多么美丽、可爱和神圣！人们就是这样流着汗水创造着、憧憬着，脚踏实地地生活着、奋斗着，国家也正是这样才前进着！多好呀，维盈，到那时候，谁也记不清了的时候，打开这本《放排记》——它一定早已出版了；人们才知道，文字是永远不会老、永远年轻的呀！"我高兴得一下子握住了他的胳膊。

维盈的心被我的兴奋卷走了，他一下子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刚才的举动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呵……

虽然隔着厚厚的棉衣，但仍感到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他搂得那么紧，使我呼吸都有些困难，同时又感到好奇——文质彬彬、弱不禁风的维盈竟有这么大的劲儿吗？

"过来。"这命令而温和的口气听起来那么新奇、陌生而又使人幸福。他把我轻轻一拉，靠在齐腰高的矮墙上——那些关里的农民闯关东找零活做的业绩。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已走到村边的场院了。

我们紧紧地依偎着，一声不响。我把头轻轻埋在他那微敞的棉衣领子里，感到一股从没闻过的暖暖的香味儿。

"你身上的味儿，多好闻呀，"我抬起头，悄声地醉心地说。

他只是轻轻地一笑，而这笑声，真是暖人心怀！

他紧紧地搂着我，轻轻地亲吻我的额头、眼睛、眉毛、嘴——真是有趣的、令人舒服的亲吻！他那抿闭的嘴唇似乎带着兰花的香气，不干不湿、不脏不俗，这真是我接受过令人厌烦的不卫生式的亲吻后，最希望、最理想的亲吻了！

“多美，你的眼睛，多美！”他出神地端详着，热烈、温柔地亲吻它们。

我不禁笑出声来。这时，我才觉出，他的身材比我还高出一块呢。慈祥的月光照着他那微白的面庞，觉得他可爱极了……

“你最好。”我真心地说道。

他只是温存地用手抚摸我的头发，关切地问道：

“冷吗？”

不等我说话，他便把棉外衣的扣子解开，里面只穿着毛衣和棉背心，连声说道：“放进去放进去放进去。”这嚓嚓嚓嚓的一连串齿声，象许多细小的珠子落在瓷盘上，真是动听和有趣！我不禁失声笑道：

“你说话的声音多好听啊！”

他并不搭话，只是把我的两臂拉进他的怀里，全用棉衣包了起来。

“你该冷了。”我担心地道。

“不，不冷，”他伸出一只手摸摸我的面颊：“你看，我的手老是热的。”

他身上那暖暖的热气烘着我，象个火炉，真舒服啊……

万籁俱寂。只有无数的星斗在深蓝的大海闪着神秘的光。柔和的月亮慈爱地照着这两个年轻人，又时时躲到莲花般的云朵后面，似乎怕妨碍他们……好心懂事的月亮！我曾多么盼望你能给我幸福，你还记得，你没忘记我的希望……这一丝声息也没有的苍穹，这世界和大地，仿佛都是我们的；只有远远的灯火和天上的星海相辉映——肃静而神秘的夜呵！

在这万籁俱寂中，我仿佛听到大地的歌唱，好象有成千上万个一模一样的哥哥，在地底哼出轻婉、优美、动人的歌……似乎在祝福我，祝福我获得第一个爱人，祝福我获得真正的爱情。这隐约、动人的歌声使我无限欣慰，又涌起说不清的悲哀。

即使在这最陶醉的时刻，我也没有忘记提醒自己：他爱我什么呢？他真的爱我？我真值得他爱？我配吗？这感情能是永远的吗？他真想和我永不分开？……

"你爱我什么呢？"我抬起头，轻轻地问道。两眼望着他，好象从他的外貌才能看透心里似的。

"什么都爱。"简洁、庄重而诚恳，一丝虚情假意也没有。

"我不会思考，特别笨。"

"连你的笨也爱。"

这奇怪的爱不禁使我笑了起来。

"我有丈夫、有孩子，这是违法的。"我忧心忡忡地说。

"你最好。"好象这话使他感到格外痛苦，他的脸色显得更为苍白，那纯洁的面容罩上一层悲苦的颜色，他似乎不希

望我再望着他，怜爱地搂过我的脖颈，挨在他的肩上，不知怎样表达他的爱。

“我不配你，”而我的心就在矛盾和哀愁中挣扎，盼望着能与他和谐一致，然而却又不得不说：“你完全可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人……真的，维盈，我不配你。”

“谁也没有你好。我再不会遇见比你更好心的人了。”他那发自内心的语气深深感动了我，虽然我并不承认自己的心有多么好，却多愿意相信他的话是真的呀。

“我有浮肿病，活不太长。”我想把自己的毛病说出来。

“我侍候你，一直到死。”

“我一辈子也不想再生孩子，实在够了。”

“就咱们两个人。”

无声的热泪淌在他那温暖的脖子上……我的眼泪唰唰地流着，然而却不愿意做出一点声音来，仿佛这寂静就是哥哥、地母和天父给我唱的最好的歌，我一点也不想破坏它。我只想把一切委屈、心酸和苦楚都在这时发泄个够，让它们统统地随着我的眼泪流出去……而维盈似乎比谁都理解我，他既不劝我，也不说话，只是用面颊温柔怜爱地蹭我额前的头发……直到我觉得哭痛快了，眼泪流够了，才觉得心里干净了，说不出的安宁与轻松。那眼泪象是爱的洗礼，它把我那“再也不会干净”的泥人完全冲洗干净了。而这正是他，我心爱的维盈给我的。我想用怎样的爱来回报他呵！我一声不响地望着墨黑深邃的大地，望着朦胧遥远的天边、闪

闪的灯火和星海，静听大地里哥哥们祝福的歌声。我无力地靠在维盈的怀里，每一根毛细血管都充溢着无限的幸福和满足。

“你在想什么？”他柔声问道。

“什么也没想，”我一动不动地悄悄回答：“我只觉得，太好了。”

我看看他，他正深情地望着我，一言不发……朦胧的月光照着他那可爱的面庞，照着他那水晶般的白玻璃眼镜框，多美呵……

我多想一直和他这样到天亮！他一定也想。可是，我不能，我还是有夫之妇呢！如果我想天天让他搂着我，每天晚上呼吸沁人心脾的夜气，如此欣赏着月亮和星星，那么，我就应当争取光明正大地和他在一起的那天！

是的，我愿意光明正大地做他的妻子，而不愿意背着丈夫干偷鸡摸狗的事。尽管我们今天的感情那么纯真，尽管我们的举止没有什么歪的斜的，尽管我们的爱情有着那么多的合理和必然性，然而只要在法律上我还有位丈夫，我就没有资格这样做。严格地说，今晚整个这一幕都是违法的，都是不坦荡的，都是应当敲起警钟的，也应当是最后一次。

让我离婚以后，再有无数次值得留恋的月夜吧！

“该走了。”我留恋地嘘了口长气，将两只暖暖的胳膊抽出来，给他系上棉衣的扣子。

“再待会儿吧，”他微微一歪头，恳求道：“还早呢。”

“不，不早了，太晚回去，不好。”

"我舍不得你。"他握住我系扣子的手。

"如果你真爱我，不愁没有这种时候。就怕到那时，你又该不爱我了。"

"你尽胡说。"好象我的话不值一驳，他只是轻蔑地一笑。我们离开矮墙，向大路走去。

"不要送了。"我拦住道。

"你管不了我。"他的眼中充满调皮和神气的光，这神情是那么有趣！

"好吧，不要送得太远，我一个人走夜路一点儿也不害怕。"

"要是遇见狼呢？二十里呢！"

"遇见狼？那好办，折根路旁的干柳条儿，或捡根木棍预备着，和它拼就是了。"

"遇见坏人呢？"

"人比狼好对付，人懂道理，可以用道理把他说服。"

"你想得多容易！"他笑道。

"也许就因为容易，才没遇见过坏人和狼呢。"

我走在他前面，沐浴着月光的清辉，高兴得蹦呵、跳呵，停下来亲亲他，一会儿又唱起来，在这黝黑的原野里，在这蜿蜒的土路上，好不快活！好不欢愉！这举止，逗得维盈笑起来，笑得是那么开心！

"回去吧。"我又一次站下来，决断地说。

"快到大坝了，我给你送到大坝上去。"

"不。那，我不走了。"我挑衅地望着他。

他为我这淘气的主意笑了："好，我走。"他望了我一眼，便转身走去……

"罗锦！"

我走了好几十步，忽听背后他亲切地召唤。我奇怪地转过身。

只见他，在暮色中，在一清如洗的月光下，在那高低不平的土路上，蹒跚地快步走来。那可爱的面庞是如此动人，那白玻璃镜框象宝石一样熠熠放光，那棉帽的护耳一高一低，随着步履微微地上下颤动，那向我跑来的可爱神态，就象个天真烂漫的孩子。

"再让我好好看看你！"他站定在我面前，两手搭在我的肩上，目光就象恋枝的小鸟一样，在我的脸上长久流连。

"你看你！"我温和地嗔怪道。

他将我紧紧抱住，热烈而温柔地亲吻我的眼睛、额头和眉毛，那心爱的程度、那感人的神态，使我如置身在云雾之中，一股幸福的暖流，侵蚀了我的全身，我多想让他象抱小娃娃一样地抱起我来，一步也不走，让他一直把我抱到他家里那暖暖的炕上去呀！我多希望在他那干净暖和的棉被底下，他一夜都抱着我，温存地抚爱我呵！

"回去吧，你真不听话。"我假装生气地说。

他深情地凝视着我，象下了很大的决心，一转身快步走去。走了几步，他又回头看我——我立即转身，故意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一定以为我再也不会回过头来了，然而我走了一段路，却悄悄地转过身来，一直目送他远去，遥望他消

失在苍茫的夜色中……

我转身慢慢地向家走去，一路上想着这一夜所有的情景，回想着他给我的所有幸福的感受，不知为什么，心里的暖流渐渐变成了说不出的苦涩与凄寂……

志国睡熟了，我怎能睡得着呢？回想着这一月夜维盈给我的快乐，反而加重了我的负担。从这夜起，我和维盈已经不是一般的朋友了。怎么办？是今后杜绝超出朋友的行为，再退回到朋友的关系上去？不可能。这本来就是感情的自然发展，将来只会更深地发展。我怎么舍得扔掉快乐，却自愿捡起尼姑式的生活呢？人所应当享受的我都想享受，这本来无可非议。任感情自然发展吗？如果我不离婚，就无法发展。我不愿在有丈夫的名义下干出违法的事。那我不仅心里不安，也失了做人的正派。唯一摆在我眼前的任务就是应当离婚。

十　抉　　择

这一夜我来回想着……对于我这腻透了"睡觉"的人，如果维盈有这要求怎么办？在没认识维盈以前，我真希望能遇见那样一个人——我们没有那种事，可是非常相爱。我一直以为，拥抱和卫生式的亲吻就是爱情的顶峰了。可是，维盈这么年轻，没结过婚，怎能不做那样的事呢？我会满足他吗？如果他想要孩子，我这再不想生孩子的人，会给他生儿

育女吗？……

既然我爱他，我就应以他的愉快为自己的愉快，我会学会这样做的，而且会成为习惯，渐渐视为幸福的。我难道会变态吗？不想做贤妻良母吗？是生活把我弄成了这个样子！我多想给维盈无限的温柔，我多想在爱情的感召下，重新变成温顺的小姑娘！

我还用征求维盈的同意才离婚吗？既然有月夜的举止，他就应当要我，这才是正人君子的作风。何况那晚上他说的话不是很明白了吗？

如果我问他——我怎么好问他呢？让他答应同意？他心里该多不忍，会觉得对不起志国。不，我不希望看到他内疚的脸色，他的心太善良了，我不该难为他。我相信他爱我，我也爱他，这不是全够了吗？还要什么允诺？我也想到他的家庭会不会反对，可是我总以为，爱情的力量是能战胜一切困难的。也许他的家不同意，但终究会想通的。何况我想全心全意地爱他的一家，我相信爱的力量！

最难割舍的不是用辛勤的汗水浇灌成的家，不是与我同甘共苦的志国，而是亲生骨肉——唯一的儿子。

虽然他不是爱情的结晶，但有哪一个母亲不疼“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呢？

不用说九个月怀着他怎样在田间劳动，光是生他那天的情景，到死也会清晰如在眼前的。

那天正是阴历八月十四，第二天就是中秋节了。我象往常一样，在自家的园田里劳动了半天，又挑了一缸水。午

饭后，正在洗一盆衣服，肚子一阵阵疼。邻院的大婶闻讯走来说：

"怕是要生啦，我去叫志国，让他快去找接生婆。"

志国从大田里匆匆地赶回来，便去叫村里唯一的接生婆——过去她专门以跳大神为生。

一切临产的卫生器具都没有。离医院三十里地，坐大车去不但危险，也来不及，两位妇女就用她们的土办法接生。

身体的虚弱，使我没有力气把他生下来。两个小时过去了，我真是一点儿力气也没了，真想这样死了算了。那跳大神的老太婆一看情势危急，就拚命用手使劲扯开我的肉，血流了半炕，孩子竟是这样生出来的！

当我在昏迷中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哭——那生命之声时，我一点儿快乐也没有，只有厌烦和恐惧。

后来我终于抑制不住好奇，在昏沉中看了他一眼——脑袋竟是葫芦形！

"不要紧，"接生婆说，"这是生不下来闹的。过半个月就恢复过来啦。我们见得多啦，你这还算顺的呢！"

我躺在炕上，恍惚在梦境中——我受这么大罪去生他，为的什么呢？这小生命，从怀他的第一天起，我有过一点儿快乐吗？如果我所受过的耻辱是无形的，那么，他却是一个有形的纪念品！偏偏给我这么一个有形的东西，让我去抚养他、教育他、为他受累、为他操心……他能给我什么快乐？根本不信！哪一个做母亲的象我这样灰心丧气地去生儿育

女，谁不是有了孩子夫妻感情更深了呢？可是我自己还没有从苦中解放出来，又给我套了个枷锁。我必须去一点点地把他抚养成人，管他是不是爱情的结晶！唉！我长叹了一口气，扭头望望这小生命一眼，此时他正睡着，他的一切都使我觉得那么陌生……命运是多么不公道呵，非让我尝遍所有的滋味不可，哪一关也不能让我躲过去。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呵……

两天过去了。当他的小嘴第一次吸吮我的奶头时，呵，多奇怪，那些厌烦忽然烟消云散了！他那柔嫩蠕动的小嘴，那在母亲怀里安详甜蜜的神态，就象一阵轻和的暖风，吹散了我心里所有的痛苦和烦闷……他天生的会吃东西，那线条优美的小嘴多好玩、多逗人爱呀！真是看一万遍也看不够……我第一次体会到做母亲的骄傲！当奶水象喷泉一样滋到他的脸上、眼上，他急于扭头躲闪时，我笑起来了——太有趣了！我第一次领略母亲对孩子的骨肉之情……那时我才想到，妈妈失去了哥哥——她的大儿子，她一定常想起哥哥小时怎样吸吮奶汁的情景吧，她的心情不绞痛吗？她能克制自己滴泪不掉，需要何等的毅力！那时我才体会到妈妈的心情！

就是这个小生命，现在已经两岁半了。那圆圆的头，稚气的眼睛，白净的皮肤，端正的五官，细声细气的童音，那每天清晨的咿呀学语，听讲故事的专心神气，跳舞的可爱姿态……一切可亲可爱之处，都面临着被我抛弃的危险。我对志国提过不止一次离婚，每次他都说："嗯，孩子我得要。"

而我左思右想，仍是不能割舍。如今，我为什么想同意志国的条件呢？为什么？

一句话，维盈给我的快乐远远胜过孩子所给我的。这快乐当然不全是月夜的快乐，而是他的一切——相貌、性情、人品、甚至连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声音……这些快乐，都是孩子无法给我的。

我以为，孩子小时的幸福是建立在父母感情的基础上的。夫妻感情不好，亲生的也要扔掉；感情好，不是亲生的也会视为亲生的。孩子成人，自有他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并不在父母这里。难道我会等他成人以后再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吗？我多想尝尝快乐生活的滋味呵，我太想尝尝了！何况遇见我爱的而又爱我的人是不容易的，你不珍视他，他同样会失掉。这样的机会不见得会有第二次——人的一生能碰见几个知己呢？能一见钟情几次呢？用孩子去换维盈，我以为很值。

同时我也无法不这样做：一，这是志国的条件；二，孩子从一岁以后就在北京，奶奶、姑姑、叔叔把他视为掌上明珠；三，我的父母早已说过，决不照看我们的下一代——他们觉得养了我们都是得不偿失的事呢！

我只好忍痛抛弃他。没办法，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当我没生过他吧，但愿他长大了遭到生活的坎坷后能理解我吧。

等放排回来我就和志国提出离婚。

四月十号早上，我们坐着三乘大轱辘车一大早就出发了。一路上，志国显得那么高兴，他一定以为，我所以要去，是不愿和他分开才去的。已走到旗里，公社却派人追上来了。说：“公社听说后研究了，这种副业不能搞，上边已经批评过，这是搞资本主义。”

无论怎样交涉，无论旗物资局怎样大为恼火，也拗不过公社的决定。没办法，只好返了回来。

第二天晚上，我诚恳地对志国说：

“我想和你谈谈。”

“谈什么？”

“咱们离婚吧！”

“不离！”

“为什么？”

“当初你落户找到我，现在你一家人都来了，你翅膀硬了，又想离？不离！”

“我的心都让你给打铁了。”

“你凭什么和我没感情？凭什么？！”

“我说了你也不理解呵。”

“就为那一句话？根本就不可能！”

“也许，全部原因在于我不爱你。”

“不爱我为什么又同意和我结婚？”

“为了户口，没办法。”

“哼，你这叫忘恩负义！”

“你骂我有什么用？问题是咱们能不能过下去？”

“问你自己吧！”

“还是离了好。”

“你当我不知道？你有了外心，当然看不上我了！”

“迟早会有外心的。没有张三也会有李四。”

“我真不明白！我哪点儿对你不好？”

“你的优点我都记着。”

“你忘恩负义！”

“你有什么恩呢？你帮我落户，我嫁给你，这不是等价交换吗？”

“那你还要离？”

“我迟早会让你打残废的。”

“我再不打你了！”

“你做不到。”

“孩子……我不要了，给你！”

“一言为定？”

“哼！别不要脸了！我就不明白，你想拆散这个家，你不后悔？”

“不后悔。我想过一种有感情的生活。”

“你凭什么！三年多，我没和你睡过第二次，可是我都忍了，为的是能换取你的感情。嗐！可我得到了什么？”

“怪你没维护好。”

“我再不打你了，锦！”

“再不打我，也和你没感情。一辈子不和你睡觉，你愿意吗？”我在地上慢慢踱着步，望着坐在炕沿上的他，问道。

"愿意！"

啊，万没想到，他会说出这句话来！那向上望着我的恳切的眼神，那圣徒般的目光，使我的心不由得缩紧了。我为他难过！为他三年多没有得到妻子的爱而难过！为他这颗虔诚的心难过！这圣洁哀恳的目光，使我完全忘记了他那恶魔般的打人的姿态，可是我又没法安慰他，更无法使他快活。

"我不愿意。我想过真正有感情的生活。"

"哼！"他忽然恼羞成怒起来："这种生活你是否有过体会？不然，你为什么总有这想法？哼！你在农场，不定跟多少男的睡过！"

我不由打心眼里冷笑起来，揶揄道："既然我是流氓，你还不放我干什么？"

好一阵我们没有说话。

"锦娜，"他突然哀求道："别和我离，你把我引上了正路！"

"正路？"

"我偷过、偷过！可是自从见了你，我和那些狐朋狗友一刀两断了！他们恨我。可是有你，象有了靠山。他们也不和我来往了。锦娜，别和我离！"

我相信他的话是真诚的，也许正是他爱我的基点。可是偏偏在这时候向我剖白，格外使我感动、心酸。但我能因自己的感动去爱他吗？感动和爱并不是一回事啊。

"让咱们象个好朋友似的分开试试吧。如果分开以后，

彼此很想念，那时还可以复婚。我想，一旦复了婚，大概不会再分开了。”

……就这样，我们的谈判在一片哀愁和苦闷中进行，时时夹杂着志国的激愤。一直谈了大半天，总算谈成了。他竟抱着渺茫的复婚的希望同意和我明天去办手续——可怜的人！我们连饭也没做，谁也不想吃，心里都象堵了块大铅坨。

唉！但愿我这辈子再也不要有第二次离婚！去刺伤一个人的心，同时也戳着自己的，这滋味实在太苦了！什么时候，离婚者能避免这一场面对面的谈判，什么时候，离婚不必非要双方同意，只要有一方不再爱对方，给派出所去封信声明一下就行了呢？

夜里，他睡熟了，眉宇间仍带着孩子般的哀求。是的，他今年才二十四岁呵，他不应当在这样的年纪就遭到离婚的痛苦。这痛苦是我给他的。可是……都是我给他的吗？我真的对不起他？我心里不能承认。

还记得新婚第一夜，我怎样在半夜里悄悄爬了起来，痛苦地想着心事，厌恶地瞥了他一眼呵。那时，我除了那一瞥，一眼也不想多看他。今晚，我倒很想多看看他……

我感激他。三年多来他竟没敢动过我一下。虽然他唉声叹气过，虽然他咕噜地骂过，虽然他在白天无数次地打过我。可是，他始终没让我抄起过第二次剪刀。这，也许是出于他的惧怕，也许是出于对我的敬畏，也许是出于自尊心的

作怪——为自己有那种要求而感到羞耻。但不管怎样，我感激他！

回想我们刚一结婚时，什么也没有，完全是白手起家，一滴汗一滴汗地建筑自己的小巢。无论严冬酷夏，还是日晒雨淋，共同忘我地劳动着，买了房子、自行车、手表、照相机、柜子、半导体……以及农村过日子用的一切用具。我们吃得好，穿得也不次，总不缺钱花。这用辛勤汗水浇灌成的家，统统要被我破坏了、拆散了，许多东西只能贱卖掉，各奔自己的营生。将没有这个家了！

回想每次他去旗里或小镇上，回来总要给我买些好吃的。有时他饿着肚子也不吃，非要回来和我一起吃不可……每次他出远门，总要关切地反复叮咛：

“锦娜，别干累活……”

孩子出世后，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他为自己能当爸爸，高兴得几乎一夜未合眼！多少次夜里孩子啼哭，都是他抱起来哄呵！

这一切情意，怎能忘记？然而，这蒸蒸日上的小日子，竟要被我一个人破坏殆尽！孩子没有母亲，丈夫没有妻子，房子将属于买主。散了，完了……而这，都是我爱维盈的结果。不，不能这样说，都是我不爱志国的结果。

我是铁打的心肠吗？我不自责吗？不来回考虑吗？不痛苦吗？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更好的路可以选择呢？！

十一 牺牲所换来的

母亲在这儿住了一阵，便回北京了。大弟弟去山里当木匠，那儿挣钱多，自己找门路去了。小弟非要办困退回北京不可，手续也已办好，尽管爸爸怕回北京受罪，可是也和小弟一起卖了房子和家当，回北京了。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来去的一场变迁，真象是梦呵！

由于我和志国和平离婚的"高姿态"，人们都说是假的。"假离婚"的议论很快传遍了全公社。我倒以为这是对我们的好评——证明这些人只见过吵骂式的离婚罢了！

离完了婚，志国就回北京了。他说要去办病退的手续，叫我看一下房，等他回来再处置，我同意了。三个月了，志国还没回来。而维盈也一直没来，一直没来。

我不想去找他。他早就该听到我离婚的消息，常去串门的同学也一定会告诉他志国回京的事，为什么他不能来看看我呢？这多奇怪呀！我沉住气，想再等一等。这天早上，维力来了。

"你怎么不去了呢？"他一进门就问道。

"哦，我看房子呢。"我不好先打听他哥哥，怕他看出什么来，只盼着他先开口。

"……头两个月，"闲谈中他终于提到："我哥大病了一场，现在才好了。"

"真的?"我惊异地问道。这么说,是我错想了他?我决定去看看他,便骑车和维力一同去了。

呵,果真!他两颊消瘦得很,脸色惨白,两个眼窝深陷了下去。一见我来,显出惶惶不安的神情,只嗫嚅地说了一句:

"哦,你来了?我去老乡家买点鱼,好中午吃。"

半天过去了,他竟始终未露面。无论维力怎么找,也没找到他。维力一边不满地抱怨,一边做饭招待我。我哪有心思吃?只扒了两口,便告辞了。

这一路上,我苦恼得连自行车都蹬不动了……

一到家我便给维盈寄去了一封信:

"维盈:我真不明白。你能告诉我原因吗?哪怕几个字?"

半个月过去了,没有回信。

我的苦恼呵!第一次知道苦恼是什么滋味儿!用三个字来概括——只想死。一个能倾诉的人也没有!守着大院子、空房子,想着能称为亲人的两家人,走的走光,抛的被我抛掉,我犹如海洋中的一片枯叶,不知哪天将被淹没在海底。每天只好对白云、天空、晚霞自言自语……生活象蛆一样地爬着……一切都引起我的伤感。如果说,过去维盈使我在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里都看到了和谐的美,听到了诗的旋律;那么如今,正是那一草一木都给了我伤感!这时我才承认海涅的诗不是故意夸大感情了,这时才记起了他所说的"只有我们同陷泥淖,我们才能成为知己"的深刻含义了!

这时我才相信歌德笔下的维特以自杀殉情不是不可能的事了！……我真想死啊！可是，我究竟没有得到维盈的哪怕一个字的回答。我一定要得到回答。

这天，接到了志国的信：

“锦：虽然离了婚，我还想这样称呼你。咱们的儿子长高了，可爱极了。他奶奶听说咱们离了婚，十分震惊。她说，是否因为孩子不在身边，咱们的感情才疏远了？她想叫我把孩子带来，和你复婚。你还没想通吗？一个人生活行吗？别忘了咱们同甘苦过呀！不要让孩子失去母亲！盼望你能给我来个电报，或来封信。我好决定带不带孩子回去。我的病退手续已办好了北京这方面的，不多日就回去。”

唉！这封信毫没打动我。即使维盈永远不理我，即使我一辈子再不结婚，我也不想和他复婚——新婚第一夜的感受太深了，毒打的印象太深了！何况平时还谈不来。孩子是无辜的，可我又不能单独跟孩子在一起。难道我和这位毫无感情、一想起就觉得屈辱的人过一辈子吗？不。我只希望忘掉他，永远不看到他——连同孩子。

没几天，志国从北京回来了。一进院就一脸的杀气。显然，我的态度使他在北京不定憋着多大的火呢！

“买房的人什么时候交钱？”这只是一句开场白。

“后天。”我紧张地望着他。

“哼！忘恩负义的东西！当初你骗我，说什么跟我复婚，我还信了你的！现在我全明白了！我让——你——离！”

随着咬牙发出的一顿一挫的声音，他便象头狮子猛扑过来。呵，这一顿毒打，我简直没法形容。总之，三年多的怨气、怒气、愤恨，都一古脑发泄在这顿拳打脚踢上了。我挣扎着想走出屋子，结果被他一拳打倒在院子里。

不知过了多会儿，我才从昏迷中醒过来。他早已恨恨地扬长而去。我从地上挣扎着慢慢坐了起来，双手撑着地，半闭着肿胀的眼睛……如果这时志国又大步流星地返来，立意要打死我，我也只好命该如此。挨打对我来说早已成为家常便饭。可是，离了婚以后，我和他已毫无关系，他竟也要毒打我！跟他能有什么道理可讲呢？如果离婚前夜我在月光下望着他熟睡的面庞还有一丝友好的愿望，那么如今，那根友好的游丝彻底让他砸烂了。也好，我就带着今天的记忆永远记住他吧。这记忆是他非要赠给我不可的！然而，却正是我首先欺骗了他，是我！

四周没有人走动，村子里安静得出奇……

如果这时维盈来，我多想和他抱头痛哭一场呵！

如果说我的痛苦深得没边，那就是维盈。

应牺牲的全都牺牲了——志国、孩子、家，能忍受的都忍受了——全公社的议论、不解和一些人的嘲骂……牺牲和痛苦、寄托和希望，都为了什么？都为了能得到维盈的温情！能得到他的心！可是，我只得到了他的软弱和自私！只得到了他的畏怯和远离！只得到了他的无情和冷漠！只得到了他彻底的离弃！

我用力坐直了身子，拍拍身上的土，艰难地站了起来。

进屋一看，闹钟、温度表等小物件，都被志国无理地抄走了。我拿起摔碎在炕上的镜子照了照脸，天哪，脸的右侧全青肿了，好不吓人！肋骨紧邦邦的发痛，撩起裤腿，腿上青一块、紫一块，我不由抚了抚胀疼的肩膀和被扭得不灵活的手腕。

下一步怎么办？自杀？可是，我究竟没有见到维盈，我总要亲自听听原因呵！不得到这个答案死不瞑目。在这儿等着志国再来打我吗？虽然他怕偿命不敢打死我，但打残废却是可能的！即使我去告他，不是也残废了吗？

我必须离开这儿。到哪儿去？唯一能收留我的地方只有青年队——那儿正想发展人。

这一脸的青肿倒帮了我的大忙。我用"房漏，一个人上去修房不小心跌了下来"的理由，博得了他们"一个人生活实在困难"的同情，而顺利地办理了转迁户口的手续。

深秋了。深秋的田野，深秋的风……一路上，我的心也象萧瑟的秋天一样，充满了凉意，凉透了我的心……

罗锦哪罗锦！你真是什锦大杂烩的锦！如今，还有什么没遭遇过、还有什么滋味没尝过呢？

金色的童年那幸福的滋味你尝过了，少年时出身的压力你体验了，美校时学习上的奋斗和努力你做出了，初恋的火花没有燃就熄灭了，文革时"阶级敌人"的帽子你戴上了，……对哥哥的怀念你比谁都深，出卖自己的身体你比谁都踊跃，劳动上你比谁都能吃苦，恋爱的感情你比谁都珍惜，追求爱情你比谁都肯付出代价，而这一切，你得到的又是什么？在旗里，我发了封信：

维盈：

我以为，一个人的痛苦就在于莫名其妙。当一个人完全明白时，即使有天大的悲伤事，他也不会、也不应当苦恼了。"友直、友谅、友多闻"——交朋友的三个原则就这样轻易扔了吗？难道，我们不能直言不讳吗？

也许，我不配做你将来的爱人。我结过婚、有过孩子。我恨自己当初屈服于环境的软弱。但是，男女之间并不都是爱人的关系，做不成爱人，也照样可以做朋友的。我反对那种成不了自己的爱人时就恨对方的自私的人。如果一个人的爱是无私的，他（她）只希望对方好，只希望达到使对方愉快的目的，就决不会因自己的得失去损害对方。愿天下不管是父子母女的爱、夫妻的爱、朋友之间的爱都这样才好。

我希望你明确告诉我：

（1）假如愿意和我做朋友，认为这样对你有益、是个愉快的话，那么，你我尽可以忘掉那个月夜，不必让它成为负担。你照样可以象一般朋友常来青年队作客，那个本子仍保存在你那儿，今后写了什么，我还愿你第一个看它。

（2）假如你再不想理我，也希望告诉我原因，不要让我莫名其妙地苦恼。如果我不知道答案，会一直苦恼下去，难道你愿意吗？如果我们彼此已不能信赖，那么请于后天（十二月二十日）中午一点，我们各自从大坝出发，见面后将本子还给我。它比我的生命还可贵呢。

祝好

罗锦　七四、十二、十八于青年队

十二 结　　尾

中午，沿着大坝的路上……

一夜的积雪尚未踏出一个脚印，只有一辆大车路过的车辙，曲曲弯弯，一直通到遥远的天边，与蔚蓝、明净的天空连成一线。

我趟着厚厚的雪，在大坝下慢慢地、沉缓地走着，不愿登上大坝，不愿早一分钟见到他。但愿他今天不来，或许早已想通，虽然今天白跑一趟，还是有希望的。

莫名其妙！想着原因，不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那月夜曾多么快乐，从此八个月再没见面。或许，有人给他介绍了未婚的姑娘，维盈动心了不成？她没结过婚，比我强？可怜！人们的认识多么肤浅！少女和妇人之间，也只不过一夜之差。这一夜，便是女人们家庭大学的第一课。这一课的感受并不一样；在婚姻自由的时代，绝大多数妇女感到比昨日更甜蜜、幸福、美好，正因此，才有多少作品中歌颂的爱人的温柔、体贴和忠诚！才有多少作品中歌颂的对子女无私的爱和责任感！但是，却也有极少的男人或女人，通过这一课，意外地发现了对方的粗鲁和庸俗，深深感到不幸！对于不幸的人，谁又谅解呢？谁又能说，她（他）虽不幸，但却受到了难得的高等教育，今后会更好地对待生活呢？谁又能说，正是这一夜，使她（他）变得比以前聪明了呢？要知道，书本里并没这些知识呵。庸俗的人却不这么理解，总以为一

个结过婚的不幸者，一定失去许多有光彩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人欣赏的是些什么呵？

如果是这个原因，如果把婚姻的美满仅仅看作对初夜权的占有，我不但会鄙夷他，也会高兴地成全他。

爱是相对的，没有仅仅一方的爱；幸福也是相对的，你不幸福，他也绝对幸福不了。

可惜的是，第一次得到的美好感情，寿命这么短，却非所愿地、意外地失去了！这，谁能不难过、不痛心呢？

这失去意味着什么？是今后会更严肃地对待生活，还是会再拿婚姻当儿戏？我说不清，也无法保证自己……

太阳暖暖地照着，却抵御不住无垠的雪原散发出的辛冷的寒气……

我眯起眼向大坝望去，蜿蜒的、高高的大坝上毫无人影。我已走了约一半路，便站在雪地上，决定在这儿等他。

千里的雪原无一人迹，只有身后那一连串深深的脚印，直通天际。不远是一片茂密的柳条林，遮挡着青年队和远近的村庄。

分明的，远远的，一个小黑点出现在大坝上，越来越大。

那是个年轻人。在蔚蓝的天空和银蛇似的大坝之间，那深蓝的衣服衬托出他苍白的脸。他肩挎旧黄布书包，微仰着头，边走边象在巡视。

难道那健快的步履出自懦弱的人？令人难以相信！那微仰的头、闪闪的白色眼镜和走路的姿式，又令我想起哥哥……

他忽然看见我，便顺着坝的斜坡跑了下来。

我心酸地站在那儿，望着他一手按着书包，蹚着脚下厚厚的积雪一步步走来。他低垂着头，面色苍白，心中象有无限的痛苦，眼皮也不敢抬一下。

他站定在我面前，头垂得更低，两人沉默着。

“书带来了？”

我那事先想好的一肚子话突然都没了，只想出这一句。

“带来了呵。”他嗫嚅地回答。

“给我吧。”我心里难受极了。

“你真要？……”他按住书包，凄楚地望了我一眼，踌躇地不肯拿出来。

“真的。”除此之外，我一句话也想不出来。

终于，他苦闷地打开书包，将厚本子递了过来，那只手明明在发抖，我真想握住那手大哭起来。

“到底为什么，维盈？我不明白！”痛苦和悲哀一齐涌上心头，我极力克制着，生怕他看见我要哭的“洋相”。

“我……”他低垂着头，象有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似的。

“你有朋友了？”

“谁说呀？”他深陷的眼睛焦灼地望了我一眼，急切地表白道：“没，没有的事……”

“我不明白！我再想不出第二个理由！”

他的头更为痛苦地垂了下去，活象个罪人。

“难道，我不想做个贤妻良母吗？”泪水唰地流了出来，我再也抑制不住无比的哀痛和心酸，毫无目的地向前走，他

象个绵羊似地跟在我身后。

“我结过婚，有过孩子，我不配你。”我抹去眼泪，站住，转身望着他说道：“如果你有了朋友，或者不想和我好，我决不恨你。否则就不能说明我爱你。”

“没，没有的事！”

“到底为什么，维盈？”我太想知道答案了！

“我告诉了我母亲，”他不知所措地用手抚弄着书包的角，不安地说道：“我母亲……”

“你母亲，反对？”

他低着头，不答话。

“那，你再不想理我了吗？”我多希望得到相反的回答啊！

踌躇。沉默。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令人窒息的原野啊！

我等着，等着他的回答——哪怕说，和我做个普通朋友也好！我决不想破坏他将来的家庭，我只想一辈子不结婚，把他当做唯一能理解我的人。

突然，他抬起头来，脸色苍白得可怕，闪出绝望、果断的目光，清清楚楚地说道：

“我走了啊。”

话音未落，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头也不回地匆匆登上了大坝，一直朝前走去。

啊，这就是他对我一片痴情的全部回答！我仿佛第一次认识了他，血液从头顶直流到地里一般，只觉得浑身冷

透，走都走不动了。

我麻木地转过身去，挪了几步。终又呆呆地站定，不知在想什么、做什么……

似乎过了好久，我才回身看看他——必须等他走远了，才看不清我流泪的面孔呵。

他，远远地站在大坝上，立在那儿，也正望着我呢。

我转过身，哭泣得抽噎起来。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以至行走都有了困难……

停住。又望望他那无精打采的、远去的背影……他，又站住了，正要回过头来——我赶紧转过身去。

然而，他是不会跑回来，请我原谅的！

虽然他还会回头看我，却终于向相反的方向走去。

我再不愿意这样的人看见我，趁他没有回过头来，一头钻进了前面的柳条林，高高的密实的柳条遮挡住我的全身，这回，他休想再看见我了！

在密密的柳林里漫无目的地匆匆穿行，枯干的带雪的柳梢划破了我的脸，我全然不觉、全然不顾。

突然，极意外的，在那柳林深处的死水潭边，我呆住了。薄薄的冰层刚刚冻住，只要一踩，立刻便会掉进这覆雪的冰层！

死？死？用死来解脱痛苦？

没感觉、没思想，只是愣愣地盯着那淹死过人的水坑！

我下意识地捏了下手里的书，一个冷酷的念头在心里狞笑——把书留在岸边，还是与我同归于尽？

这是一本尚未完成的书呵，谁来完成呢？

“遗业艰难赖众英……乾坤特重我头轻。”

心哪，痛苦得都要碎了，我无力地瘫坐在雪地上，痛哭起来。

哥哥！……哥哥！难道，真的再看不见你了吗？……哥哥！

哭声震颤着原野，摇撼着千里银白的世界……

让我痛哭一场吧，哥哥！自你死后，我还没有痛哭过！在这干净的天地间，让这哭声，飞到你英勇就义的地方，飞到芦沟桥，落进那殷红的、鲜血渗透的土地上！让那鲜血腾上天空，变成绚丽多彩的早霞和晚霞，让我每天看到，每天见到吧！让我倒净心里所有积存的泪水，痛快地大哭一场，痛快些吧！哥哥，再不要说哭就是不坚强！……真的再看不见你了，哥哥？

泪涌如泉，哭声震天，那悲哀、动人的音乐飘向苍远的蓝天……

我抬头望望碧蓝的天，一丝云影也没有。我把脸埋在膝盖上，搂着怀里的书，尽情地抽泣。

雪原悄无声息，静听这发自肺腑的呼声，大地仿佛早已了解我的心愿，一定将我的哀痛和自责带给遥远的哥哥去了……

快乐死去了，永远死了。再有爱人，也不会有如此新鲜、美好、蓬勃的感情了。是的，我伤心，伤心那些快乐的死去，伤心再不会有第二次新鲜、美好的感情，伤心我所经历

的、留在心上的疤痕，最最伤心的，却是自己从中所表现的软弱和不坚强！要是哥哥，决不会的！如果他活着，会为我感到多么屈辱和难过！

是的，我曾以为自己的故事是见不得人的，总为自己的经历感到羞耻。而在维盈的温情中，我第一次产生把它写出来的念头。可是总还有意识地保留一些东西。怕什么呢？怕别人指责和鄙视我吗？

如今，我只想把它全部亮出来——让人了解我。我只想在人们无私的批评中受到洗礼，我只想在诚实和勇敢中得到安宁！

好久，心情才稍许平静下来，擦掉冻住的一脸泪痕，望着水潭出神……

仿佛，我变成了她。此时的她，正疾跑着、狂奔着，倏忽站在险峻的山巅上，激愤地举起双臂，用粗犷、吓人的声音嘶喊着：

"我要活！……我要快乐！！我要哥哥！！"

四下里响起无休止的回声……这恐怖、阴森的响声四散开去，如迸发的X射线般穿透了冷漠的苍天和土地……万物紧缩着惊醒、战栗的心，屏息静听，不得不惶恐、羞惭地缄默了……

仿佛天地间只剩下我一个孤儿。此时我坐在地母亲的胸膛上，倾听地母和天父向我哀恳地忏悔和哭泣；请求我原谅他们给过我太多的痛苦……我严肃地谛听着、谛听着，尽管相信他们的话语都出自真诚，尽管坐在他们的怀抱里感

受到他们想温暖我的体温，但我再也做不出一丝一毫原谅他们的表情。

如果我的心还有一口余温，那就是想说出全部实话，求取哥哥的谅解，我愿在他的谅解中找到动力、得到永生！

我默默地流着泪，回想着、判断着、权衡着……

为了整理乱麻麻的思想，我抓起一把雪面擦了擦脸，心里清爽了许多。

究竟维盈为什么不理我，做出如此决断呢？也许，他的母亲对这件事横加干涉？

一、我结过婚，光这一点她就不同意？许多人认为，结过婚的人和没结过婚的人竟然有本质的区别，她也不例外？她怕亲友、朋友耻笑？

二、我本人和我一家的政治问题。我原以为，我们出身都不好，是我们思想上不会分开的基点。也许，这正是促成我们分离的原因？他的母亲二十年来，为他父亲背过多大的包袱呵！她节衣缩食地供着他们，只盼着他们长大后别再有什么不幸。既然他母亲能干涉自己女儿的婚事，当然也要干涉儿子了。正因为她怕有第二代、第三代的苦恼——出身、出身！你在人们的心里留下多么深的烙印呵！

虽然我并不清楚他为什么不理我，可是有一个思想却很清楚——我不想原谅他。因为决定一切事物的是内因。

想想看，他是以什么态度去爱我的？他从没想过如何与我一起生活，尽管他可以去搂抱一位有夫之妇。当我认真地对待自己、也严肃地对待他时，他反而胆怯得不知

所措。

也许维盈是真的爱我，但又经不住家里的眼泪和恐吓？实际上，他更爱的不是我，而是自己。怀疑第一次涌进脑子——究竟他有多少优点？有什么值得钦佩和学习的长处？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生活会幸福吗？以前我从未想过，从未怀疑过。我为如今的怀疑感到吃惊。那么，我在他身上寻求的是爱情吗？究竟是什么？……我说不清今后会怎样？我茫然。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今后会再有幸福。心里仅仅装满了一个念头——必须为哥哥、为那本书活下去！

原谅我要自杀的软弱和不坚强吧，哥哥！我对人民还没有贡献，我还要生活、还要奋斗！尽管，我们从能奋斗的那一天起就被人歧视，但，你的死使我醒了，终于使我醒了。原谅我跪着生的糊涂和愚蠢！呵，我要看看西边的天空是不是有哥哥的影子出现……

我用力站了起来，象巨人般挺立在死水潭边。

穿出柳条林，来到坝下，望着青年队的方向——那西边的天空和无垠的雪原，呆坐着出神……

假如我还想争这口气，假如我还有做人的骨气，假如我天天想到哥哥，定会有更新的意志去开拓生活的路！

我吃了口雪，那甘甜的雪水渗进心里，好爽快呵。

是的，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乐观地活下去。我想写的书，还没有完成呵。我应当把它完成，它是真理！我恨自己为什么要不负责任地把它丢掉？要是哥哥，决不会的！

"原谅我吧，哥哥！"

望着暗下来的蓝天——那西边的天空，我心里真诚地呼唤。

“原谅我吧，哥哥！”

仿佛这声音无限宏大，宽远无边；那动人的悲壮频率使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空气象变得分外温馨，似乎象宇宙中一位看不见的老人，用他那温暖、无形的大手，轻柔、慈爱地抚摸我的黑发，我被这无声的抚爱深深地感动了。……

夕阳西下了……

那西边的晚霞，象火一样升腾在天空，俯瞰着大地……

呵，在那条条的、朵朵的、绚丽多彩的云影里，不正是哥哥吗？他轻松、欣慰地向我微笑着，似乎已望了我很久……我惊讶、痴呆地望着他……这极大的抚爱使我感动、使我宁静、使我浑身充满了力量！我多想一千遍一万遍地呼唤他，端详他那象晚霞一样美丽、动人的面颊！……哥哥！

我一口气登上大坝，想更清楚地看见他。淘气的雪面灌进了靴子，渗进丝丝的凉意，然而我心里，却火一般燃烧着信念！

千里的雪原呵，被晚霞映得绯红，给素裹的大地披上了一层艳丽的红装。大坝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一夜的积雪，还没有被人开拓过。我望着哥哥那愉快的、深深谅解我的面容，大步地踏着雪，头也不回，一直朝青年队走去。

呵，又想起哥哥的一首诗：

千里雪原泛夜光，
天心人愿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亦迢迢夜亦长。

又一个冬夜即将降临，但夜再长也会亮的，
哥哥，春天会来的！只有你是最可爱的，哥哥！

乾坤特重我头轻

——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

提笔之前

桌上放着一份再审判决书。全文如下：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79）中刑监字第1310号

遇罗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一九六八年一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

二、宣告遇罗克无罪。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出于无法形容的复杂心情，我的心在颤抖着，眼睛紧紧盯住那七个字：

宣告遇罗克无罪。

历史宣告了他无罪。

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只允许他活了二十七岁。

历史还将宣告他是“烈士”、“理论家”、“思想家”、“实践家”……然而，我盼望这些他受之无愧的名称吗？不。

我不想对我的哥哥给予任何评价。在我的身后有十亿中国人民——由他们去说吧！我只有一件责无旁贷的、十年来一直想做的事——用我这支笨拙的笔，凭着浅薄的思想、直觉的感官，去写写哥哥这位普通人，去写写他都干了什么事。

他只有二十七岁。

但他的生活经历、生活给与他性格的陶冶、他所做的事情，即使是年龄比他大一、两倍的人——如果庸庸碌碌过活的话，也不能与他相比！

一　金色的奠基石

呼拉拉的队旗飘拂着哥哥的脸……在晴空的映衬下，哥哥——遇罗克站在第一排第一个，紧挨旗手。

红领巾，少先队的旗！哥哥是东四区一中心小学第一批少年先锋队队员。当他的班主任——穿着白汗衫、蓝裤子、戴着红领巾的王笃元老师俯下身来给哥哥授巾时，他的表情是那么庄严、神圣！他举起右手向王老师行第一个队礼，那激动敬仰的神情使在台下观礼的我格外感动！他向上扬起的右手伸得多么笔挺有力，紧紧并拢的手指，几乎象要弯过去似的。

那天，他自豪地一口气向家跑去，炫耀着红得耀眼的领巾。我兴奋地紧跟他跑着，他胸前鲜艳的红领巾多象一团跳动的火苗！街上的行人投来多少羡慕、赞叹的目光呵！

"妈！我入队了！"一进门他就大喊，"给我买个日记本吧！今天的日子最值得纪念，我要从今天开始记日记！"

从这一天(一九五二年的一个夏日)起，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他被捕，他的日记就没有间断过。

那时，他是否把自己淘气和欺负我们的事也记进去了呢？……

他天资聪颖而淘气，在家里，或在小伙伴之间，常以淘气为乐事。六岁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放了学，先做功课，并不用大人催。课余的兴趣非常多——搜集成套的小画片、

弹球、打克郎棋、下军棋、跳棋……他一旦掌握了取胜的规律，便无甚兴趣了，又向另一个游戏“进军”。

他是那么诡诈，常常引起多少同龄人的欢笑和气恼啊！

下军棋或打扑克时，他曾不止一次地以诡诈的表情迷惑住对方而取胜，自己开心得咯咯大笑。为了破除姥姥的迷信，他画张吊死鬼放在黑暗的小煤屋里，望着姥姥那惊慌的脸，高兴地说：“啊，原来鬼都是纸做的呀！”在姥姥最尊崇的“菩萨过海”的日子里，给姥姥素馅的饺子里偷放大油，看着香甜甜吃着饺子的姥姥，故意地问：“好吃吗？”一直到姥姥败了兴，认为对佛失了敬，无法再迷信方才罢休。捉迷藏时，他往往巧妙地绕到小朋友背后，突如其来地大吼一声，吓人一跳，他却咯咯地笑着跑掉了。他更喜欢的是在空旷的大院子里挖出一尺多深的陷阱，上面掩饰得毫无痕迹……多么淘气的哥哥啊！有几个月，他每天早上睁眼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抄起预备在床头的木头宝剑，趿拉着鞋，连衣服也顾不得穿，从他的屋里匆匆跑到我和弟弟的床前，猛然把我们的被子挑开。我们从梦中惊醒，他已咯咯地笑着返回，钻进他的被窝看起课外书来了……

他虽淘气，但却时时显出爱思考的“小大人”神气，加上成绩优异，班里的同学给他起个外号叫“小学究”。他身体健康，很少得病，但却个子瘦小，显得文弱。上课时，他从没有过不守纪律的行为，专心听讲，理解力很强。学校的歌咏比赛、朗诵会、演话剧等等，都少不了他。他总是十分认

真，做得出色。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班上演苏联儿童剧《特别任务》时，他扮演女主角冉尼亚，他那自然的表情、清脆熟练的台词，是花了多少功夫在穿衣镜前练成的呵！

过队日，王笃元老师带着可爱的孩子们，背着小锅去郊外野餐。多么有趣的时刻！他们挖土灶、找干柴、架小锅、擀面皮、包饺子……哦，水开了！这水喝起来比哪日的都甜，即使不渴也要争先恐后地尝一口。饺子下锅了！春风、田野、飘拂的鲜红的队旗，草地上孩子们的笑声……哥哥最喜欢的小姑娘叶丽丽快乐地尖叫，象蝴蝶一样穿来穿去。

"她漂亮吗？"哥哥骄傲地问过我，"你看她眼睛多大！"

"嗯……"我不以为然，那眼睛实在太大了。何况她还比哥哥高半头呢？

多美的野餐呵！

每到暑假，他常和同学、朋友去郊游；也在家里编《暑期小报》、演木偶戏、演唱京剧，而且都是他主编、导演，并且演主角。他编写的《暑期小报》是一张八开的白报纸，四周画上花边，所有的童话、寓言都是他自编自写，还设立了"征文"专栏，让我和两个弟弟投稿。有时我们难得写上两句半，他便热情地予以鼓励，认真地把我们的"大作"登在最显眼的地方。闲暇时他常写些童话、故事之类，投往中国少年报社。频繁的退稿并不使他气馁，叫他失望的是回回看不到编者的具体意见，只有一张铅印的退稿信。尽管如此，他还是乐观地继续写、继续投，给自己取笔名叫"秃笔"和"干

章侯”。

有一篇在《暑期小报》上连载的童话《小气球飘洋过海记》，最能代表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十月一日少先队员们在天安门前放气球，其中一个小气球飘洋过海，飞遍了中国和全世界。它所见到的中国和苏联的欣欣向荣的景象、美国黑人的受难、非洲的反殖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黑暗等等，完全是当时学校对我们的教育内容，而哥哥是完全相信的——又有哪一个“祖国的花朵”不相信老师的话呢？那时候，国内一派和平景象，大搞经济建设，人民热爱新中国，党和领袖们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极高。学校贯彻的全是苏联式的教育。“苏联老大哥”是当时最流行的名词。哥哥把这些思想融化在美妙的童话里加以描绘，让幻想自由驰骋。这不独是他奇妙丰富的幻想，更是他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热爱。他在小报上还编过一则寓言：《新龟兔赛跑》。大意是：一只“博学”的乌龟主动要求和兔子赛跑，兔子一下子跑到前面去了，而乌龟心想：“嗯，我不用急，我在书里见过，兔子在前面那棵大树下会睡觉的、会睡觉的……”结果，兔子并没睡觉，早就到达终点了。

“这则寓言有意思吗？”他咯咯地笑着问我们。

“有意思！”我和两个弟弟几乎异口同声。

“这讽刺了什么？”哥哥让我说，蠢笨的我竟答不上来。

“小笨小笨，”哥哥笑道，“这是讽刺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呀！”

他从小学就开始涉猎中外文学名著，读各种儿童读物

和报纸。每逢走过书店，他便要进去看一看，这成了他的习惯。他订《象棋》期刊，钻研时兴趣无边。在景山少年宫举办的少年儿童象棋比赛中，他获得亚军。他一手紧握锦旗，一手抱着奖品，兴奋地从少年宫一口气跑回了家……

他的生活充满着朝气，对什么都想钻研、都感兴趣、都想问个"为什么"。在他眼前，世间一片美好，金光灿烂。他爱班主任王笃元老师，胜于爱父亲。我和他同在一个小学，我们相差四岁，差四个年级。放学找他回家时，他往往摆摆手说："你先走吧！"那时，他和两三个学生背着书包，在操场或教室门口，围着王老师，不知聊着什么，脸上显露着幸福和欢愉的神情。

一九五三年秋，作为资本家的母亲（她的资本共有一千元，还是和另外两个人合股），经过了三反五反运动的洗礼；作为和父亲自由恋爱结婚，却被丈夫宣布为"不温柔"而协议离婚的母亲，孤身带领我们四个孩子和年迈的姥姥，决心离开那令人伤心的家，换一个新的环境，忘掉以前的一切。于是她用不多的积蓄买了东四北大街果局大院的一个小四合院，共八间房。我们和水獭胡同荒芜的"百草园"永别了。

严寒的冬日，哥哥和我每天步行去上学，要走半个小时。西北风刺骨地袭来，哥哥常回头催促道：

"小妹妹，快点儿！"

"你看，"过了会儿他又说道，"前面那个人走路，脚走得多直、多正！来，"他忽然调皮地目光一闪，对我耳语道，"咱

们在那个人后头走，你看那人又高又大，穿的棉大衣真象一堵墙，准挡风，别出声。”

这主意真是格外有趣！但只要他一遇见同学，立即便抛开我，兴致勃勃地和同学聊起天来，好象根本不知道还有我这么个人似的，根本想不起回头望一眼，那时，我只好委屈地远远跟着他……

我们是多么想念水獭胡同的大荒园啊！在那翠鸟啁啾、树木繁盛的百草园里有哥哥多少难忘的回忆！他在作文《我的童年》里回忆荒园——怀念枣树，它曾用身体挡住向他投来的纷飞的雪球；怀念那一排排的塔松，它们象绿色的卫兵，捉迷藏时将他的身体严严地遮挡；怀念那棵四人才能环抱过来的大榆树，喜鹊曾在那里筑巢，春天结满了密实实的榆钱；他更想念果实累累的梨树，落了一地的蓝紫的桑葚，藏在草根下的红红的干枣，合欢树绒嘟嘟的粉红色花朵，还有那些无名的野草、清香的小花和各色各样的昆虫……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对美的感受和幻想的追求，在《我的童年》里，迸发出多么卓越的才华！《一堂历史课》和《我的老师》，也同样以那奇妙的构思和爱祖国爱学习的美好感情，赢得了全校的赞扬。如果不读那么多课外书，他的作文怎能如此出色呢？

这天二姨来串门，哥哥朗诵他那被当作全校范文的《我的童年》：

“枣树啊，在那雪球纷飞的打雪仗的日子里，是你用你坚实的躯干，挡住了我的身体……”他感情充沛，微含着泪

水。仿佛怀念的不是荒园，而是一位永远别离的爱友。

"怎么样，二姨，"他问道，"您听了受感动吗？"

母亲只有这一个妹妹。二姨的性情和母亲正相反，她是贤妻良母式的。哥哥从小爱京剧，与二姨分不开。二姨一来，哥哥常和她谈京剧，向她学习。演唱《玉堂春》时，二姨让我饰演王金龙，头上顶一条毛裤，算是乌纱帽。我是"哑巴"，坐在她怀里，全由她来替唱。哥哥演苏三，他的水袖就是白窗帘，他跪着唱"过堂"那一场，起来时，双手揉着膝向后退去，那唏嘘哀叹的道白，那逼真的姿势，使人既感动，又依稀觉得可笑。

"演得倒是挺象，就是那窗帘差点劲。"姥姥给了一句最公道的评价。

每逢"六一"儿童节，母亲特意请假带我们去玩一天，照张相留念。一九五四年"六一"过后，十四号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我和哥哥正要打着雨伞去上学，哥哥对母亲说：

"妈，您给我五毛钱吧，我想和罗锦照张相去，我应当在没毕业时和她留个纪念。"

"等天好再照吧。"母亲望望天说道。

"不，就想今天照，来得及，我们迟到不了。"

其实那天我并不想照，可是哥哥却拉着我匆匆走到隆福寺照相馆，要照一张小二寸，并选一张四边是枫叶的图案。

"要布景吗？"摄影师问道。

"要。"

他搂着我的肩膀，那么高兴和亲切。对于他的心血来潮我真有点莫名其妙！可又想，他早就应当这样彬彬有礼，过去，他对我们太调皮了。

最有趣的是，两年以后哥哥还在这家照相馆照了张做鬼脸的滑稽相，洗成书签的形式分赠给与他要好的同学。

一九五四年九月，他被评为六年来学习品行兼优的学生，得了奖状和奖品。母亲看到儿子的奖状，感到无比的欣慰，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母亲奖给他一本《新华字典》。那两天哥哥整日地翻看这本字典，在字典里唯一的一页空白纸上写了一段批语：

> "附新华字典意见：此字典，好虽好，但缺单字也，'典'不能用此书。'腻'字'网'字都缺。此字典，词太少，还称何字典？只有白话，可称白字典。'意'字写得不好看，许多即同，可称童字典。解释不够，可称不善字典。字等词等完全一抄，可称旧古字典。'新华'二字由何说起，不如叫破旧字画书。"

他从小时候就爱尖锐地提意见。

明天就是毕业典礼了，他将做为毕业班的代表第一个发言。头两天，他对着大衣柜的穿衣镜，关上屋门，反复地练习。他对着镜子行了无数个队礼，一遍又一遍地有声有色地朗诵着，纠正着自己的姿势和语气。上午他练习了最后一遍，几乎一字不差地把发言稿背了下来。

"小妹妹，"他满意地嚷道，"明天看我的发言吧！"

下午，他轻松地玩了半天。

低年级各班选派优秀生去参加毕业生的典礼。一大早，姥姥给我精心地打扮起来。哥哥洗漱完毕，背着手打量我一番，撇撇嘴品评道：“哼，活象个没人要的布娃娃！”

这话真使人丧气！我简直想哭了。

大礼堂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毕业生一律穿着校服——白汗衫、蓝裤子、红领巾。红、白、蓝象是花海，呵，真美极了。

“毕业典礼现在开始！”

喇叭和队鼓齐鸣，旗手高举队旗绕场一周。队旗的红光在每个人面前闪射。我们拿着纸花走进会场，齐声呼喊：“向大哥哥大姐姐学习！欢迎你们常来母校！”毕业生们整齐地站立起来，向我们热烈鼓掌。

校长和教导主任相继讲完了话。

“六年级一班代表遇罗克发言！”

在一片掌声中，哥哥跑上了台。他显然在极力克制着激动，站在几乎与他齐肩的讲台旁。他右手的五指并拢得象入队那天一样笔直，手用力扬上去，不小心指尖碰到了讲台的边缘，台下发出一阵友善的笑声。这笑声将停，却又发出一阵更响的笑声。原来，他的鞋穿反啦。现在是立正站着，那穿倒了的鞋在台下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人们很快地被他那爽朗、清脆、激昂的声音所打动，他那白镜框后面晶亮的眼睛，他那庄严的面容透出的恋恋不舍的心情，他那清秀的五官和不俗的气质，象一块磁石把人们的注意力全吸

了过去。

"……我们就要离开母校了，就要离开抚育我们成长的老师了。敬爱的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和老师们，是您们循循善诱地教导我们，关切地启发我们……"

哥哥的发言通过麦克风，越过敞开的大窗，随着窗外一片槐树的香气，奔向云霄和日光里去了！无数颗心和他的脉搏一起跳动。

"让我们再一次向您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随着他那庄严的又一次队礼，六年一班忽然全体起立，和哥哥一起举起了右手。呵，哥哥的脸多么严肃、神圣！校长、主任、老师们都站了起来，随着队鼓齐鸣的节奏声，热烈地回身鼓掌致意。我心里呵，充满着欲哭的激动！哥哥就在这雷鸣般的掌声中含着热泪跑下了台。当他激动地跳下讲台那高高的木阶时，险些绊了一跤，被站在台下的王老师一把抱住，紧紧地抱在怀里……

"王老师，我们走了。"

学生们都走光了，哥哥和几个同学还依恋地拉着送他们出校门的王老师的手，最后一次向他告别。

"王老师，我们走了……"哥哥又一次不舍地说。

"常来看我呵，孩子们！"王老师又一遍亲切地叮咛，"到了中学，一定要积极争取入团！"

十二岁的哥哥，戴着红领巾，怀着一定要刻苦学习、长大要对人民有所贡献的愿望，离开了东四区一中心小学，进入第一志愿的中学——灯市口男二十五中。

这是一九五四年，一进中学，他便写了入团申请书。

啊，金色的童年！

金色的奠基石！

二　逆子，还是孝子？

哥哥是逆子吗？是的。

哥哥是孝子吗？也是的。

我家那时七口人——父亲、母亲、姥姥、哥哥、我和两个弟弟。

父亲出身于城市贫民，爷爷原籍在山东省农村，因生活困苦去闯关东，便在黑龙江省黑河落了户。爷爷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十五岁便在铁路上当一名小职员，养活奶奶和姑姑。他刻苦勤奋，边工作边学习，因考试成绩优异，名列前三名，被保送去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土木建筑系深造。他白天上学，晚上翻译日文挣稿费并著书来养活自己。笔名是“罗茜”。作品的笔名使他决定了我们这一辈的名字从“罗”字起。

父亲沉默寡言，脾气温和，不善于交际，但是却有一定的见解，更希望儿子能胜过自己。哥哥刚一记事，他就给哥哥讲自己小时怎样刻苦、怎样孝敬奶奶的事；稍大，便又以古人的榜样激励哥哥奋发学习和孝敬老人。父亲在我们面前从来是说话算数，不轻易许愿。一次，六岁的哥哥上了房，任谁叫也不下来，父亲哄他说：“你下来，我带你看

戏去。"

"真的吗？"哥哥两手叉腰，站在房上神气地问道。

"真的。"

哥哥下来了，父亲责备了他，自己明明不想看戏，却当真带他看戏去了。

哥哥曾获得北京市少年儿童象棋比赛亚军，那次他一口气从景山少年宫跑回家，一放下怀里抱着的奖旗和奖品，就连连叹气道：

"唉！只差一个子儿！比赛都快停了，还是不分胜负，裁判说：'注意，还差十五秒！'我一走神，被他吃了车！唉，要不，冠军就是我的了！"

"这正是你不足的地方，"父亲说，"不是一个子儿，而是你还差得远呢。"

哥哥诚服地没有作声。

父亲多希望儿子能成为知识渊博的人哪！但父亲从不读理论书，他最相信的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纯业务观点。

母亲出身于一个较为富裕的大家庭。老爷原是木匠，和几个兄弟、徒弟做木器家具出售。老爷兄弟七个，都住在一起。到了母亲上高中时，大家庭才瓦解，各自分居。母亲只有个妹妹。由于母亲天性爽朗，又好运动，老爷拿她当儿子看待。她不受拘束，生就了男人般的性格。母亲高中毕业时，凡能拿出一百块现大洋者，可去日本留学，母亲便去了日本，进中专学商业管理。

“七七事变”后，父母和许多爱国青年认为不可再在敌国求学，愤然回国，母亲因此中辍了学业。回国后，他们在同一单位——建设总署工作，母亲任打字员，父亲任工程师，二人有了接触的机会，结为夫妇。

一九四八年，母亲与别人合股，用一千元的本钱接办了北京市的一个小铁工厂——“理研铁工厂”。全家由徐州迁到了北京，母亲任经理，便成了资本家，工人有十多个。父亲在这个厂里做工程师。

父母亲加上慈祥的不识字的姥姥，给家中创造的气氛是和睦安宁的。在我们家庭中，是可以平等地对话的。

说哥哥是逆子吗？看起来——他又是何等孝顺！他对父母、姥姥彬彬有礼，从不顶嘴。

在小弟弟一岁、哥哥九岁的时候，父亲认为母亲不温柔而提出离婚。离婚以后，哥哥从没有说过一句对父亲不满的话。他理解父亲，他相信他的心地是好的，是正直善良的，相信他忍痛抛了我们是不得已的，哥哥以无比宽厚的心肠对待父亲。他常去偷看父亲，甚至和父亲身旁的姨也处得十分融洽。然而他又很孝顺母亲，他从不惹母亲生气，深深理解母亲的刚强性格和艰辛，总希望自己能早一天分担母亲肩上的经济重担。一九五六年，那位姨和父亲离了婚。哥哥这时急切地盼父亲回来！为这，他做了多少努力呵！先是劝说母亲原谅父亲，不成；哥哥又去求助于母亲的好友：

“劝劝我妈，让我爸爸回来吧！求您做做我妈的思想工

作，让我们一家团圆吧！”

这一天时机终于到了，哥哥和我们一起跪在母亲面前，他流着泪央求道：

“妈，叫我爸爸回来吧！……”

母亲和我们一起哭了起来，复婚便在哭声中决定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哥哥哭泣。

他在吃、穿上是多么不讲究呵！从不记得哥哥要求父母给自己买过什么。而他总希望能用自己挣的钱，使父母、姥姥、弟妹们愉快。

他十八岁开始挣钱，无论是在农村、做临时工，还是在工厂，每月挣的工资全部交给母亲，直看到母亲要生气，才勉强接下零用钱。有时母亲给他五元，他往往说：“妈，我只要三元就够了。”

炎炎的夏日，未见他买过冰棍，所有的零用钱都用来买书、纸、本子。每星期从农村回来，他都给父母、姥姥买吃的，常给家里买大米、青菜、水果、肉类等副食品。每月给姥姥买戏票。休息日不惜大力去洗全家的衣服，洗得是那么仔细认真。

他爱妹妹、弟弟，他不愧是我们的表率。每逢我们的生日，他第一个惦记着送我们书籍、日记本或钢笔，在扉页上题上他的诗句。他的题词是多么生动有趣呵！

每次政治运动一来，他总是劝慰父母要坚强，以自己那乐观的精神和敏感的预见鼓舞我们。我们从他那儿得到过多少精神鼓励和安慰！这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坚定了生活

的信心。

说他是孝子吗？他在哪一件大事上不是逆而行之呢？他死后档案里还有一份小学的全校大会表扬信——北京团市委表扬这位在“三反”运动中检举父母亲的学生。哥哥所检举的，是父母将一名手指被机器轧掉的工人严叔叔解雇的事情。由于哥哥的检举，在工作队的帮助下，严叔叔的工作问题才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有人认为这件事有损于哥哥的形象，可我认为，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呢？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哥哥那善良、正直的心肠呢？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哥哥那叛逆的性格呢？

他虽叛逆，却是内向的。每每做出主张、说出见解都胸有成竹，讲究方式方法，并不招人反感。

一九五四年公私合营，母亲第一批主动地交出了全部产业，担任厂长，又是全国妇女代表、北京市代表、工商联委员、民建会员。那时母亲兴致勃勃地整天开会，全部热情都投入工作中。五六年的一个夏天，哥哥在全家吃饭时，一面吃，一面郑重地对母亲说：

“妈，有件事我想了好几天了，您现在是全国妇女代表，又是市代表、厂长，您还一度想入党，可是您却收房租，这与您的身份极不协调，您说呢？”

母亲沉思片刻：“你说怎么办呢？”

“依我的意见，您最好把全部房产交给国家，连咱们自已住的房也照付房费。”

父亲想了想说：“咱们倒也不指望租出去的十几块钱。”

“并不是指不指望这十几块钱的问题，”哥哥说，“而是性质问题。不是靠自己劳动得来的钱我们都不应当要。”

“交出去也好，”母亲考虑之后，说道，“咱们住的这几间房不用交，有这样的。把那两家住的房交出去算了。”

“要做您就应当彻底，”哥哥说，“干嘛还要留尾巴呢？咱们应当象别人一样，该拿什么钱就拿什么钱。其实您完全可以做到不留这个尾巴。”

这天，在哥哥的劝说之下，父母同意交出全部房产，并且照付房费，决定明天就去房管局办手续。

“妈，明天我和您一块儿去！”哥哥高兴得脸直放光。

哥哥这时只有十四岁，还未退队。难道，他和剥削思想划清界线是给谁看的吗？难道，他向谁表白过这些行为吗？没有！

逆子、孝子，多么统一地结合在他一身！

也许，不能用“逆子”和“孝子”之类的概念来形容哥哥。因为哥哥是人民的儿子！

三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

一九六〇年高考后的一个夏天，一位青年一动不动地

俯身坐在写字台边，左手支着额，手指插在乱发里，握着钢笔的右手，压在那写满诗句的揉皱的纸上……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

他凝视着窗外，象是在思索、回忆，又象在无限的痛苦中要理清什么东西……

根据高教部的存档成绩单证明，哥哥高考成绩优异，却连大学的最后一个志愿也未被录取——政审不合格！

是自己政治上不求进步吗？是自己表现不好吗？是学习成绩不优秀吗？是自己不热爱党、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吗？都不是。然而，却被无声地宣判为祖国的渣滓，成了科学、理想和事业的大门之外被淘汰的对象！

也许，他觉得自己过去的生活是个一连串的错误？或许，他在痛苦的思绪中回忆着一件件往事，给自己的思想、言行加以品评，理出头绪？莫非，他在权衡、决定着什么？……总之，他连午饭和晚饭也没吃，就用这样的姿势苦苦地坐了一天。

母亲和姥姥时时担心、难过地望望他的侧影——那雕像般的侧影。这一天大家都尽力保持安静，连打水洗菜都故意到院子里去，而不愿进里屋从他身后经过。

“没有金色的衣裳……”

我也在沉闷中回想着哥哥……

那蓝天下呼拉拉的队旗；那掌声雷动、激动人心的小学毕业典礼；十二岁就写了入团申请书……

初中，他自觉地给自己订了学习计划，开始有步骤地涉猎中外文学名著。每晚复习完当天的功课后，他不读完五十页书决不睡觉。

"哥哥，"我问他："你困吗？"

"开始那两天有点儿困，现在好多了，慢慢就能习惯。"

他认真地记读书笔记。初中三年里，中外文学巨匠的作品他都读过了。一本一本的读书笔记里记载着感想、心得和摘录。哥哥的高中同学王学太回忆道：哥哥因学习成绩优异，初中时得过金质奖章。这，没听哥哥说过。总之，他的学习是优秀的。然而，初一的操行成绩却是"良"。第一次得"良"！这"良"在一般学生看来，也许很不错了，但哥哥却觉得这个"良"字刺眼，心里是多么不快呵！他切身感悟到中学的要求比小学高多了。他回想自己这一学期哪一点做得不够，是否由于有时说话太尖锐、好争辩，引起一些同学不快呢？他万万没有想到，"良"，正是出身一栏（到初中便有了履历表）填了个母亲是"资本家"的结果！他只想做得更好，更严格律己，一定要得"优"！但他更没想到，一九五七年父母成了右派以后，他的操行立即成了"中"，一直到高中毕业。尽管他多次鼓励我写入团申请书；尽管他学习成绩仍那样优秀；尽管他各方面严格律己；尽管他劝说父母

交出了全部房产；尽管他的高中同学深深感到，他总有一股隐含的不可遏止的要摆脱家庭包袱的苦闷和愿望，但操行成绩上的“中”字，就象铁箍一样紧紧箍在他的身上……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父母都成了右派分子。母亲下放车间劳动，免除了厂内外一切职务。父亲被劳动教养，水利电力部开除了他工程师的公职。

哥哥在入团申请书中主动地写了父母成为右派这件事，当时学校还不知道。他仍希望接受团的考验，尽管他有些问题弄不清，但他认为父母的问题是不应当由儿女来分担的——他相信团组织是不会混淆的。

哥哥升入二十五中的高中部——即后来的六十五中。一九五七年九月，开学的日子比正常的日期（九月一日）晚了几天，因为学校的老师正在利用假期搞“鸣放”，每天都在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

哥哥入学不久，便参加了课外文学小组。在会上他时而活泼、时而文静，有时也和人们开个小小玩笑从而使气氛活跃起来。在漫谈时，哥哥建议说：希望今后的活动形式多样一些，如办板报，组织看电影和戏剧，请老师多做一些课外辅导，讲一讲文学名著，大家共同讨论以增长知识等等。他的建议提得恰当得体，文学组真的采纳了他的意见。

两位学识很丰富的老师（一位姓黄、一位姓徐）给大家热情地讲《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他们生动俏皮的比喻、广博的引证、幽默的谈吐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不久，他们销声匿迹了。同学们议论说两人被送去劳教了。又过了

些日子，领导叫同学们揭发黄、徐两位老师的问题，大家面面相觑，都楞住了。

"组长领着大家讨论吧。"领导说完离开了教室。

会场上是难堪的沉默。

"谁发言？"组长勉强地问道。

一个高二的同学清了清喉咙，站了起来：

"那次徐先生讲《红楼梦》时说薛宝钗稳重大方，象个青年团员，这是不是攻击团组织的右派言论？"

会场立即乱了，有人说算，有人说不算。哥哥在一旁静默不语，他内心里涌起无名的痛苦。散会后他对王学太说：

"这算什么呢？徐先生讲的时候大家都笑了，现在说成是他的罪行。可是我们呢？大家不都感到讲得很有趣吗？如果说有问题，我们每人都有份儿！"

父亲被劳教，工资早就没有了。母亲那小资本家的家底经过了"三反五反"运动，再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在经济上是个"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人，往往不到月底钱就花光，时时向姥姥借一两元、二三元以救急。存折上的五百元到父亲劳教时，已是分文皆无了。母亲的七十元工资，要养活七口人，因此，住房自动缩减为一间半。全家住一间半房，那半间又兼厨房，一家人出出进进，怎能没有杂音呢？哥哥看书时总皱眉头，显示出我们吵得他生厌的神气，我们就格外地小心，但终不能不发出声音来。

"妈，"哥哥有一天说道，"能不能把小煤屋腾出来，做我

的卧室和书房？”

“那怎么行？”母亲不同意，“那是住人的地方吗？连门窗都没有，又黑又潮，墙都糟了，也危险哪。”

“不行，要不我简直没法看书，你们也觉着不方便。我得去和房管所商量商量，看他们能不能帮助修理，安个门。”说罢他去了。

哥哥走了，我忽地想出主意——一定要帮助他！便抓起把斧头进了黑黑的小煤屋。

黑屋子散发出浓重的霉味。我摸索着登上了破烂堆，便往那窄小的北墙凿了起来。

“咚咚咚”，当姥姥闻声赶来时，我已在那又糟又脏的墙上凿了一个透亮的大窟窿。一柱光线照进这从不见阳光的小煤屋，亮光处，许多蜘蛛、土鳖、钱串子正匆匆向黑暗处爬去。

“哎呀！”姥姥生气地埋怨道，“你真够可以！也不和大人说一声儿，就凿个大窟窿！可怎么好哇。”

“您看多亮！”我高兴地说，“这儿可以开个后窗户啦！”

“你这孩子！还不快出来！”

哥哥从房管所回来，一见这个洞立即开心地笑了：

“真好极了！他们已经答应来修，正好让他们开个后窗户！”

经过房管所和一位亲友的帮忙，盛煤的小房成了哥哥的住房。这小屋，门向西，夹在北屋和东屋狭小的空间里，门上有四块小玻璃，成个“田”字形。除了那小后窗，这门上

的玻璃便成了唯一透亮的“窗”。白天屋内光线暗淡，而且很潮，母亲担心对他身体不利，可是除了常晒被褥以外，也想不出其他好主意。

“罗锦，”哥哥高兴极了，“你来帮我布置一下，看怎么弄最好。咱们布置得漂亮点儿。”

我们用旧报纸糊了顶棚，找了块旧白被里当做桌布。木桌是哥哥自己钉的，连刨都没刨，桌腿糊上了几分钱一张的木纹纸。桌布上压块玻璃板，压着他的作息表和学习计划，上边放一个台灯和一些文具。他自做的小书架上，书放得满满的。

“墙上一定要挂点东西。”他望着四壁说道。

“挂什么？风景画？”

“不，我有。看，鲁迅的诗笺，徐悲鸿的《逆风》、《奔马》，你看怎么样？”

“真好。哥哥，我给你做几个简易玻璃镜框！”

床上方，挂着他写的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他那淋漓的墨迹，给小屋增添了生气。

不用看屋主人，光看这几张诗画、这苍劲有力的墨迹，就知道主人的胸怀和抱负。小屋横宽只有一米多，长六、七米，在这以后，这间小屋的主人用他的一切行动和事实证明了：他是一位怀有强烈时代感的巨人——他是与暴风雨搏击的海燕，决不是贪图安逸的企鹅。

“这真是天堂，”一切布置完毕，我们都有些累了。他坐在铺着厚褥子的木板床上，满意、幸福地望着四周，好象他

现在获得的是一座"天堂"：

"今天我太高兴了！罗锦，都得归功于你凿的那个窟窿。"说罢他咯咯地笑了。

小屋的灯光呵，从此便永远点燃在我心中了。

每逢我走进院内，
都要深情地凝望；
桔黄、暗淡的灯光，
映在唯一的窗上。
哥哥攻读的背影，
总是在眼前飘荡……

我多爱这小屋，多爱这暖盈盈的、桔黄的灯光呵！

往后一段时间里，哥哥顽强、刻苦地学习，主要读物不再是文学，而是哲学。

"我要了解每一学派的思想，"他对我说，"唯有对什么都了解的人，才能比较出哪个思想体系更为正确，他的信念才是坚定的。"

政治课从初一就有，但解决不了他脑子里的许多"为什么"，尤其是一九五七年以后……

他制定了紧张的学习计划。文学，现在只做为临睡前的辅助读物，有计划地结合所读的哲学著作来看。他认为这样读更能加深对哲学与文学作品的理解。他把从孔孟和柏拉图以来的哲学著作列了一个详细的读书计划，每天读至

深夜。如果说，学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缜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学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有所得的话，那么，哥哥的明智、灵秀、缜密、深刻、庄重、善辩正是他博学的结果。史、地、文、哲……从古到今的书籍，哪一类他不爱读呢？然而，他还有比以上几条更可贵更难得的，就是勇毅和坚定。这勇毅打哪儿来？首先是他坚信共产主义，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做思想指南的结果。因此才敢于抉择、敢于实践、敢于斗争。

"没有金色的衣裳……"

我继续痛心地回想着……

一九五八年开始了大炼钢铁运动。六十五中的校园里也建起了十多座小高炉，鼓风机日夜作响。学生们炒钢的炒钢，运料的运料。哥哥也和大家一样，高兴地忙碌着。但是他看见那满是蜂窝的铁块时，他怀疑了：

"这就是钢？"

"是钢。"旁边的同学回答。

"不对，不对。我在工厂里见过钢，不是这个样子。"

"怎么能不是钢呢？"那位同学也迷惑了。

"这还是碎铁，只不过把它烧结了。"哥哥平静而执拗地回答。他认为自己肯定正确的时候，总是这个样子。

"谁说我们炼的不是钢了？"一位老师从别处走来，他是负责炼钢的。

“我说的，”哥哥有些嗫嚅：“我觉得……”

“什么你觉得！”他严厉地打断了哥哥的话，“你知不知道全民炼钢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抓的大事？难道你反对大炼钢铁运动吗？……”他声色俱厉、滔滔不绝地训斥着，说了半天，似乎说累了，才一挥手说，“还不赶快拉劈柴去！”他大步走了。

“训我管什么用？”哥哥不服气地向同学吐了吐舌头，“铁还是铁，钢还是钢！”

这些“蜂窝钢”堆在校园里，经过风吹雨淋长了锈，蜂窝里长了草。

哥哥说了一句：“是钢为什么不拉走！”因此受到班里的批判。是呵，父母都是右派，自然要把哥哥看成“小右派”的！

所谓教育革命，就是学校办小工厂，增加了下厂下乡的劳动课程，同时加强政治教育。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几乎每天下了课都开辩论会。例如：全民所有制优越还是集体所有制优越？人民公社先进还是苏联集体农庄先进？共产主义什么时候到来？等等。没有人指导，只是同学们任意发挥。假、大、空话充斥着整个学校。

接着就是“红专”辩论，认真读书被看成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哥哥放了学有时去北京图书馆或首都图书馆看书，便又受到班里的批判，说他不关心政治。

然而，哥哥在这类过程中所受到的压抑、他心灵的苦痛从不对家里说……那时他才十五、六岁。

“没有金色的衣裳……”

一九五八年，我结束了小学生涯，考上了第一志愿——女十二中。我小学六年操行全是“优”，然而一到了中学，竟也和哥哥一样——“中”。评语上写着：“应和家庭划清界线”。由于已有了哥哥做前车之鉴，又由于班上象我这样情况的同学不止一个，所以心头只是闷闷的，并不感到受的刺激太大。

母亲看了操行成绩当然没有责备我们，她用那不屑一顾的大咧咧的神气掩饰心中的痛苦：

“嗐，中就中吧。我早算了：大学毕业又管个什么！你爸爸倒是大学毕业啦！中学毕了业就找个工作，到工厂里也满不坏。还得凭技术吃饭！中不中又算老几？咱又不想入党入团！”

然而，哥哥仍在争取入团。虽然他感到出身不好，入团是多么困难，而出身好的人入团又多么容易——这容易本身就是对我们的一种打击。但是哥哥却还在团的门外做入团的“最后的挣扎”。

一九五九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屋里只有我和哥哥。我正要去上学，坐在里屋写字台前的哥哥把我叫住。我走过去，站在里屋的门边，看出他内心有些激动，觉得奇怪。

“罗锦，到了中学，你写入团申请书了吗？”他望着窗外凝神问道。

“我还不到十三岁呀。”我倚着门框，无精打采地回答。

“没退队照样可以申请入团。我相信，团的大门是向每一个人，也应当是向每一个人敞开的。”

“太难了，哥哥。”我沉闷地回答，“父母都是右派，妈又是资本家。”

“别灰心，看你怎样认识。妈妈剥削过工人，这是事实。原来营造厂的一位严叔叔手指让机器轧掉了，父母就把人辞了。要是现在，能为这把人家辞了吗？临时工还要转为正式工呢。当然，父母的资产阶级思想还不止这些，比如爸爸从不读专业以外的书，没有什么信仰。妈妈思想有些庸俗。我们对周围的人，尤其对自己，更要用正确的思想去衡量、去分析。”

他中肯的话语几乎使我掉下泪来。他凭什么入不上团？凭什么我们的操行都得“中”呢？

当我走在去学校的路上，耳边还回荡着他的声音：

“我还不想失望……我希望你能入团！”

在他的鼓励下，我不止一次地写过入团申请书，虽然自己学习成绩较好，也很听老师的话，但照旧挽救不了我得“中”的命运。我再也不写入团申请书了。终于哥哥也彻底失望了。

有一天，我和哥哥又谈到这个问题，他沉痛地说：

“我要求入团是为了什么？无非是更要起先锋带头作用。一个什么组织也不加入的人，照样会要求自己成为人杰。”

我望着坐在写字台边一动不动的哥哥……

一九五九年九月，哥哥升入高三了。

这时，他已经树立了这样的幸福观："人的幸福是和艰苦奋斗连在一起的。"他十分喜爱加里宁的那段话："凡是创造自己幸福的人，应该做全体工人与农民的幸福的匠人和创造者。当他成为一切人幸福的匠人时，他就会成为自身幸福的匠人了。"

中学快毕业了。理想和前途在召唤哥哥。他加倍地用功和努力。

为了毕业更能"保证质量"，有些学校每到毕业班就要换极左的班主任。

哥哥对我说："我不喜欢这位新来的先生，对出身好的同学笑脸相迎，一点小事也要对他们大加表扬，常常对全班夸耀他们父母的功绩，哪怕有的人学习并不好。而对出身不好的人呢，总绷着脸，如临大敌似的。这样的人也配做班主任！我写了个希望他一视同仁的条子悄悄递给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格外敌视我了。"

后来我上了初三，才深刻体会到哥哥这些话的分量。因为那时我们也换了班主任，"左"得很！

学习、探索、奋发！既然政治上被判了"死刑"，哥哥便将一切希望放在业务上。他要用门门杰出的成绩来迎接高考。一九五七年以前，父母立志要让四个孩子全上大学。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经济条件太差，政治上又受打击，母亲不得不改变了看法。她认为当一名技术员最吃得开，当工人也不错。

随着年龄的增长，哥哥渐渐孕育了一个理想的志愿——搞地质勘探。

他对我说："我从小就想，长大了我做什么最有兴趣呢？那时候想过当作家。可是这几年，我有一个最理想的志愿，就是考地质学院。我爬山涉水，走遍全中国寻找矿藏，多有意思！我不但可以钻研业务知识，而且也能了解社会，熟悉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和风土人情，走到人迹罕见的地方，欣赏各种大自然的奇景。在爬山涉水中，还能磨练自己的意志，也有助于写作。这个专业最理想了。"

当时，有些青年人把地质学院视为吃苦受累的院校而不愿报考。哥哥是不是认为自己出身不好，考大学文科根本没希望，别人不愿去的地方录取的希望还大一点呢？我想，这也许是一个原因。

哥哥当真为自己的理想做准备了。搞勘探必须有健壮的身体，哥哥虽无任何疾病，但是看起来却显得文弱。于是他求母亲添了些钱，买了一副生铁哑铃，订了严格的锻炼计划。冬天，天刚黎明，闹钟一响，哥哥就"噌"地从被窝里坐起，以军人般的迅速动作穿衣、叠被、用冷水洗脸擦身，做完体操后便轻装环跑东四猪市大街、神路街、隆福寺等街道。他满头热汗地跑回家，给屋里带回一团新鲜的空气，脸颊也少有地红润起来，然后便站在院子里举哑铃，每天总是比前一天至少多举一下，坚毅地练着臂力。

"现在我能举四十六下了！"每当他完成最后一个动作，再也举不动时，常常高兴地报着数目。

十八岁了！哥哥生日这天，格外高兴。昨天晚上——四月三十日，他就对着穿衣镜照了半天，琢磨着明天照相的姿势和表情，并找出了明天要穿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的一身旧蓝布制服和一件旧白布汗衫。他梳着油亮密实的黑发，一会儿往前梳，一会儿往侧梳，梳了半天，还是认为自己原来的学生式平头最好看

"妈，今天我十八岁了，"五月一日早上，哥哥对母亲说，"您给我五毛钱照张相吧。"

"五毛够吗？给你一块？"

"不用了，先照张一寸的就行。照好了还可以放大。"他接过钱，欢愉地嚷道，"十八岁了，成人了！"说完高兴地跑向照相馆。

成人了！哥哥对前途抱着多大的希望啊！他学习更加努力，除了必须学的俄文外，他又给自己加了门英文。

"高考一定要争取门门一百分！"他自信而又沉郁地说，"家庭出身不好，成绩再不突出，上大学能有希望吗？"

小屋的灯光亮得更晚了……

文艺创作和投稿仍是他的爱好，这时他已不再写什么童话之类。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尽管文章很吸引人，编辑们也不敢采用——调查出身，是两个右派的儿子，父亲又被开除公职去劳教，谁敢采用呢？后来，哥哥投稿不再那么勤了，只是把自己认为好的作品订在一起，名曰《前途文集》。这文集真是一个文思与才华的集锦！他曾写过一个中篇小说放进这文集中：《陈静文的病》，刻画一位成绩很好而因肺

病休学的学生和一位极左的班主任，也刻画了学校医务室的一位好大夫“黄妈妈”。陈静文在病中的心理状态被描写得细腻而深刻，他是那位班主任极左思想的无辜受害者。而班主任所以那样“左”，又是怎么造成的呢？文章提出了一连串令人深思的问题。

“罗锦，你给我的作品提提意见，”每次写完，他总是第一个叫我看，“注意，要第一感觉，有什么说什么。”

我感到多么高兴和骄傲——作为他的第一个读者！但尽管如此，我和他并不算处处知心。也许由于年龄的关系，他并不什么都和我谈，最知心的要数他的几个同学。他们常常找他，高谈阔论和笑声时时从小屋传来。有一次，他和一位同学聊得起劲，连晚饭都顾不得吃。送走那位同学后，他回小屋便写，然后才到大屋来吃那已经凉了的晚饭。我很好奇，到他的小屋看了看，那打开的笔记本正放在桌上，我站在桌边掠了几眼，原来记的是他和那位同学的谈话——关于文艺现状的讨论。如有没有人性、个性；有没有超阶级的东西；文艺应如何反映社会等等。用甲乙二人对话的形式写出，十分生动活泼。他们的观点，与当时流行的某些观点是很有差异的。

“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

高考成绩优异，却连最末一个志愿也未被录取！难道

这中间有什么差错？哥哥怀着一丝微渺的希望一大早就去找班主任。

“那就在家等着嘛，”班主任冷冷地说，“作为社会青年也可以找工作嘛！”

哥哥全都明白了！

从早晨到天黑，他一动不动地坐着……

这一天，是他痛苦的一天，抉择的一天，新生的一天，是《出身论》在强烈萌动的一天，也是他被迫走上政治斗争的险恶道路的第一天。

四　上社会大学实践系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历来就有两种不知畏惧的人。一种人，他们事事遂心，除去他们浪漫主义的幻想，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他们的畏惧。这种人的不知畏惧，不见得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大有可能是一时的冲动和任性，因此很难讲他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另一种人则不然，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敢于和自己头脑里的私欲进行殊死的斗争，敢于甩掉包袱，轻装前进。这种人的不知畏惧是真正的无所畏惧，只有这种人才称得上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假如没有高度的政治远见，假如没有巨大的斗争魄力，就一定不会成为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哥哥正是这样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他十分清楚前途的

崎岖。

第二天一早，哥哥写了一封信，尖锐无情地斥责了那个极左的班主任。我记得信里有这样的话：

> "……您这种做法，对无辜的心灵是残酷的扼杀。做为一个教师，这样做无异于犯罪。如果有一天我当教师，我决不象您这样对待学生……"

"嗐，你写这干嘛！"母亲虽然深深地同情他，却又不满地说道，"你写了，他就能改了？"

"虽然改不了，"哥哥一面贴着邮票一面说，"也要触一触他的灵魂。"

"管什么用？你要不给他提意见，也许还不至于……"

"他对不提意见的出身不好的同学就好了？"哥哥反驳道。

其实，哥哥那时候还不可能象我们今天这样意识到这类问题深刻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根源。但哥哥决不忍气吞声，他要回击。他给高教部也写了信，控告班主任打击报复——他那时还没有更充分确凿的事实来证明，班主任的作梗其实只是社会上极左势力微小的一部分；但他要向扼杀青年的恶势力宣战。他用这封信向中学时代做了诀别，也用这封信表明了他决不退缩的抱负和恒心。

"没考上就没考上吧，不分配就不分配，没什么了不起。找个工作也不是找不着，早点儿工作，满好。"吃饭的时候，妈妈安慰着哥哥。

哥哥一直默默地吃饭，这时抬起头，平静地说：

"妈，我已经考虑过了，咱家经济确实很困难。但是我打算自学一年，希望您支持我再考一次大学。"

母亲听了一愣，随后，脸上渐渐阴沉起来。

哥哥继续说道："如果说因为班主任作梗没能考上大学，现在我摆脱了他，倒是件好事。我想再试验一次，看在没有人作梗的情况下，我能不能考上？如果我再考不上，您放心，我再不考了，一定去工作。"

"有几个社会青年考上了大学的？"母亲皱着眉说道。

"既然高教部有这规定，就可以试试。或许，那些人的成绩都不太好？我一定要再试一次。"

"五年不是简单的呀，"母亲沉着脸，为难地说道，"这五年，可怎么供应？一个大学生，每个月没有二十五元，下不来！申请助学金，咱们又不够条件，全家总不能不生活呀！"

"我想好了，妈。如果自学这一年的基础我打得特别好，上大学就不太吃力，尤其是英文俄文。我可以白天上学，晚上翻译点外文资料，挣些钱来减轻您的负担。泽涵的父亲在情报研究所，要点资料翻译不成问题，我已经问过他父亲了。"

哥哥在家自学。他找来了大学中文系必读的书目，虽然那些书他大部分都读过，他也不因此懈怠，反而加倍地用起功来。从线装的古书《史记》、《孙子兵法》到《新约》、《旧约》，他都要涉猎和钻研。为了他如此博览群书，亲友们曾担心地劝过他："知识太多太杂了，危险哪。"他们所说的危险，就是怕知识多了，头脑比一般人复杂，想得多，对社会有看法，因

而倒霉。然而哥哥听到这劝告只是不介意地一笑，他决心要做一个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都丰富的人。

他的学识常使他的学友们暗中钦佩。我听见他的高中学友刘健华和曹泽涵对母亲说过：

“伯母，罗克的水平我们都赶不上，可惜这么一个人才！……”

一九六〇年底，报纸上第一次号召青年人到农村去，去做有文化的新农民。

哥哥自愿报名去郊区公社当农民，把申请书交给了东四街道办事处。

“哥哥，”我说，“妈妈希望你上工厂呀，你干嘛非要去当农民呢？”

“我想了解社会，了解各个阶层，”他说，“从中也锻炼我自己。妈仅仅从经济上考虑，这是庸俗的想法。先别告诉妈。”

他一面等着批准，一面仍顽强地自学。在生活上比以前更刻苦了。过去他上高中，母亲无论怎样紧，也要每月给他五元零用，他把绝大部分钱用来买书。自从未考上大学，哥哥便自动对母亲说：“妈，我只要一元就够了。”

“你总不能那么紧吧？”母亲见他执意不肯多要，有些生气地说，“咱们干脆来个折中，每月给你两块钱吧，万一你来个同学出趟门儿呢，手里哪儿能一分没有！”

哥哥同意了。他把这两元钱用得不能再省。洗澡，他在家里洗，这样又省了几毛钱；他无钱买书，便借书看。但

是当我们生日时，他仍要送礼物给我们，有时还要带着干粮骑自行车和同学远游，买些纸、笔等等。每天早上，他骑着家里那辆旧自行车去北京图书馆，象上学一样地遵守时间，并坚持锻炼身体，毫不懈怠。为了把这一年当做两年、三年来学，他在怎样刻苦地用功啊！

那时，哥哥写了一个剧本：《法官与罪犯》。内容是一母所生的兄弟两个，由于弟弟一生下来便给了人，不通音信，长大后兄弟二人互不相识。在他们相见的那天，哥哥已成了罪犯——为出身问题鸣不平的政治犯；而审判他的正是"出身"好的他的弟弟。他们的母亲是资本家，由于社会所承认的"衣裳"的价值，他们一个成了"反动透顶"的罪犯，一个成了响当当的"革命者"。

可惜这个剧本在文化大革命时和他写的许许多多文稿一起烧掉了。

哥哥的小屋，在我眼里，赛过所有金碧辉煌的宫殿！我一定要画下它，留个纪念。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人们要纪念它。一天，哥哥去图书馆时，我进了这小屋，画了一张水彩画。我画下了它的全貌，多希望有一天它能成为一本书里的插图！

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上午，只听邮递员在大门外喊道：

"遇罗克的信！"

哥哥跑出小屋。他一面看信，一面兴奋地叫道："太好了，太好了！"

“什么好事，罗克？”院里的四家邻居都探头问道。

“红星人民公社让我在一星期之内去报到！”

邻居们听了大不以为然。

“我立刻去迁户口！”他匆匆走进屋，忙着找户口本、粮本、副食本。

“罗克呀，你急什么？”姥姥说道，“再有一两天就卖春节的供应品了，一年才这么一回，差一天你都等不了？”

“等不了，等不了。”他故意用淘气的声调说。

“再说，也得等你妈回来呀。”

“等不了，等不了！”哥哥做个鬼脸跑了。

那时正是困难时期，姥姥十分惋惜那些即将到手的副食品。

哥哥迁户口回来，吃完午饭，便收拾行装。首先放在包裹里的便是书、纸、本、笔，其次放了个脸盆，拿了几件旧衣服。

“不要弄乱我的小屋，”哥哥嘱咐我们道，“星期天我还得用它呢。”

再见了，小屋！哥哥临走时最后向它瞥了一眼。小屋的门紧闭着，象在静静地等待主人的归来。

我们帮他拿着行李上了汽车。他在车窗里探出头来嘱咐我们：

“我会给你们来信的，叫妈不用惦记！”

汽车扬起一股尘烟，矫健的雏鹰向蓝天飞去了……

他走了，家里却象少了不止一个人，有些空落落的。我似乎有更多的时间去想他。这时，我回忆起他儿时到现在的成长过程，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更深深地觉得，这是一位多么杰出的、勇于奋斗的人才啊！

四天以后——一九六一年二月十日，接到哥哥的第一封信：

妈妈姥姥：

我平安地到了这里，一切顺利。领导对我很热情，将我安排在菜园小队。这小队包括温室组。初来乍到，远远看到几个碉堡一样的圆形建筑，原来是培养蘑菇的温室。菜园小队共三十个高中学生，我们算是农业工人，先发给工资二十五元，住宿舍，有食堂，饭票制。食堂菜给得很多，很便宜。主食是大米饭和馒头。我第一次领到工资，可高兴了，买了几块钱饭票，给您买了瓶好酒，给姥姥凭票买了半斤点心，还买了些大葱和鸡蛋。这些好吃的都放在床底下。剩下的钱我星期六下午回家时交给您。

来到农村
一切尚好
夜间出门
谨防狗咬

罗克

一九六一年二月八日

“这孩子，没正经的！”母亲哭笑不得地说，“也不等我回来就迁了户口跑农村去了！和谁商量啦？真是要多任性有多任性！工厂找个工作还成问题？不听，非要跑农村受苦去！

唉！幸亏是农业工人挣工资！”又对我们说，“还有你们一封呢！”

我和弟弟欣喜地打开信看起来：

最想念的妹妹弟弟们！

今天我已经上了社会大学的第一课——扛阳畦的草苫。二百来斤重的草苫，社员一扛就走，可我却感到十分吃力。队长要把我调到温室组去，我拒绝了。别人扛得动，为什么我就扛不动？咬咬牙，一天到底干下来了，虽然疲累不堪，但心里格外轻松。

愿你们常给我来信！

你们的好哥哥　灯下草

“好哥哥”——他常这样调皮地自称。当然，他是受之无愧的！

星期六傍晚，哥哥回来了。他晒黑了，显得高了些，肩膀也显得宽了。他把钱都交给母亲，母亲让他留了五元零用，她感到十分欣慰。

哥哥又从中抽出一元对姥姥说：“这一元您买戏票吧！以后我每月孝敬您一元。”

“好小子，”姥姥笑得合不拢嘴，“姥姥也花上你的钱了！”

“以后那一元由我给吧，”母亲说，“你的五元零花就是你的，每月我收你十块钱足够，我给你存起来。”

其实，父亲劳教还未期满，家里正艰难，母亲想把钱存起来是做不到的。

他在罗勉那本书的扉页上题词：

书本是海洋，
字句是波浪，
眼睛是帆船，
载着你呀，
到“抱着天的怀里”去游荡！

“这‘抱着天的怀里’是什么意思呢？”

他解释道：“这句是外国一本儿童诗里的——蓝天问大海：‘大海，你为什么这么蓝？’大海回答：‘因为我的怀里，抱着美丽的天。’你看，写得多美！”

他给罗文讲了一篇最著名的西班牙童话为什么好，又翻着《裴多菲诗选》说：

“《自由与爱情》是裴多菲最有名的一首，”他背着手，在屋里踱着，背诵道，“‘爱情，自由，人们要的就是这两样！为了爱情，我献出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又将爱情牺牲！’写得多好！柔石译成：‘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还有这一首，”他翻着书，找到那首《路上》，指给我看道，“这首写得也好。一个多年不见母亲的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想着一会儿见到母亲将说些什么，但是一到家，什么话都没了，只是吻着母亲，‘象果实挂在枝头’，多逼真动人！”

“哼，你还知道这个！”母亲一撇嘴说道。其实，她心里不定多高兴呢。

母亲对哥哥的职业越来越满意。这不仅是哥哥每月给

母亲十元，后来长了工资便给十五元，更因为这两年的副食紧张，多亏了哥哥每星期给家买奶油、撑死的填鸭等营养品。她常幻想着退了休到哥哥那里去养老，等哥哥结了婚抱孙子呢！可是，哥哥有女朋友吗？我从没发现过，也从没听见他和他的学友们谈论过女人。哦，那个儿童时代的大眼睛小姑娘，象童话般地消失了。虽然再没听哥哥提起过她，可我却不止一次地回忆起他那位儿童时代的“美人”：她那在郊外野餐时快乐的尖叫声；她在我们百草园里将一大把合欢花包在绿叶里的新奇的发明；她站在门廊下望着靠石柱坐着的哥哥，二人想入非非地说着什么……初中、高中，哥哥全是在男校度过，也许他爱过，但那是对男孩子的纯洁的爱。在他的日记里，记载过对一个男孩子的爱，就象对一个恋人那样钟情。但是他们什么行为也没有，所有的只是一个眼神，一个微小的动作，所有的只是哥哥在日记里的热烈澎湃的感情，那个男孩子却未必知道……成年了，美妙的儿童时代和情思勃起的少年时代过去了，却始终没有发现哥哥有过女朋友。呵，那是有一次，正值哥哥公休时，我走过他的桌边，瞥见一首他刚刚写完的诗，那一行行清秀的小字十分吸引我，便看起来：

桑田里桑树多美，
桑叶儿飒飒低语。
遇见了我的人儿，
我心里多么欢喜！

桑田里桑树多美，
蟋蟀将琴弦弹起。
遇见了我的人儿，
…………

这诗既象民歌，又象自由体，读起来朴实亲切，朗朗上口。写在一张横格纸上，有一两处涂抹的痕迹。他写的是谁呢？是不是要投稿？不象……我不由一个个回忆起那里的女孩子来……会不会是她？我想起女宿舍里一位活泼伶俐的女孩子，是广播员，也是新去的农工，高中毕业生……正想着，哥哥进屋来了。我赶紧离开桌子，假装干这干那地瞎忙活着，一面却偷偷观察他打算把这首诗如何处理，如果他是准备投稿，我倒会免去全部猜测。只见他站在桌边对着那首诗心事重重地发愣，然后沉思地拿起来，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撕了……

也许，那是朦胧的、由于各种因素而夭折的爱情？谁知道呢！

我知道哥哥绝不是禁欲主义者，虽然他的一生始终是严肃的。他的感情含蓄而丰富，他渴望着爱。

一九六一年九月，我考上了工艺美术学校，心里高兴极了，竟举着报到通知书在院子里欢蹦了半天。

“这下我可有盼头啦，”母亲那天多喝了半盅酒，显得很高兴，“熬出一个是一个呀。看来，只有上中专这条路最好。

学校管吃管住，出来就是技术员，满不坏！……”

哥哥听了我考上中专的喜讯，兴奋地对我说：

“你缺什么？我一定要送你点儿东西。”

他去工艺美术服务部买了水彩、画笔和速写本，在那亚麻布面、印着奔跑的小鹿的速写本里，题上他的《祝词》：

我祝你幸福；
前进吧，
你踏上了理想的道路。
但愿你许血于轩辕；
但愿你忠实于艺术。

我祝你幸福；
勤奋吧，
你锻炼得精力永充足。
但愿你征途中饱经风险；
但愿你青春的活力把万难排除。

我祝你幸福；
幻想吧，
你憧憬着奇妙的前途。
但愿你开放得争梅斗菊；
但愿你吸吮大自然的温柔。
扬帆、

击鼓，

祝你

幸福！

好哥哥罗克

六一年九月

晚上，我躺在床上，心里那么幸福、快乐，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哥哥那劲秀、清晰的笔迹。快乐之外，又隐隐感到悲哀。我多么希望也能写一首祝贺他考上地质学院的诗啊。

哥哥酷爱大自然。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农村，每逢星期天仍不减从小就喜欢远游的兴致。他与要好的学友，偶尔带上我和弟弟们，去登山、游泳。下大雪去爬长城，秋天看红叶，夏日游昆明湖……这些成了他生活里必不可少的内容。在自然的怀抱里，那柔和的风，那辽阔的景，一下子便荡涤了他胸中的苦闷，使他豁然开朗，感到自己是天地的儿子、国家的主人，感到奋斗之乐、不屈之美……呵，他从自然之母那里得到了多少美的感受和动力啊！每逢远游，他总要做一首诗或词来纪念一天的感受。

一九六一年秋天，他和好友们登香山"鬼见愁"，做了一首词：

游　仙（登香山鬼见愁）

巨石抖，

欲把乾坤搂。
千古奇峰人共有，
豪杰甚或阿斗。

山上绿紫橙黄，
山下渺渺茫茫。
来路崎岖征路长，
那堪回首眺望！

这首词，在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我生日时，他买了一个天蓝色塑料皮的大日记本，工工整整地抄在扉页上，送给了我。

一九六二年七月，哥哥和农村的两位好友，好不容易取得了公社同意，去报考师大中文系。他们多么想上大学呵！尽管三人成绩都很优异，却由于出身问题，硬是叫大队卡住了。血统论的流毒是无处不在的！虽然哥哥在家里不愿多提这事，不露声色，但他不定多痛苦呢。

一九六二年八月中旬，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哥哥对我说："你离开学还有两个星期呢，最近我们菜园忙不过来，招家属临时工，一天一块钱。你在家呆着也没事，不如去干上十天，还能挣十块呢，买点书也是好的。再说，你了解了解农村生活，对你也没坏处。"

"好吧。"我欣然同意了。

上午，哥哥让我和他一同去首都图书馆还书借书。为了

让下乡青年们有书读，哥哥想方设法办了一个集体借书证，每次可借阅二十本，哥哥自动担负起还书借书的任务。下午，我帮他拿着沉甸甸的书，一同上路了。书包里还有他给当地社员代买的茶叶等小物品。他总是十分认真地完成社员托付他的采办任务，买回来的东西交代得一清二楚，不差分毫。我亲眼看到，那些男女青年都和他相处得那么亲热和自然。

我在家属队干活，哥哥在壮劳力组。这天，他那组也和家属队在一块地里劳动。家属们一边干一边聊着天，手脚却飞快！我使劲赶才勉强撵上她们。使我吃惊的是，哥哥干得并不算慢。他蹲在菜地里，一反平日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飞快地间着菜苗。他那不甘落后的姿势，那闪亮的眼镜、紧闭的嘴角、瘦弱的后背，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当时我只佩服他，却并没想到他何以会这样顽强……

好不容易盼到歇息，大嫂们鼓励我说：

"行，干两天就好啦。你哥哥乍一来，还不顶你呢。"

"罗锦，干得下来吗？"哥哥从那边走过来问道。

"干得下来。"我勉强回答。

一位三十多岁的男社员从那头走来，老远就喊：

"喂！伊拉克（社员们按照哥哥名字的谐音给他起的外号），昨儿个，那工分你咋给我记的呀？"

这时我才知道哥哥原来是记工员。

"怎么了？"哥哥望了他一眼，坐在田埂上，好象不屑于再看他似的，把目光投向菜地。

“我明明干了一天，你咋给我记了三憩儿？”

“下午那半憩儿你哪儿去了？”哥哥望着菜地微微一笑。

“你说我哪儿去了？”他显得很有理。

“还是你说吧。”

“我说就我说，不信你问问——”

“甭问了，”哥哥沉静地说，“你当我不知道呢？下午那憩儿，你大儿子来找你，你回去一会儿，回来打个照面又溜了，你当我不知道呢！”

几个社员笑了。直到这时，哥哥才轻松而锐利地盯了他一眼。

那人圆睁的小眼睛和哥哥的目光对视了两三秒钟，似乎还想要赖，却又噗哧乐了，无奈地笑嚷道：

“好你个伊拉克，我算服了你了！也难说，你小子比别人多俩眼睛！”说罢，拾起一块土疙瘩随便一扔，悻悻地去了。

“这赖瓜！”一个社员不满地笑道，“记工员这差事不好当，就是爱得罪人！”

“因为有空子可钻，有人才敢赖。”哥哥说，“如果都一丝不苟，没空子可钻，就没人敢赖了。”

“不是说，”一位大嫂一边往包袱皮里装间出的菜苗，一边说，“听我们当家的说，那次上馆子吃饭，有伊拉克在旁边，谁也不敢往兜里装瓷勺、小盘儿什么的，谁知他身上怎么有股神光儿？”

这句话把哥哥也说乐了。

干了四天，手上打了泡，一握农具生疼，腿酸腰也酸，我真不想干了。

好象什么也瞒不过哥哥，他似乎早已看出我的心情。一开始，他这么鼓励我：

“还有人想跟你交朋友呢。”

他看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又说：

“画呀，你不是带着水彩和纸吗？你看，这儿的风景多美！要是我，早利用中午时间画它一张了。”

“嗯。”我勉强地答应着。

“手疼？腰酸？不要紧，过两天就好了。这不比在学校下乡劳动。你们家属队的活儿算最轻的了，我们用锹翻菜畦，不比你们累？可我也干过来了。她们还夸你能干呢，坚持坚持就好了。”

第五天，我又勉勉强强干了半天。中午收工时，我向宿舍走去。钻过一片玉米地，只见哥哥也扛着铁锹从另一块地里出来了。一见我，他就从破旧的制服口袋里掏出个桃子递给我说：

“你尝尝，甜极了，我们这儿的特产。刚才一个社员给我的，我刚咬了一口就想起你。你要是嫌脏，用水洗洗再吃。”

本来我想用水洗洗，一听这话，心里十分感动，反倒不嫌脏了，就吃了起来。我们俩向宿舍走去。我没话，他也没话，好象他已知道了我心里在想什么。

“哥哥，”我终于鼓起勇气说，“我想回家了。”

“你真决定走？”

"嗯……我还想多练练画呢。"

这话根本不值一驳，然而哥哥却不说什么，也不挽留，这反倒使我更加惭愧。

"好吧，"他的语气平静而温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今天吧。"我嗫嚅着说。

"嗯。晚上我送你去车站。九点钟奶牛场有送奶的卡车直达东单。坐那个车还能省几毛钱，又快。下午你不愿意干活就呆半天吧。我还是希望你再坚持干几天。"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觉得太对不起哥哥的爱护和关切，可是又不能摆脱怕苦怕累的想法，心里真不是滋味儿。午饭后，我坐在哥哥的床上，看到他枕边放着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两本哲学著作。这两本书，我记得他以前都看过。

书底下是他的读书笔记，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在摘录旁注着各式各样的批语，如："哈，抓住小辫子了！"、"可笑"、"深刻"、"妙"、"讽刺"、"注意"等等。有些是反问作者的语句，仿佛在他面前的作者是一位相当熟的朋友。

枕边还有一本俄文版的中篇小说《阿霞》。扉页上写道："没用字典读完此书，足可纪念也。"枕上方的墙壁上用图钉按着一小方块白纸，写着本月的读书计划。劳碌了一天的哥哥，就是这样顽强地学习着。我的心哪，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天还不太黑，自行车在水渠那狭窄的土埂上行驶，路中间早已被行人踩成微凹的、光溜溜的羊肠小道。宿舍渐渐被甩在身后，与昏暗的夜色溶成一片了。水沟边黑黝黝的

高大树木哗哗作响，似乎在催促着黎明的到来。美丽的影子倾洒在流动的河水上，映着月光，抖抖地闪动着。沁人肺腑的田野香气扑鼻而来，倍觉爽快。深沉、寂静、蕴藏着无穷生命的田野呵！

星星象一盏盏灯挂在天边，正静静地望着我和哥哥呢。他骑车带着我，我时时担心他万一摔倒。前轮有时微微一歪，我就一惊，真怕我们俩都掉到沟里去。哦，他微驼的却有力的后背，他这散发着亲切气息的破旧衣服，那每一条衣褶、每一根布丝都浸透着多少苦辣酸甜呵！我不由得轻轻捏住他衣服的后襟，仿佛生怕失去他。我们平安地驶过一段路，又步行着穿过了一片草地。夜雾打湿了草梢，我们的裤腿都湿了。一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静极了。只有苍黑的田野和银色的月光，只有我们蹚着青草的唰唰声和蟋蟀那动听的鸣唱。一路上，我问他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他给我讲着……路过一片葡萄园时，他给我讲社员偷葡萄的巧妙方法——如何把守夜人引到另一边去……

到了奶牛场，正好有几个搭那辆车回家的女青年，她们叽叽嘎嘎笑着和哥哥打招呼，也都亲切地管他叫“伊拉克”。

一年来，哥哥的处女作《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和《评影片〈刘三姐〉》相继问世了。他高兴得在小屋里跳跃，险些撞破了低矮的纸棚。

他买了一条浅粉色的缎带，天蓝色电光纸，订了一个大硬皮本，扉页上贴着自己一张四寸的半身像。他对我说：

“今后，凡是发表的文章，我都装订在这大本子里，作为一个文集。”

文章的发表给了他无限的力量，他又看到了自己的前途。他给文集定名为《前途文集》。这个集子如今还在中级法院。

有一次，我读了一本美国小说《小妇人》，很想动笔给哥哥写封信。这是我第一次给他写信：

哥哥：

当暑假那天你带着我在田野上行驶时，我心里就骂着自己是逃兵，可是我又没有勇气承认，直到今天，一想起我如何怕苦怕累，心里就不安。我读了一本《小妇人》，里面的乔多么象我呵！我真喜欢她的性格，可是不如她有勇气。后来，她嫁了一个白发苍苍的穷教授，这结局似乎令人奇怪，可是又很能说明她的性格。我还看了一本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我真喜欢……

哥哥很快便回了信——

罗锦：

你的信我看了两遍，并把它珍贵地保存起来。我真高兴你能写出你的读书感想，可是，光是喜欢还不够。人的面前有两类知识，一类是业务知识，一类是人的知识，这两类知识我们都要认真地学习。《热爱生命》这篇小说，列宁曾给予高度评价。它道出了强者的力量，道出了生命的价值。《小妇人》我也看过，写得细腻逼真。我也喜欢乔的性格。但是，如果看书以喜欢不喜欢为满足，读书就成了消遣。应当学习作者熟练地掌握各阶层人物的语言和思想方法……你是搞艺术的，应当多涉猎文学作

品，以此开阔自己的艺术眼界。我建议你订一个读书计划。现在我初步帮你拟一个，供你参考：1．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2．托尔斯泰的……

这封信里，他列了几十本各国的名著，我都未看过。我望着哥哥那清晰、劲秀、有些局促的笔迹，呵，他在我的心里一下子高大起来——哥哥，不仅是我的兄长，还是我的良师，他多么值得我敬爱呀！从这以后，我照哥哥的书单一本接一本地看了起来，后来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

这期间，母亲给哥哥介绍过一次对象。也许她看哥哥已经二十岁了，还没有女朋友，想表示做母亲的关心吧。然而仅仅这一次，却弄得大家尴尬万分。

说来话长。一九六一年九月我考取美术学校，开学报到那天，哥哥曾特意请了假和母亲一同去送我。我们高兴地在汽车上说着话，一位长得挺漂亮的姑娘直瞅我们，她身边也有件行李。

"你是工艺美校的吗？"她凑过来问，"新生吧？"

"是呀。你呢？"

"我也是那学校的。今年读三年级了。"

"噢，"母亲望着她笑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德。"

"你哪一个专业的？"

"雕塑。"

"雕塑都包括什么？"哥哥问她。

她回了哥哥的问题，我们又闲谈了些别的。

母亲对德似乎很有好感。每逢星期日我一回家，母亲就问到她。因此我也有意地和德接近起来。

一九六二年哥哥的文章发表后，德对哥哥似乎很感兴趣，问了一些哥哥的事。我把这新奇的发现告诉了母亲。父亲这时已劳教期满回家，每日在家里翻译外文资料挣些钱以补家用。

“你哥哥也不小了，”母亲说，“要说交个朋友也不算早了，可以多了解几年嘛。

父亲这时插问道：“她漂亮吗？”

“你就知道漂亮不漂亮！”母亲不满地顶撞他。

“你看你妈，”父亲温和地笑道，“一问漂亮不漂亮你妈准生气。”

“我生什么气？”母亲一跺脚站起来，却又坐到另一个凳子上去了。

“我哥哥能同意吗？”我怀疑地问。

“他有什么不同意？”母亲胸有成竹，“人长得挺漂亮，又是中专生，再有一年她就毕业了，就是技术员。这样的对象可不好找哇！再说，那天在汽车上，你哥哥一个劲儿瞅她，我早看在眼里了。”

我有点儿怀疑母亲的观察。

“这事应当先问问哥哥吧？”

“不用问，”母亲满有把握地说，“一问，见了面倒不自然。你只问问德就行了，她若同意，下星期日你请她到咱们家来吃午饭，我做几个菜。等我瞅个机会，让他们俩出去走走，

这事就成了。”

看母亲那十拿九稳的神气，我也似乎相信了。

星期天，我和德一起进了家门。从父亲的眼光中，知道他对德还是满意的。母亲又象一九五七年以前每次迎接客人那样，张着两臂，微微哈着腰，迈着快步子，满面春风，象要拥抱谁似地从里屋走出来，热情地招呼道：

“噢——来啦，姑娘！来啦？就等着你哪！”

德很有礼貌地向父母打了招呼。母亲忙着张罗，给她倒茶，一面闲聊着。

“我哥哥呢？”我问母亲。

“我叫他买酒菜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姑娘，中午在这儿吃个便饭，我做几个菜你尝尝……”

这时，哥哥买了东西回来，一见德便说：

“哦，那次在汽车上遇见的不就是你吗？”

他和德随便地聊着，母亲知趣地紧忙到里屋淘米洗菜去了。

我们三个闲聊了一会儿，母亲一定觉得该“趁热打铁”了，便端着正淘米的盆，站在里屋门口，笑盈盈地对哥哥和德说道：

“我看，你们俩不出去走走？一会儿回来吃饭？”

哥哥先是一愣，立即便红了脸，象抑制着无比的气愤，咕噜了一句：“庸俗！”便推开屋门，朝大门口扬长而去。

不用说我们当时都呆若木鸡，也不用说母亲气得脸直泛白，单说德吧，那处境十分尴尬。她很快便告辞了，无论

我送她时怎么解释，她也不再理我。

傍晚时哥哥才回来，若无其事一般，见我们心绪不佳，他便也不理我们，吃完晚饭就回公社去了。临走时，他悄悄瞪了我一眼，愤然地说道："你也干这种事！"

哥哥走后，母亲气得发誓嚷道：

"我今后要是再管这小子，我不是他妈！"

我和父亲觉得很对不住哥哥——真的，我们的做法太不好了，为什么不事先征求他的同意呢？

很久以后，我才好意思问哥哥对这件事的想法。他说：

"我最反对介绍什么对象。何况你们连问都没问过我，怎么知道我必定喜欢她？一个人最应当注重心灵的美。我觉得她很一般。"

一直到哥哥被捕，也没有发现他有过女朋友。也许是他没有遇到理想的人吧。或许，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更丰富的世界？

农村是哥哥进入社会大学的第一课。在这儿，他结交了和他志趣相投的朋友一同苦读；在这儿，他经受了艰苦的劳动磨练；在这儿，他熟悉了广大的农民；在这儿，他开始认真地调查了社会之一角。

哥哥是最不幸而又最幸者。他不幸——在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经历了极左思潮所带来的种种政治厄运；他幸运——正是这种逆境造就出后来的遇罗克。

呵，农村！大多数学生刚来时抱了多么不切实际的幻

想呵！他们幻想着老贫下中农的关切备至，幻想着大嫂们给他们缝补破了的衣裳……时过不久，学生们的幻想很快地自生自灭了。而他们惊异地发现，始终态度冷静、始终情绪饱满的就是哥哥。

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用瓜菜代粮吃。生活中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吃不饱，体力跟不上。

然而，哥哥从不叫苦，在田里仍是满头大汗地干着。他初学农活时的笨手笨脚常常引起社员们善意的哄笑，每逢这时，哥哥只微微一笑，抬袖擦擦额头、鼻尖上的“白毛汗”，便又挺着单薄的身体不自量力地干下去。他那在劳动中顽强的毅力，那始终持久的乐观和自信，曾感动了多少人呵。

由于下乡来的学生出身都不好，不久就传出一种说法：这是一些“反动学生”，不得不来的……

一位姓贾的戴眼镜的文弱书生，因“无理殴打温室小队长，蓄意报复”，被开除了。

不久，又有五个学生被调走，分散到不同单位，因为他们结成了“反党小集团”。

学生们的心灵又罩上了阴影——在这儿，仍逃不过“与众不同”的命运呵！终于，有的人走了，被骂为“逃兵”；有些年龄大的，开始筹划未来的小家庭。

当许多青年感到委屈、失望、迷惘的时候，哥哥却显得那样清醒、乐观、坚定、有力。

对荒谬、反动的血统论，他怀着更深的愤懑。在他的《前途文集》中，他由衷地表述了自己的情绪。

上工路上，他一路谈笑风生，随便地同过往的熟人打招呼、开玩笑。碰到哪个女工大嫂抱着孩子，他会过去拉住孩子的小手，挤眉弄眼地作怪相，逗得孩子咯咯笑，他自己也笑成了孩子。

哥哥所住的宿舍在大队部院里，共住八个人。两个老农工，两个原市委党校教师——“右派”，一个下放的中学教员和三个新农业工人——哥哥、小叶和小王（和他同考大学的朋友）。

“少年幸遇读书风”——这是哥哥在一首诗里写的一句。

劳累了一天以后，同宿舍的朋友们又开始了读书的竞赛——看谁最后熄灯。

哥哥让罗文做了个土台灯，灯柱和灯座都用木头削成，灯罩是用画报纸糊的，放在一张三人共用的“床头桌”上。这桌子，就是一只板条包装箱，口朝里，用砖支起来，象小学生的课桌一样，箱面再糊一张报纸。

每天晚上，哥哥、小叶和小王，按照哥哥的提议，先轮流在桌上练几篇毛笔字，然后便各自看书。

他读书很勤奋，并非处处都懂，倒是确实的。但他总是抱着一定的探索目的，尽自己的水平去穷究底蕴，吸取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哥哥具有这样一种无形的影响力：只要你不自甘颓废，那么在同他相处时，你就不得不调动起全部自尊和毅力同

他“竞争”，以做一个值得他结识的人为快。他的坚定信心和顽强毅力，会反照出你自己的盲目和虚浮，使你惭愧，促你奋进。当环境不利于人的求知上进，平庸颓丧极易流行的时候，这种影响的存在更是多么可贵啊！

在宿舍里读书的条件是艰苦的：拥挤、嘈杂；附近一个很大的粪池溢出难闻的气味；电井房机声不断。这里是蚊蝇最多的地方，宿舍既无纱窗、又无竹帘，只能任由蚊蝇横行。

为了静坐读书，要穿上很厚的布衣裤，将裤脚、袖头掖紧，外加一盒清凉油，才对付得了。盛夏，哥哥就是穿着这样铠甲似的衣服，一晚一晚地在灯下读着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及《世界哲学原著选读》……

经历了第二次高考落选的失望和打击，三个年轻人又希望去当兵，用热血表明自己的红心。但是，连体检都未被批准——军队里哪能要出身不好的呢？

他沉默了，彷徨了。菜园里再也听不到他那咯咯的笑声了。

“实在不行，我们就去钻象棋。看来只有这一样是不用看家庭出身的。”他对小叶说。

呵，这话多么使人心凉！“实在不行”这几个字，小叶还是第一次听到……

一天打歇时候，有个叫张小四儿的青年农工，平时常爱同哥哥开玩笑的，这天不知说了句什么，两人竟抱在地上滚了起来。哥哥那瘦弱的身子好象突然增长了无穷的力气，

简直不顾一切了。开始有些围观者还打气、助威，以为两人在玩闹。后来张小四儿发觉不对头了，赶快松开手爬起来，瞪着惊诧的大眼睛，喘了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

“你怎么啦?!……”

哥哥红着脸，谁也不看，带着满身的土，一声不响地坐到一边去了。他的神色很不好，激动中流露出内心的自责。

张小四儿还在一边吃惊地望着他：“怎么了，这是？真急啦！……”

是啊，他不能明白。他一向无忧无虑，因为他一身清白。虽然哥哥也一样……

哦，这是唯一一次哥哥冲动得失去了自制。过了好多天，他的情绪才渐渐恢复，但路上碰到什么人，也只是随便招呼一下，极少再开玩笑了。

为什么把人的肉体来源作为决定命运的根据？！啊，血统论，你这无所不在的恶毒的幽灵！

重复的打击落在旧的创伤上，总是倍觉沉重，他一时止步，沉默了。

但在短暂的彷徨之后，他重又奋起，开始了新的寻求和探索……

三个年轻人合写过一本诗集——《凝秀集》，由小叶用小楷誊录，小王去“荣宝斋”装订，每人一册作为纪念。但这本宝贵的诗集自然没逃过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他们合办过油印小报，这是哥哥提议的，虽然只出了一

期，但是那期小报却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一期，小叶写了一篇《浅谈京剧音乐的板腔结构》，哥哥写了散文《涿县纪行》。在那艰苦的环境里，他们怎样发着自已的光和热啊！

一九六三年夏，哥哥嫌宿舍太吵，租了老乡家一间小西屋，小叶和同室的小许也租了一间，和哥哥南北紧邻。

这间土屋狭小而低矮。四壁是黄褐色的泥墙，一铺后山炕占去地下近一半面积，中等身材的人伸手可及报纸糊的顶棚。前窗下支着一张岌岌可危的"桌子"，桌角一摞书，桌上是弟弟做的那个土台灯。案头壁上贴着一张"陋室铭"：

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

"这不使人难堪么？"小叶笑道。

哥哥回答："无论是'鸿儒谈笑'，还是'白丁往来'，耗费时间是一样的，所以无暇多顾了。"

他除了马列主义理论和哲学外，还自修俄语、日语，临睡前仍看各种文学书籍。

严冬，屋里象个冰窖，没有火炉，手脚冻得都伸不开。但每当他看到一段启发人的文字时，他的心都要热起来，常常忍不住走到邻屋去，把自己的幸福和激动告诉小叶他们，让朋友们和他共同享受书本的愉快。

小叶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一个雪花飞舞、脸盆里的残水早已成了冰碴的一天，哥哥闪披着棉袄进来了，举着一本书，赞叹地说：

"写得太好了！你也应该看看。"

“什么书，这么大惊小怪的？”

“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你看这段话说得多好呵：‘法学家既郑重地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太彻底了！”

是的，是实践和书本的养分把哥哥育成了人民优秀的儿子！

一九六四年初，他决定离职回城——进工厂从学徒工做起，当工人。

母亲反对说：“我看，你那儿虽然是农村，生活水平可不低呀！虽然三十多块钱，可顶城里四五十元花——那儿东西便宜，吃得好，开销小，离城又近。将来在那儿成个家，也不错嘛。偏要回城，有什么意思？你都快二十二了，还当学徒工？一个月才拿十六块钱！……”

她怎能理解哥哥的心思呢？她怎能知道，哥哥还有更大的抱负呢？

哥哥一下定了决心，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他终于办好了手续，要离开可爱的农村，要离开他的难忘的陋室了。他将奔赴另一个广阔的天地，去磨练自己，继续调查社会，学习社会。

行前，他在土屋的墙上留下一首诗，其中两句是：

物去人飞陋室留，
斯人知唱不知愁。

永远不会被哀愁击倒的哥哥，带着深沉的爱和恨，去了。他的心情，正如他在农村所写的一首诗：

千顷雪原泛夜光，
天心人愿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
路亦迢迢夜亦长。

他去了。他是向着更艰难的环境大步走去的。

首先他必须自食其力，决不能在家里吃闲饭。

那时分配工作一年比一年难。一九六四年比起他高中毕业时，工作已经很不好找了。

他在东四街道服务站，作为社会青年，填了求职登记表，等待分配工作。但是，就连求职登记表上也有“出身”一栏！

工作迟迟不分，他又决不想在家里多吃一天闲饭，于是一次次地去催办事处：

“我家里太困难，求你们先给我找一个临时工作，一边挣些钱，一边等分配。”

“工作？……”他们终于想起了，“看传呼电话的那个老头病了，要不你先替他干着？”

“行。”哥哥从来没有虚荣心和架子。

他看过传呼电话，在换房站帮助抄过换房地址。后来由一个熟人帮忙，又去首都图书馆做临时工，整理图书目录。还去中国情报研究所管理过外文资料卡片。所到之

处，他的工作是无可挑剔的。然而，即使当时这两个地方有招工名额，他也转不了正——这样的机关谁能要出身不好的人呢？政工组是通不过的。

一直到今天，首都图书馆的同志还感叹地说：

“你哥哥，多好的一个孩子呵！多少年了，他就是我们的老读者。在这儿工作时，没有人不喜欢他的，那么好学、聪明、会处人。唉！你哥哥一被捕，我们图书馆也挨了上头的批评——怎么让这样出身的人在这儿当临时工！”

又经过朋友的帮忙，哥哥来到安外蒋宅口小学担任代课老师，并代理过一段班主任。

他是怎样爱那些孩子们哪！一个非常乱、学习成绩很差的班，在并不长的时间内，一跃而为全校成绩和纪律最好的班了。这不奇怪吗？不，因为哥哥最懂得孩子们的心。

“罗锦，”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给我画一张壁报，题目是‘光荣榜’。左边写‘谁是英雄谁是懒汉’，右边写‘光荣榜上比比看！’左下角画个懒汉，右上角画个用功的好学生。这样……”他用铅笔给我打了个格式，立即去买来一大张图画纸。

于是，每个学生名字后面插了一面活动的小红旗，就在这张壁报上比赛起来——看谁的红旗走在最前面。哥哥用自己的钱，买来铅笔、橡皮、小图书，奖励那些领先的小学生。这一鼓励非同小可！在孩子们的眼里，同样一根铅笔，老师奖给的比起自己买来的，大不一样呵！

他爱孩子们。这个班里有几个调皮的学生，哪个老师

也管不了。一天上课，一位最调皮的男孩子做小动作，哥哥制止不听，便叫他站起来。他气吭吭地站起来了，一脸的不在乎。

哥哥继续讲课。过了会儿，叫他坐下，他偏不坐，有的同学笑了起来。

哥哥立即爽朗地对全班说：

“好，××认识到自己错了，老师叫他坐他都不好意思坐。我们大家欢迎他这种认识错误的态度，咱们一起鼓掌表示欢迎！”

大家笑着和哥哥一起鼓起掌来。

这学生偏又一屁股坐下了，装着不介意地晃了晃脑袋。大家又笑了。

“好！”哥哥又热情、肯定地对大家说：“这回，××是真正认识自己错了，他知道刚才老师叫他坐，他不坐是不对的了，因此他坐下了。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变成一个守纪律的好孩子。咱们再一次鼓掌，为他能够认识错误表示欢迎！”

大家笑着热烈地鼓掌。这个孩子羞愧地低了头，红着脸，半天都没抬起来。而哥哥却象没看见一样，接着讲课……

从此，这个最调皮的学生对哥哥敬服得五体投地。哥哥从不歧视任何一个孩子，一视同仁，并且常给有自卑感的学生更多的鼓励。

不光如此，每星期日，他不是带孩子们去过队日，爬山、游泳、划船，就是在他那狭长昏暗的小屋里给孩子们讲故

事。他讲高尔基、列宁小时候的故事，鼓励孩子们要正直地做人，克服软弱和怯懦；他讲世界名著，各种童话，教导孩子们要诚实、善良、有礼貌。在那光线暗淡的小屋里，多少双稚气的瞪大了的眼睛，在晶莹地熠熠放光啊！不论哥哥手里在做着什么，只要是孩子们一来，他便立即放下手里的事，满足孩子们的要求。

一次，我们玩具厂卖处理的铁制小手枪，二分一把。哥哥一听，立即掏出一元：

“快，罗锦，替我买五十把！”

“干嘛买这么多？”

“我给班上的学生一人一把。”

星期日，孩子们每人拿着一把小手枪，上景山和他玩军事游戏去了……

寒假，他组织了业余绘画小组，让我教孩子们画速写。教完，该做示范了，孩子们争着让我画像。哥哥指了指旁边一个期望地望着我、却又不好意思争的学生，微笑地说：

“给他画一张吧！”

当我把那孩子的画像送给他时，他的脸笑得象一朵新开的花。

和哥哥一起走出校门，才知那孩子就是最调皮的那位学生。

“我算把他治服了，其实他很聪明。”哥哥咯咯地笑着，这天真的笑声多象个调皮的大孩子啊！

后来，他又在朝阳区小牌坊胡同小学担任代课教师。不

久，由于在报上发表了批评姚文元的文章，他被学校解聘了。

幸运的是，办公处负责分配工作的徐老师认为他是一个既有头脑又有才华的青年，多方努力推荐，他终于进人民机器厂当了学徒工。那是一九六六年六月。

爱人者永远是被爱的。那些纯真的孩子们，在哥哥离校以后，还常来找他。而他也依旧关心他们的学习和一切，给他们讲故事。一直到他被捕，孩子们还频频来打听。一开门，总见一两个或几个孩子流着泪站在门外，难过地悄声问道：

“遇老师回来了吗？”

望着那些泪流满面的小脸，家里的人怎能不深受感动！

爱人者才会被爱！

无论在街道、机关、学校，哥哥都看到了“血统论”带来的严重恶果，看到许许多多被损伤的灵魂。他记下了真实的统计材料。

一九六六年六月，哥哥刚进入人民机器厂，“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便开始了……

五　“恶毒攻击罪”

森冷的小屋再冷，
冷不过哥哥的目光；
地下的岩浆再热，
热不过哥哥的胸膛。

…… …… …… ……

我永远不能忘记，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那天中午，我在屋里坐着，忽听哥哥在小屋门口招唤道：

“罗锦！”

我立即走进他的小屋，看到他的眼神十分不寻常，仿佛决定了一件什么大事似的，我不由有些紧张起来。

“现在抄家风大兴，”哥哥站在桌边，望着我沉痛而严肃地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决定把这些不必保留的日记、文稿、信件、笔记全部烧掉。你如果也有不必保留的日记，最好也烧掉。在烧它们之前，我真希望有个人能了解我！想来想去，只有你。现在你就坐这儿看吧，看完我就把它们烧了。”

我只有用沉默来回答，心情象临死前那般可怕——日记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呵！

“但是这本日记，”接着他拿起一本放在桌上的蓝皮“北京日记”，又说道，“这里面记的是我近一年来的思想。这些想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无论如何我也舍不得烧了它。你能帮我藏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吗？过了这阵抄家风就拿回来。”

“能！”我不加思索，就双手接过来，坚定地搂在胸前。他注目地望着我，似乎完全相信了。

“看吧。”说罢他背着手站在关闭的门前，向玻璃外的天空望去。我默默地走到小床边，床上那一叠叠的日记、文

稿、信件、读书笔记，似乎都在哀泣地望着我，而我的那一句“看完了”就将是它们被烧毁的宣判词。

从加入少先队的第一篇日记到成人的历程，象画展一样呈现在我面前。哥哥的性格象快速电影般在我脑海里掠过……这些披肝沥胆的日记，这些文思奇妙的文稿，这些与朋友互勉的信件，难道都不能活过今天？这不是日记和信件，这是青春的诗篇和生命的火焰！这一天，我才知道哥哥是怎样记日记的呀！一个何等敢于解剖自己的人！

从他高中时代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起，从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事物唯一正确的思想指南起，他就开始每天思过——把一天中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言行都无情地写在日记本上加以鞭挞。每星期小结、每月中结、每年大思一次过。他的勤俭朴素、刻苦学习、宽人严己、敢于向不正确的言行作斗争的勇气以及待人处世的方法，都是有意识地战胜自己的“私我”才达到的境界呵！

只要是他一时不明白的，他就要通过读书或实践的途径把它弄清；只要他认为是错误的，他就坚决改正，决不再犯；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坚持不懈。而对与错，都有一个正确的标尺，即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

象这样敢于战胜“私我”的人，他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他的做人准则和生活目标怎能不始终如一？怎能不坚强？怎能不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怎么会投降变节？处处严格地检验自己，这就是他的自豪和幸福！

有的人口头上也宣称他相信唯物辩证法，唯独缺乏解

剖自己、战胜"我"的勇气。他们不敢首先拿自己开刀，总是拿别人开刀。而哥哥在我们同辈人中，或在我们周围的人们当中，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第一个如此无情地解剖自己的人！如果每人都能象哥哥那样，这世界该多光明！该会减少多少的虚伪、欺骗和软弱！

我一篇篇翻着它们，屋里只听见轻微的沙沙声，而哥哥仍然一动不动地向天空凝视着。森冷的小屋再冷，冷不过他的目光；地下的岩浆再热，热不过他的胸膛。我悄悄抬起头，难过地望着他——他的目光是冷峻的，而在他的胸膛里，该翻滚着多么灼人的岩浆呵！听，隔壁院子里传来红卫兵的打砸声和不幸者的哭泣、哀嚎声；看，后窗外便是烧东西的袅袅青烟。思想要被铲除，肉体要被凌辱，还有什么属于人们自己呢？

当天晚上，母亲没有回来，与厂里的黑六类一起被群众专政了。第二天一早，我把哥哥托付给我的那本日记夹在我的二十本日记当中，放在一个花布书包里，跑遍了所有与我要好的同学的家。家家都在胆战心惊地烧东西，所到之处无不这样问我：

"怎么，你还不快烧了它？这时候你还穿裙子？"

谁也不敢藏它们，而且对我居然还要保留它们感到吃惊。我走得精疲力尽，心想，藏在公园的哪块石头底下或石洞里？然而公园全让大字报糊严了大门，好多天以前就禁止开放了。怎么办呢？已到下午，说不定今晚就抄家呢！这时我走到文化宫前面，很想上厕所，就进去了。厕所里静得

出奇，又干净又敞亮。以前我到公园写生时常到这厕所来，对面一排高高的白油漆门总是用绳索穿着不打开。此时这一排紧闭的门，静静的就象一排卫兵。我忽然心里一动：日记拿回家太危险，不如放在对面的门里，明天一早我再想办法另行安置。对，只好这么办！一看左右没人，我便把这一书包日记从那干净的白瓷砖地上塞了进去。弯下腰看看，一点儿也看不见，心想，只存放一夜不会有什么问题，总比家里安全，又看看窗外，一个人也没有，我这才洗洗手，放心地走了。

第二天天还没大亮，全城就临时戒严了。原来这天上午毛主席要接见百万红卫兵，连自行车也不能随便通行，糟糕！我忐忑不安、坐卧不宁……下午两点，开始通车了。我紧忙赶到文化宫前一看，不由愣住了——两排门大开，书包早已没了踪影。干净的地面现在尽是痰、纸屑和污浊邋遢的脚印。我忙找到两位打扫厕所的女同志，问她们看见一个花书包没有？她们只掠了我一眼，便耷拉着眼皮，一边扫地一边干巴巴地回答：

"没看见。"

此外再问不出一句话。

我自己的日记丢了倒是小事，然而却辜负了哥哥的重托！心里七上八下，万分懊悔！谁知道哥哥那里头记的是什么呢？唯有这本我没看，因为哥哥没叫我看，万一里面有"犯上"的话，不等于我出卖了他吗？我哭了半天，饭也吃不下，也没心思上班。父亲责备道：

"愚蠢哪，愚蠢！还有比你更蠢的吗？怎么能藏在那个地方？"

可是又藏哪儿好？棚顶会被捅破，墙壁会被凿穿。埋地里？小院里五家，万一被谁看见听见？邻院就是街道积极分子，她的孩子经常往这院跑……或许，哥哥也是没地方可藏，才交给我的吧？唉唉！我是怎样辜负了他呵！

哥哥下了班听到这噩耗，先是一愣，再没有说一句话。

父亲问他："你记了什么犯事的话没有？"

他发呆地回答："对陈伯达、姚文元有些看法。"

"蠢哪蠢！"父亲焦躁地瞪了我一眼："还有比你更蠢的吗？罗克呀，你也是，还不烧了，偏偏交给这蠢丫头！"

我惭愧得头都不敢抬起来，痛心地流着眼泪。哥哥却很快恢复了常态，只说了一句：

"小妹妹，我不怪你。"说罢便走进他的小屋。

这句宽宏的话更使我难受！一直到死，我也会觉得对不起哥哥！我辜负了他的重托呵！

原来公园管理处的人把日记交给了领导，领导很快转交到公安局。八月三十日，我厂领导找我谈话，问我在文化宫的厕所里藏了什么，显然他们已全部掌握了情况。

三十一日晚上母亲厂里的红卫兵来抄家。我和父亲正被强迫跪着，门突然"豁啷"一声被推开了。屋里的人惊异地望去——啊，深蓝的夜空衬托出哥哥那严峻、镇定、苍白的脸。他那锐利、冰冷的目光象闪电般直刺向惊愕的人群；那坚毅、紧闭的嘴角，正直的鼻梁，发着寒光的白玻璃镜片，

直慑人们的心魄……

他站定在门口，一动也不动，威严地望着他们。红卫兵们从呆滞中猛省过来，一涌而上，将他团团围住。但他铁塔般地立在那儿，锋利的目光使人发憷，竟没人敢拉他一把。

“对于你们的革命行动，我十分欢迎！”未等他们开口，哥哥便先发制人地果决地说道，“就是你们不来，我也要请你们来！但是——”

“你就是遇罗克？”

“但是十六条明文规定，报纸上也多次讲过，‘只许文斗，不许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

“你先跪下！”一位“勇士”照他的后脖梗猛拍一掌。

“你打人？”哥哥疾速地扭过头去，灼灼的目光紧逼着他，脸色煞白；那不可侵犯的凛然气度竟使那人缩回了手，悻悻地避开了哥哥的目光。

“我犯了什么罪？”哥哥那冷透骨髓的目光紧盯着面前的红卫兵。

“出身就是你的罪！”

“一个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一个人的道路却是完全可以选择的。请问，你们是如何看待家庭出身问题的呢？”哥哥朗朗地问道。

“我们拥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哥哥和他们激烈地辩论着，突然，门外又涌进一群红卫兵。

“遇罗克，走，厂子叫你去！”原来是哥哥工厂的——就

因为那本日记。

哥哥被带走了，和许多"黑帮"、"狗崽子"关在一起。没过两天，我也因日记问题被厂里批斗，视为阶级敌人。我和哥哥的日记曾在"全市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展出过，说这是"变天帐"。

他们从我的二十本日记里筛糠似地找出六句话（这六句话既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又没攻击党的领导，现在看起来完全正确；而其它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的、努力学习的话一概不算），便说我"思想反动，根深蒂固"。

而哥哥那本日记里记的是什么呢？直到十年后的今天，人们才从法院里得到当时定他罪名的那些日记摘录——那些因丰富的实践、勤奋的苦读、周密的思考所产生的闪光的金子：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完成一篇约三千字的评论：《从马克思的一封信想到的》（是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一封信，见《资本论》附录），借题批判近来报刊上赫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他反对吴晗的《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

一月二十七日

读完《论语释注》。怪不得在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之中，有的人对孔子推崇备至。我觉得孔的学说所以远胜于庄、墨、韩非诸家，其原因在于他的"中庸"之道。……明确地提出学问为政治服务，明确地提出圣人可以企及。因为圣人并不是生而知之的，是学而知之的，这就是把学术公开化，而不是神秘化了。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有很大的原因是不学无术的缘故。

一月二十八日

读完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全盘否定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是反对的。但是如果在他的理论面前顶礼膜拜，也同样不正确。

一月二十九日

那时我国对外积极争取和平……对内则受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影响，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致使国家建设欣欣向荣、国外颇孚众望。治国者庶几可以无为而治矣。今天则不然。过分强调主观因素，忽视物质条件与既成事实，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五四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正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十足的愚民政策！

二月六日

《人民公敌蒋介石》乃陈伯达所作。……始知蒋介石从流氓爬上总统的高阶。蒋用两面手法，杀人行不义而为一己之私，实乃独夫也。

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理论家。其颂毛为"智勇双全"、"弥天大勇"足令人齿寒……依陈的推理，毛岂不也成了"独裁者"了吗？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当然，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矣！

二月七日

我为什么要读逻辑著作呢？因为姚文元等人的文章，之所以得出谬误的结论，其逻辑错误必为原因之一，故读此以批判之。

《谢瑶环》剧本文学性颇强，亦足具艺术魅力，今以左倾教条主义诽谤之，以过火的政治论之，则几成大恶不赦矣！

二月十日

寄去《红旗》的《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给悄无声息地退回来了。报纸上一些无聊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上面划得满是大杠杠、小杠杠，我重读了一遍，又给日报寄去了。

二月十五日

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

……买来《文汇报》（十三日）一看，果然有。……发表一篇文章真是难得的很！不过，这在家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父亲和母亲以及来和父亲下棋的棋友都害怕起来。他们一见那标题《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标题也使他们不知所措。整个版面的安排对我也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

……生活在今天对我来讲，成了干干净净的零。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未来只有胜利，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既无胜利也无损失罢了。我要是害怕，那不十分可笑吗？

凭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得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是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报》发表我那篇《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

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四月三十日

读完了（法）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我总觉得，今天的文化、哲学的发展不是人类历史上进步的继续。梅特里那种细致的观察、点滴的探索，在今天就没有继承。我们架空的东西真是太多了。固然，梅特里只考虑到生理原因而没有考虑到阶级原因，这是不对的，但一反而为之，也不能不算是偏颇。我们终不能否认，梅特里哲学也有其合理性。难道这就是大变革吗？不！哲学是只承认扬弃而不承认抛弃的。历史注定了今天的文化需要反复，而反复的过程是痛苦的。

五月一日

看芭蕾舞剧《白毛女》。……就其所费的人力和所取得的效果相比较，是所得甚微的。……每逢抒情就缩手缩脚。……重事不重情，当今艺术之流弊。

五月二日

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奉宗教，决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遵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五月三日

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五月四日

《波斯人信札》：“我设想在某王国内，人们只许可土地耕作所绝对必需的艺术存在——虽然土地为数甚广，同时排斥一切仅仅归官能享受与为幻想服务的艺术，我可以说，这个国家将成

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何谓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代的共鸣。孟德斯鸠可谓不朽，其洞察力已经逾过二百多年了。

五月七日

目前开展反对美化帝王将相的运动，而毛主席诗词中就出现了许多帝王将相。毛主席是批判他们呢？还是歌颂他们呢？今天一切都要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南，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利的，但也没有人敢提，因为这确实需要一定的魄力。

五月十日

大力批判邓拓，必有更高级的人物倒了霉。

五月十三日

文化革命，闹得不可开交。满都是“工农兵发言”，发出来的言又都是一个调门。我想这次假使不是反对邓拓，反对的是姚文元，只要报纸上说姚是反革命，那么，这些“工农兵的发言”用不着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

晚间骑自行车到故宫角楼，凝望护城河水和黑黝黝的古代建筑，自问：努力够了吗？修养够了吗？都不够。可以休息吗？能够自满吗？前途还漫长着呢！

五月十四日

看了受批判的电影《舞台姐妹》，正如影片中所说的（说的是解放前国民党禁演《祝福》）：“连这样的戏都不让演，还让演什么呢？”

五月二十二日

报刊上轰轰烈烈地开展文化革命，我是颇有感触的。

一、工农兵参加论战。谁掌握报刊，谁就掌握工农兵。工农

兵批判的不是言论本身，而是不许“敌人”破坏社会主义。因此，报刊上所谓的工农兵论文，现在看来是批判邓拓的，但不用掉换几个字就可以变成下一次运动批判其他人了。工农兵哲学的时代远没有到来，最大的障碍是幼而失学，现在又没有自修条件，要想在一天十多小时劳动之余，要想在民兵、会议等等活动充斥之下，写出一篇文章来，那是十足的谎话。事实上，广大群众对这件事是不关心的。

二、(略)

三、争论双方：现在被批判的一方是过去代表党的。例如，邓拓是市委书记。《北京日报》是市委报刊，《前线》是市委杂志，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等等。而开火的一方则是上海文联的姚文元、民主党派的报纸《光明日报》、《文汇报》，即使是《解放军报》吧，也只有一个莫明其妙的“高炬”。……这么看来，要说攻击党，大概应该指那些民主党派的报纸。可是这时急急忙忙把工农兵搬出来了，如果不是确定了谁该受批判，是不肯轻易搬出这个法宝的。……内幕真复杂，只把局外人蒙在鼓里。

五月二十三日

《解放军报》曰：政治好，业务也可以不好。……很显然，假使政治好的人反而不如私心杂念的人钻研业务时干劲足，不正说明政治的无力吗？事实上，比如说，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政治思想挂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习毛主席著作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队败给苏联呢？讲不出来了。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知道走错了路，而又不敢回头的人，必然用歪理来解释真理。

五月三十一日

傍晚车间开会批判邓拓，老工人发言，回忆解放前痛苦生

话，声泪俱下，但和邓拓毫无关系。

六月三日

详读《人民日报》发表吴晗、胡适的通信，实在是一般学术问题，且有相当民族感情，可惜谬解。

六月四日

市委易人……大家当然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但谁也不知彭真、刘仁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吴德又是何许人也。看来，要是中央易人，大家也会同样敲锣打鼓的。——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仿效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

六月七日

这是给初出茅庐的青年第一次"革命"的洗礼，"群众运动"的洗礼！好一个"群众运动"！不讲官面文章，谁也不会相信修正主义者会怕这样的大会！更可笑的是，口号里有："誓死保卫毛主席"，大家都喊，想过没有，是谁要害毛主席？邓拓的舌剑吗？那还远远不够资格哩！到底是谁，报纸上没有公布，谁也不知道，但喊口号。

六月十二日

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这确实能够蒙骗一部分没有实际经验的知识分子。……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做为明证。

六月十七日

听弟弟、又听母亲说，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李老师自杀了，小学生冲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的象新市委所云："是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

六月二十六日

读《中国散文选》，是五四诸家选本。……五四是出人才的时代，今天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是没法比拟的。

七月六日

工作是难耐的寂寞，幻想充满了脑际，对于我，革命的欲望是多么强烈呵！

七月十八日

读完《五四小说选讲》。能够自由地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才是有出息的作品。非如此就不能真实地刻画一个时代的面貌。由此看来，今天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较之五四时代，真是相形见绌了。

七月二十九日

开全厂大会，宣布中央两个文告，今后运动方向是直指当权派……所谓当权派云云，亦可证明，这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为什么群众"哄"起来？那是积了多年的怨气，这次导而发之。正因为客观上解决了这两个阶层之间的问题，社会才得以进步，才能出现某些大快人心的现象。可是，又因为口号提得不中肯，宫廷政变迅速，致使准备不足，而是呈现混乱状态。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

八月三日

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玉鑫的大会，宋相当沉着……会上下雨了，群众多一半都找到了伞或是避雨的地方。宋挨淋，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鲁迅说："敢摸着叛徒尸体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我同情他吗？不，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己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的。……但是，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罪过，……把干群关系拉到敌我矛盾上来，害处多么大啊，既制不服对方，又说不服自己。为此让他淋到大雨里，岂不枉哉？

八月五日

近来听说"红卫兵"，亦即中学生，身穿军人服，戴领巾……都是革干子弟。今天给我们送来一张大字报，"资产阶级狗崽子"等词出现了好几处。说有人对他们行凶了。……谁敢哪？这都是流氓把戏罢了！……实在太嚣张了。

八月八日

晚间开会斗宋玉鑫，但宋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种气节是值得学习的。假使他认为是对的，就死也不能说是错。革命，只能信托给有气节的人。

八月二十一日

这个星期着力写出身方面的论文，改名为《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这几天所以搁笔，是因为毛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过分攻击红卫兵的话只得不说了。

八月二十二日

听说红卫兵把王府井各个铺面全改名字了。现在市内叫东

方红的大街不下五条，叫红旗的铺面不下五十个。一切能引起旧的回忆的东西，统统消灭了，但新的东西又是这么贫乏，因此只好有五十多面红旗了！

八月二十三日

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了墙壁，门面字号全砸了。荣宝斋遭到最大的浩劫。还有人声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我又看了青年会（基督教），也站满了红卫兵，大改了模样。

据说红卫兵砸人的家，理由是没有主席像，或在像后面放了别人的像。他们翻到翻译小说就烧掉，好一个焚书坑儒。

八月二十六日

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以上就是哥哥的“恶毒攻击罪”。这仅仅是公安局从一本日记里摘出的，如果那所有的日记、文稿、信件都不烧掉，该有多少闪光的金子！

这不独是一位青年敏感的神经对生活的直觉和感应，而且是经过丰富的实践、痛苦的磨练而开出的思想之花。它的光芒足以照亮迷惘的人们面前坎坷不平的道路，足以暴露那些吃人的披着人皮的豺狼。哥哥既不认识高干子弟，又没有“内参”可看。他灵敏的政治嗅觉、深刻的洞察力、准确的判断；他坚韧的斗志、远大的胸怀、利他主义的抱负；他严格律己、对真善美热烈追求的高尚品德，都是他结合社会实践，每晚在小屋里苦学、深思的结果。呵，一颗高贵的

心！它是书本、实践和思考的产儿！那四溢着桔黄灯光的可爱的小屋，就是培育这颗心的产房！

哥哥的价值，正在于这些被宣判的罪行上面！

六 《出身论》——时代的产物

“谁敢和我辩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一天，在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哥哥一蹦就跃上了工艺美术服务部门前的石阶，双手叉腰、气昂昂地、挑衅地望着过往的行人。这凛然的无畏神气，象磁石一样吸引着街道上拥挤的行人；那响亮豪迈的话语，象闪电般划破了反动血统论笼罩的铅样的天空。

很快就围起了一大群人，四处的人们仍络绎不绝地向他走来……

“谭力夫之流们，你们有人敢和我辩论出身问题吗？”

哥哥又一次向稠密的人群喊道。人们好奇地盯住他，而更多的人却你拥我挤地观看他身后刚贴在墙上的大字报——《出身论》。那十几张粉红色的纸上写满了清晰、劲秀、有些局促的毛笔字——那是哥哥不顾在工厂劳动一天的疲劳，用十几个晚上抄写成的呵！早在半月前，哥哥、我和弟弟就用刮印的办法，油印了五百份《出身论》，贴在各大路口和重要的机关、学校了。它象烈火一样燃烧、照亮了人们的心。在贴有《出身论》的地方，从早到晚都围着五六层人。在纸边的空白处，写满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批语：“好得很！向作

者致敬！”“大毒草！砸烂他的狗头！”人们询问着作者的姓名，然而只有“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一令人深思的笔名……

“你小子要辩论什么内容？”十几个气势汹汹的穿黄军装、戴红卫兵袖章的人挤进最里层，手里攥着宽牛皮带。

“我要辩论的就是这《出身论》，”哥哥用手向身后一指：“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还是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

“你小子要有胆量，咱们先辩论谭力夫的红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不！”哥哥严峻的两眼象射出了两道冰光，“辩论谭力夫反动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人污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

“对！”人群里发出一片赞同声。

“他妈的谁嚷？一群混蛋！”十几个红卫兵怒目横眉地叫道：“谁不拥护红对联，就砸烂谁的狗头！”

“其实，”哥哥的目光透着嘲讽和轻视：“那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

人群哄地爆发出一片笑声。

“说穿了，”这笑声给了他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当然！”红卫兵们嚷道：“我们认为，家庭影响就是大于社会影响！”

“实践恰好得出相反的结论，”哥哥斩钉截铁地回答：“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哥哥雄辩的口才、充实的论据把红卫兵们那些对立的和貌似折中的谬论驳斥得体无完肤。《出身论》以油印的方式在北京城里点起了最初的火。在这动乱、血腥、恐怖的北京城里，出现了一位多么勇敢的战士！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母亲和我都被扣在厂内，哥哥和父亲被勒令不许走出家门，两个弟弟去广州串联，实是为了避难。姥姥因病住在二姨家。

十月二日下午厂里才放我回家。进了小院，走到哥哥小屋的门前，看到他正坐在桌前奋笔疾书呢！他写的就是那篇轰动全国、致使他得到死罪的《出身论》。

哥哥在这篇立论严谨、事实充分、语言辛辣的一万多字的论文里，阐述了两个大问题：

一、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他认为：

> 一个孩子“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的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为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因此，他认为：“总的说来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无比优越的，我们的党是一贯突出政治的，是最重视年轻一代成长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民是热爱新社会的。”但是，也不可否认，“由于社会影响

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哥哥认为：“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承认内因起决定作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

二、重在表现。

在这个大问题里，哥哥阐述了四个小题：1、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2、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3、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4、受害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出身问题早已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到处受压抑。正如《出身论》一文所说：

……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的组织，与团组织并列。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连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战斗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中学也如是。据前北京市教育局印发的调查乱班的材料，其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指大谈男女关系，有偷盗行为的），大都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我出

身不好，人家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话，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况纯然是例外。否则，早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谓招降纳叛（即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阶级一说，从未见只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谁把工人也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修正主义代表人物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份。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份；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吗？那么，贫下中农子弟表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各种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师、贫协、大队三结合进行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

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说："这个娃出身好，又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

社会上的其他部分也如是。北京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个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本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用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被分配的可能。……

哥哥写完《出身论》以后，曾叫几个同学看过，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认为，语言太尖锐，提出更改一些词句，少惹祸为好。哥哥适当地做了些修改，后来说："不能再改了，再改锐气就没了。"

当时铅印的《兵团战报》登了一篇关于出身问题的文章，但观点羞羞答答，不敢涉及事物的本质，丝毫没有说服力。哥哥把《出身论》送到他们编辑部，他们认为文章太锋利，不敢刊登。

怎么办？又没有油印机。这时罗文、罗勉从广州来信说，他们在那儿和广东的几个学生办了一个小小的油印刊物，叫《北斗星》，想专门谈出身问题。并且介绍了一种最简便的刮印方法。哥哥高兴极了，立即寄去了《出身论》。不久，罗文就寄来了一张他们油印的样子，字迹十分清晰。那天哥哥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立即买了纸，借来钢板和我在

小屋油印起来。我们油印了三四百份。油印完毕，他把小屋的墨迹擦得干干净净——从那时起，他就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哥哥，”我问他：“你为什么要用‘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么一个笔名呢？”

“因为我不喜欢‘战斗队’之类浮而不实的名称，”他说：“我希望这笔名能启发亿万个家庭，但愿每一个家庭都能认真研究一下出身问题。”

天冷了，两个弟弟不得不回来了，并告诉我们《出身论》在广州引起极大的反响。我们又印了几百份。那时正值十二月初，我和弟弟骑车去满处张贴。为了避免人们拦住找麻烦，我们都是先贴最后一页，贴完第一页骑车便走。所贴之处人们无不整日围得水泄不通。

人们在寻找这不知名的作者……

哥哥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把油印的《出身论》寄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每个成员，同时也给毛主席、周总理、陈毅、谢富治分别寄去了一份。

父母为此分外担心，劝阻道：

“罗克，可别惹事呀！那么多人都不敢说真话，就你敢说？危险哪！”

可是，哪里劝得了哥哥呢？他哪里是为自己才写《出身论》的呵。他觉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给他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可以发表言论——哪怕是油印。他，作为马列主

义的忠实信徒，如果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连句真话都不敢说，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行尸走肉式的生活他是决不要的，不自由，毋宁死！

就在到处是血腥恐怖的气氛之中，一九六七年一月，铅印的《中学文革报》为《出身论》而出世了！

发起人是我的大弟弟——六十五中学的遇罗文和男四中的牟志京、王建复、毛宪文（毛是老师）。

从油印到铅印是经过了重重困难的——首先是没钱。由于牟志京是反对血统论的急先锋，在男四中小有名气，便张口向学校借了五百元。又通过他的熟人开出介绍信，准备到一二〇一印刷厂去联系。其次是没纸，当时纸张十分困难。这时，正好有个单位有十五令纸要退，于是便买了过来。第三就是如何保全自己，不被对立面的组织干掉。他们于是虚张声势，明明只有四个人，却起了个大名——“北京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为了使文章不要锋芒太露，牟志京将油印的《出身论》的某些字句做了些修改，但观点并未变，改了以后又征得了哥哥的同意。

第一期印出来了，但到手便损失了几千份。因为有些在一二〇一印刷厂劳动的学生正好是联动分子，他们一看这报纸便十分怀恨，当时抢去了几千份销毁。

第一期售出后反响非常强烈，犹如一颗原子弹在北京上空爆炸一般。第二天四中专为报纸所设的接待站就门庭若市了。来访的主要是中学生，也有个别报刊的记者。很快，工人和各阶层的来访者也多起来。绝大多数人是因

买不到报而来索取的，他们热烈地赞同和支持。也有极少数人是来谩骂的。电话铃声从头天夜里到次日响个不绝。来访的人太多，接待站忙碌非常，应接不暇，只好全体人员出动（仅四名），为了安全起见，还要故意把司令部架子拉大。

有人问："司令部在哪儿？"

"不知道，"几个人口径一致地回答："我们只是司令部接待组的成员，你们的意见我们可以转达。"

有两姐妹找到接待站，哭着说："收下我们吧，哪怕叫我们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

"你们看过《出身论》吗？"

"没看过，"她们回答，"我们只是看了反面的骂《出身论》的文章，觉得《出身论》极有道理，才来要求加入的！"

这样感人的例子多不胜举。

第一期售出后，加入了好几个人，还有哥哥特意邀来的一位大学生——从初中就要好的学友。这样，所谓的"司令部"便也初具规模了。

反响越来越大，遭到某些坚持"血统论"的人极大的仇视。第二期还没有出，他们就已经来砸过几次，将接待处洗劫一空。很多集会上《中学文革报》都成了辩论的对象。处境日益艰难，买纸和印刷都成了问题。一二〇一厂怕惹事，拒绝再印第二期。

这时，自来水公司的一个工人组织派人来联系，表示赞同《出身论》的观点，于是在他们那里借了一块安身之地，继续办报。

牟志京到一二〇一厂死磨活泡了两天，终于把负责人说动了，答应印第二期，但决不再印第三期。

第二期的头版文章，由哥哥写了《谈纯》。

当时有许多种铅印小报，有些报根本卖不出去，而街上的人只要一听说是《中学文革报》，便蜂拥来抢购。许多人唯恐买不到，便不按秩序排队，人人伸手递钱，那情景真是难以形容。

有一次罗勉去卖报，人们立即排了一长队，可是少数人不守秩序，队形乱了起来。罗勉一生气，抱起报纸就跑，想躲到一个清静些的地方重新卖。一回头，一长队的人跟着他跑……

又一次罗文和同学去卖报，人们竟把果皮箱撞翻，他们只好钻到一辆闲停着的客车里，从窗口里卖……

每一个卖报者都遇到举不胜举的难以忘怀的热烈场面。当时小报是二分一份，可是在换报纸的黑市上竟须用二十五份其它小报才勉强换来一份《中学文革报》。

第一期印了三万份，第二期印了五万份。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如《清华红卫兵》和《兵团战报》等，每期都印五十万份，可是数《中学文革报》的读者来信最多。最初邮递员还管送信件，后来信太多，驮不动，索性叫办报的人自己去邮局取。每天都有半麻袋信，一次就是几千封。除了台湾和西藏两省外，各省都有信来。信件太多，根本看不过来，所以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家分头各看一堆信。

很多人在信里付了款，要求订阅。大部分读者表示赞

助和关心，但也有少数人透露了某些顾虑。许多人在信中叙述自己在出身问题上所受的歧视和迫害，特别是农村的问题更为严重。不少二十几岁的青年被称为"地主分子"、"富农分子"，遭受着种种非人的待遇，读了令人愤郁不平。写信的人无不对报纸寄予极大的期望，不少人竟天真地相信："中央文革"一定会支持《出身论》的观点的。

一些感人肺腑、事实充分的信由四中接待站转交哥哥手里，他都记下了地址，以便联系。这样的地址有上千个。哥哥是不爱哭的，但每次读信时，常常潸然泪下。亿万个青年的命运，和他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从中感受到无比的动力和巨大的信心。雪片般的信件，更坚定了他捍卫和探索真理的决心。

《出身论》的精辟分析在四处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门第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

《出身论》的传播范围不仅从读者来信中可以看出，不少人还寄来了几十种油印、铅印的复制本。各省都有复印的，抄成大字报贴在街头的形式就更为普遍。

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湖南已经出现“湖南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在湘潭、长沙已掀起了对《出身论》的辩论。……凡《出身论》所到之处，那里就燃起一片烈火。

四中接待站有多少热心的读者呵！一位三十多岁的四川人，向接待站讲述了四川地区血统论的猖獗，并表示坚决捍卫和宣传《出身论》的观点。每天接待站一开门他就到，帮助接待各地来访者，热情洋溢而有耐心。他说：“如果《出身论》错了，要抓人，我愿陪你们进监狱。”有不少人是干部子弟，他们并不因自己出身好而自傲。其实，《中学文革报》的一些发起人如牟志京和其他参加者，他们的出身就是很好的。

反对报纸观点的打砸抢分子们经常前来挑衅。有时几十个红卫兵涌进家来，声言要和哥哥“辩论”。他们一个个气势汹汹，语录声口号声震天地响，将哥哥团团围住。而哥哥每次都如入无人之境，以镇静的态度和锋利的语言使他们震惊，使他们无数次伸出的拳头又都缩了回去。

哥哥还希望舆论更大些。于是他写反驳《出身论》的文章，和自己正面观点的文章登在一起，以此扩大影响。在第二期上以“步曙明”和“齐声唤”的笔名写了《〈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接着，第三期至第七期，他又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写了《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为哪一条路线

唱颂歌》、《淡鸿沟》(这一篇发表在《首都风雷》报)等文章，具体阐述《出身论》的观点。可是，奇怪的是：反对派的报纸却很少有具体的反驳，只有大量的谩骂，最常用的词是"诡辩"。

一次牟志京对哥哥说："这些报纸，看来就靠诡辩两个字活命了。"

哥哥严肃地听着，然后问道："你能不能给我说说什么叫诡辩？"

牟志京在哥哥的凝视中思索着，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词句。哥哥这时说道：

"当你的观点还不能被别人接受的时候，那么你就是诡辩。"说罢咯咯地笑起来。

洋洋洒洒的几十万言的文章，都是哥哥利用下班时间写的。他文思泉涌，提笔不停，这是他多年受压、多年思考、多年实践的结果呵！不过他始终以一个投稿者的姿态出现，并不直接介入《中学文革报》的事务，这不仅是他主观的愿望，也是为了彼此的安全。他希望自己的观点得到中央首长的支持，那样也许就不会有坐牢的危险；然而，始终没有。

预计将会到来的风暴终于来临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在强大的高压下，《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

情势危急，随时都有被专政的危险。哥哥第一次召集了《中学文革报》所有的骨干，镇静地对大家说道：

“今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出了事，你们切记，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

他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他早就发现暗探跟踪了，而他一点也没有沮丧的心情。他的精神和以前一样饱满，而且利用工余时间研究新的问题——写了一篇几万字的《工资论》。他列举了目前工资的不合理现象，研究出一套新的工资体制：即发给每人基本不变的生活费（无论是工人、农民或无职者），其余按本人的工作贡献发薪。他依旧不倦地探索着！

他甩开了暗探，利用一周的病假期去了一趟北戴河，去看他从小就爱慕、却从未见过面的恋人——大海。呵，海！他奔向大海的怀抱，畅快地呼吸和遨游，多蓝多美的海呵！

淮河、黄河与海河，风尘万里泛浊波。人生沸腾应拟是，歌哭痛处有漩涡。

恶浪、恶浪奔驰速，风雪日夜苦折磨。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阻多。多少英雄逐逝波！

他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吟咏着内心沸腾的诗句……

暗探的跟踪和监视越来越明显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哥哥对不惜冒风险来看望他的好友牟志京说：

“现在对我的监视更严密了，到我这儿来太危险。今后不要再来了，出事的可能性很大。”

“你估计会出什么样的危险呢？”

“很难说，各种可能都有。但是我相信一点，如果毛主席看过《出身论》，他不会反对的。我有一封给毛主席的信，请你替我妥善保存。今后万一我有什么不幸，你千万保存好，在适当的时候把它拿出来。我相信有这么一天——人们会对《出身论》做出公正的评价的。”

哦，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哪！它是向全国人民的诀别书，是迸着血泪的最后的呐喊，是真理的忠实的宣言！他把信郑重地交给了牟志京——当时家里人都处于危险状态，除了这位好友，谁能保存呢？哥哥的脸上只有严肃和沉重，完全没有平时那风趣和轻松的神情，仿佛他早已看到了自己的结局，却又没有半点犹豫。

这封宝贵的信，后来由于牟志京颠沛流离的生活，丢失了。

暗探无时无刻不在跟踪，哥哥给广东的两位友人写信道：

……我大概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也受到讯问，给他们增加了负担。固然，如你所说，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事都那么脉络分明。整个一部历史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即使将来真象会大白于天下。目前我们也没有太多的

时间可以损失。我写给你这些，是想讲清楚我的处境，否则你为我受累我是很对不住你的，在北京因同意《出身论》的观点，大学毕业生不予毕业，不发工资，外地还有打成反革命的。这时候遭到邮检不是很妙的事……我自己做人，当然还坦荡，不过假使遭事，将来还会更多。还是林杰有权力的时候，红旗杂志派专人做过调查。他们是专信谣言的，哪怕是最荒诞不经的，一查对就可以搞清楚的，他们也深信不疑……

在另一封信里说：

……北京郊区大概决不会比广东农村好，否则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没有办法生活了，因为我已经到了极限。且不说运动初期，有全村一夜被杀死七八十口的情况，有活埋的情况，即使是现在，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可怕的……无论怎样讲，围绕着《出身论》的斗争，我是失败的一方（也许是“光荣”的失败，也许是“暂时”的失败，但归根到底还是失败）……我相信这个问题终究是会解决的。把一部分人的尊严建筑在对另一部分人的侮辱之上，是不合理的。这种尊严是维持不住的，这种手段也是不能永远奏效的。……

这两封信都遭到了邮检。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哥哥照例在他的小屋里闭门思过，然而全家谁也睡不着，盼着再能多看他几眼，多听听他那沉静亲切的声音。那是昨天早晨，哥哥一边洗脸一边对母亲说：“妈，我觉得要不好。保卫科的一个同志偷偷告诉我，我的档案已被公安局要走了。很可能我会

被捕。”

这句可怕的话终于从他的嘴里说出，而他的神情却是那么平静自若，就象在谈一件极平常的小事。母亲呆望着他无言以答，她能说什么呢？说什么都晚了。父母最疼爱的大儿子，难道……

此时，一家人眼巴巴地等着、等着……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那间坐落在小院一角的小屋里，那静静的、一动不动的、溢着柔和的灯光的小屋……

老挂钟敲过十二点，哥哥推门进来，对屋里忧心忡忡的一家人说：

“刚才我在闭门思过。思这一年我有哪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行为。”

屋里的人没有说话，无不受着巨大的感动。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在日记本里刚刚写下了这血雨腥风时捌的誓言：

>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清晨，哥哥照常去上班，刚一进厂就被捕了。听说被捕时一帮人狠狠地揍他，把他的衣服都撕破了。

被捕的那天，在他小屋的桌上还放着未定稿的《工资论》。

七　社会大学的最后一堂课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预审)

问：你有什么问题？

答：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到这里来。

问：你还是谈谈你的问题。

答：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

问：你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吗？

答：我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够好，我思想上还没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没有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问：你不要在这里演戏，我们把你抓到这里来就了解你的问题，你早就在我们的视线之内了。……

答：毛主席的著作我学了，元旦社论我学了，我没有一条够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的。

问：你没有问题吗？

答：我即使有问题也是人民内部矛盾。

问：《中学文革报》是谁办的？

答：我一个人。……我相信如果毛主席知道我的《出身论》，他老人家会解救我的。如果你们允许，我还要给毛主席写信。

问：你最好把背后写的那些东西亮出来。

答：几年以来，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问：你不用讲好听的……

答：我的日记被《红旗》杂志拿去了，你们可以看。我的日

记中是表达我对党的热爱的，我永远跟着共产党。

问：……不管你多狡猾，群众也会把你揪出来。

答：……我请求你们让我给毛主席写封信，主席知道《出身论》是我写的，他如果知道我现在这个情况，毛主席决不会说我够专政条件的。

一九六八年一月九日

问：你的日记为什么烧了呢？

答：我怕别人看。

问：你为什么突然想到要烧呢？

答：我认为没有保留价值就烧了。

问：你留下一本是什么皮的？

答：是蓝皮的"北京日记"。

问：这个日记哪儿去了？

答：下落我不知道，我交给我妹妹了。

问：你把情况谈谈。

答：这本日记记的都是我们厂子的真实情况。

问：记的都是你的真实思想吗？

答：日记写的时候有片面性，因为写日记和写文章不一样，都没有经过推敲，青年人的思想也有很大的起伏性。

问：你不要诡辩，你看看这本日记是不是你的？

答：是我的。

问：这里边所写的反动不反动？

答：不反动。我思想上有缺点、毛病。

问：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应当怎样？

答：应当尊重。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话？

答：没有。

问：你这个人思想一贯反动，一贯耍两面派手法……你日记中对伟大领袖、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刻骨的仇恨……

答：我希望你们看我的主流。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攻击伟大领袖的地方？

答：没有。我始终是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毛主席的。

问：你交代不交代问题？

答：我这本日记由头看到尾，就知道我热爱不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了。

问：你日记中有没有反动内容？

答：无论如何我对党对社会主义是热爱的，尽管我思想上还是有错误的。

问：你七月三日记，把学习毛选当作为残酷野蛮，这反动不反动？

答：这我有辩护的余地，我指的是教条主义的学习。

问：……今天不准你辩护，只准你认罪。

答：我指厂里拿学习毛选来压运动。

一月十日

追查"反革命小集团"，预审员问到两个人时。

答：你无非是说我搞反革命小集团，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说根本没有。

问：如果有呢？

答：如果有我负法律责任。

问：这已经定论……你不交代，是你保护了自己，又包庇其他反革命分子。

答：你说的我很惊讶，我根本不包庇别人……我有错误思想，但我可以保证我和安徽、北京任何人也没有搞阴谋活动。如果有，可以最严厉地判决我。

一月十二日

问：我们可以告诉你，只要你不投降，我们是不会放过你的……你对我们的仇恨很深。

答：没有。

一月十三日

问：你攻击姚文元同志，比吴晗走得更远。

答：我和吴晗不一样，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

问：你的表演是你阶级本质的暴露……你坚持下去必然会得到更惨重的失败。你听见没有？

答：听见了。我没有事实。

问：你搞大量的反革命活动，怎么没有事实？

答：我没有搞反革命小集团。

问：……你的问题不交代，也跑不了，你……你是不是要顽抗到底？

答：我根本不是顽抗到底。

问：那你这算什么？

答：我根本没有什么反革命小集团，也没有这样的活动，如果我真有这样的事，你们可以最严厉地处罚我。

问：将来我们把大量事实摆出来你怎么办？

答：那怎么处理我都可以。

问：你现在这样顽固，到时候有你后悔的一天……你不交代我们也可以处理你。你听见没有？你讲不讲？

答：（拒绝回答）。

问：今天你又抗拒了一堂，我们再警告你，抗拒，我们一定要从严处理。在人民法庭你继续放毒……你听见没有？

答：听见了。

一月十六日

问：你考虑了吗？

答：……我写《出身论》，以前我认为不是为我自己的，我是为无产阶级做事的。昨天通过你的谈话，我开始有了怀疑。我对于我的家庭认识是有个过程的，小学三年级我九岁时，赶上"三反五反"，我向派出所检举了父母的一些问题，受到团市委的表扬。班上同学王杰的父亲和我父亲认识，把这事情告诉了我家里，从那以后我和家里关系一直不好。高中时候我也是和家庭划清界线的。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我确实认为是家庭出身不好造成的。但高中毕业后我还是愿意到工农中去锻炼改造自己，这样就到了红星公社……当时组织上信任我，让我管粮食，我们小队长是党员，他叫我在粮食中搞鬼，他也搞鬼，本来我很信任他，认为他是党员。出事后，我检举他，他没有受处理，却不叫我管粮食了，从此我情绪低落……

（关于劳模）时传祥他是掏粪工人，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模，过去报纸上常有关于他的报道和文章。文化革命时听说他组织捍卫团保刘少奇，江青说他是工贼，于是天天挨斗。掏粪工

人出身当然清苦，可是一挨斗，祖宗也要变，现在说他出身是粪霸。

有一天他被拉到我们工厂里游斗，我见到他一次，戴大高帽子，两旁站着几个气势汹汹的小伙子，卡车绕场一周，大家都跑出来看。他是个胖胖的五十岁左右的人，带着一副听其自然的态度，并不显得怎样不安。

关于时传祥还有一件事，有一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刘少奇和他握手，大概还说了一句什么话，于是一位著名的画家叫李琦的，用半中半西的手法画了一幅《同志》这样的画，座中两人，左边是刘，右边是时，上角题词摹拟刘的语云："你是掏粪工人，我是主席，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同志。"文化革命时，李琦便成了"黑帮"。虽然他也画过毛主席，那幅画还是我所见过的主席肖像画中最有风格最好的一幅，但也无济于事。

建筑业的劳动模范最著名的是张百发。几次出国，被当作专家聘请。他原是普通工人，组织了"张百发青年突击队"，是砌砖能手、毛主席著作学习标兵、共产党员，三天两头做报告。现在参加过人大会堂劳动的人，大都还记得，张百发怎样教他们捆钢筋，据说的确有两手……以后张百发被宣布为工贼，原来的事迹也都成了假的，而且假得出奇……

九月三日

问：一九六二年你说如果日本能使中国工业化，有什么不可以？

答：这是对我的污蔑，这根本不能联在一起的，我根本没讲过这话，这是莫须有！

问：你放肆！你是反动，你是卖国贼、叛徒！你放老实些！

答：这连影儿也没有。这样的材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问：这与你的日记吻合。

答：找不出来……

问：蒋介石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跑了，你很"惋惜"，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是在一九六六年，你说蒋介石完全可以打回来。

答：这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问：你解释也不能解释没有了。

答：我对有的问题有不同看法，我大部分是拥护党的。

问：这是大事化小。

答：可是这本日记如果落在蒋介石手里，便要杀头。因为我说蒋介石的坏话多了。

问：你反动！你还在放毒！

答：不对。不能把我没有的东西加在我头上。我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要相信解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还是有觉悟的。（你们）这样不行！

问：你对社会主义恨之入骨，……你不向人民低头认罪，说明你顽抗……以上问题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给你定罪。

答：我不承认。

问：我们给你交代党的政策你听进去没有？

答：不是听不进去，是没有影的事。

问：我们用毛泽东思想看穿了你的罪行。

九月十七日

问：哪一个敢暗害伟大领袖……

答：这是没有的事。

问：你对伟大领袖、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有没有仇恨？

答：我没有。

问：你态度极坏，怎能从宽？……你服不服是你的事，怎样惩处你是人民的权力。

我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

遇罗克

一九六八年十月八日①

从以上审讯记录中不难看出，哥哥的回答是多么有策略啊！首先，他态度一直是平和的（除极个别处），是承认自己有“错误”的——在“四人帮”统治的法庭里，他知道态度太强硬对自己是不利的，但在实质性的问题上，他什么也没承认过，对谁也没交代过，至死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难道他相信什么领袖会解救他吗？早已破除了个人迷信的他，比别人更知道《出身论》的厉害。如果他口口声声这样讲，或给哪位领袖写过信，那纯粹是想活下来的一种手段。除此，还能有什么办法？他想活，决不想死。正是这种“软中硬”的“狡猾”、“顽固”的态度，使审讯员们大为恼火，换了许多个审讯员对付他，一个月连续审问达七、八十次地折磨他，给他戴背铐、关禁闭惩罚他……可是哥哥没有一丝屈服。

---

① 以上材料均摘录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存档。

他被折磨得头发脱落，脸色青黄浮肿，原来微微有些驼的背现在更驼了……但在复杂的监号里，他却以永不衰退的乐观精神感染着人们。

在监号里，他以那惯有的略带嘲弄的笑容向新难友介绍自己的名字：

“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下面去掉心字，再加上一个走之，罗霄山脉（罗霄山脉是井冈山根据地所在）的罗字，克服困难的克字。”

说完，又微微一笑。这在困苦中作出的会心微笑，给难友以多大的鼓舞呵！

当犯人们“学习”得疲惫不堪，背语录背得头昏脑涨的时候，哥哥会突然出奇制胜，说几句引人兴奋的话。

一次，轮到他发言时，他慢条斯理地说：“我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这一下子，屋子里的人都愣住了。几个“积极分子”马上站起来争先恐后地向他猛烈抨击：

“什么？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蒋介石也存在，他合理吗?!刘少奇也存在，他合理吗？”

哥哥一点儿也不着急，微笑着继续逗着别人的火儿。

“你们考虑考虑，要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他们能存在吗？”

“你反动！……”等批判者的话到了相当尖锐程度的时候，他忽然收敛了嘲弄的笑容，做“正色”状，说：

“你们先别忙着批判，这句话可不是我发明的，而是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论述的。”

看着那些积极分子们瞠目结舌的样子，他又嘲弄似地笑了起来，那咯咯的笑声是那么开心。

而他在和人们单独聊天的时候，却很少笑。他把别人打发时间的“聊天”当成一种学习、求知的手段。他常说：每个人总对某一种事物“门儿精”（即内行），所以，无论谁都在某一方面比我知道的多。

哥哥在这儿学到了不少知识——水泥的全部生产过程，世界电影现状——包括各国影片的生产情况、年产量、频率和周转率、机械制造、西洋近代美术史……监狱里常常换号，因此，他便把在另一间牢房里听来的给新号里的人讲述，通过讲述来复习这部分知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他所讲的那一门知识的内行呢，他是多么会利用时间学习！

由于处处受监视——队长监视，号里大家互相监视，这种聊天时常中断，往往一点事要聊好几天才能说完。

在这复杂的困苦环境里，哥哥希望大家都对哲学感兴趣，更念念不忘宣传他所相信的辩证唯物论。在牢房中，他借“学习毛选”为名，以讲辩证法为题，开了“形式逻辑”的课程。几个小青年学得十分起劲，因为哥哥很善于把抽象深奥的理论用几句话讲得通俗易懂。他在这里成了博学的老师。一位学美术史的大学生是位高干子弟，参加过红卫兵，后又加入了血腥的组织“联动”。但他对哥哥说，他一向反对打人，也从没打过人，只是因为反对江青才被捕的。被捕前，他从父亲那里常能看到一些“内部书籍”，如法国萨特

等人的哲学著作，所以喜欢现代哲学。这位大学生说："现代哲学和古典哲学不同，并不一定要形式逻辑作为骨架。让·保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和黑格尔的哲学是有极大的区别的。过去的哲学已经被这一代人摈弃了。"

哥哥很不以为然，和他论争，后来有些生气地说："不行，你得下点儿功夫把所有的观点深透地研究一下，好好学学再做结论。学哲学不但是对客观世界了解的过程；也是对自己思维进行整理的过程；学哲学可以使思想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正确，而且是神圣的、无与伦比的。萨特的著作我还没有见过。而你的理论又说不服我……"

哥哥从不以道听途说或一知半解为满足。任何一种哲学，他都要钻深钻透、反复比较，与实践相联系，才能承认它的价值。

一天，他从同屋的另一个老犯人那里借来了延安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拿它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版本对照来读。他读得很认真，每篇都一字一句地校对，时常若有所得地点着头，有时则掩卷而笑。那咯咯的半嘲弄半天真的笑，使那老犯人不由注意起来。

"出狱之后，一定要找齐各种版本。对照来看、那才真有意思！"他两眼放光地对身边的难友说。

"怎那么有意思？"

"对照着看，能看出许多问题。从他们删改的地方可以

看出，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要使人民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他们，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

在某些同号的人眼里，他是个奇怪的“书生”——微驼着背，带着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有些脱落，完全是个书生模样。每天早上他起来还做做广播体操，满身学生味儿。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他们哪里知道，就是这位“书生”，却能洞悉社会，了解人生。

他把审讯当做一种训练、一种游戏。他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一套早就熟悉透了。预审员气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向他公布证据——哥哥自己亲笔写的文章摘要和书页上的评语，问道：

“这是不是你写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话？”

哥哥一声也不吭，脸上毫无表情。预审员又追问：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

“我不想回答。”哥哥这样说。因为他知道和他们是说不清楚的，但他又决不愿意向他们低头。

没有在那个时期住过监狱的人，不会明白，这种“顶牛”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因为，拒不认罪本身就可以构成重罪。哥哥的确是煮不熟、熬不烂、踩不扁、砸不碎、响当当的一颗铜豌豆！预审员骂他是个最难斗的监狱油子！

监狱油子吗？他也是也不是。

他的确是个监狱油子。他了解监狱的各种法令、条例、

审讯的方式和手段——他以前看过的书现在用上了。甚至他能从蛛丝马迹中知道预审员的姓名和背景。每个人受审回来，他总要向他们打听，问了些什么？怎么问？从而了解形势。他向各个犯人提供法律的常识和参考的意见，告诉他应该如何应付下一次审讯。他清楚牢房里每个人的思想状况、家庭背景和心理状态。他最知道哪些人是出卖灵魂的走狗，并且善于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掩护自己在牢中的活动。

"你干嘛要把牢房里的矛盾搞得这么复杂？"那位喜欢平静的大学生问道。

哥哥笑笑说："如果牢房里面很平静，我们每天连聊天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汇报上去，所以，索性把牢里搞得大乱，二十几个人的矛盾，谁也搞不清谁是谁非，我的言行就没人注意了。再说，这也是政治斗争的缩影，可以练练手。"

哥哥的确很成功，使几个积极分子互相争斗起来，互相指责对方组织反革命集团，而他却不受人注意了，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别人聊天。

他又不是个监狱油子。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从来不会在老弱病残者身上踹两脚，表示自己心狠手黑，借以镇唬其他犯人。他从来不会用诬告别人的办法博得管理人员的好感和青睐。他对那些"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的人是深恶痛绝的。

一个小小的监号是一个复杂的世界，是卑劣、阴险和自私高度集中、充分表现的场所，而哥哥在这里所玩的“政治权术”，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

几乎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哥哥都要向管理人员要纸和笔。在牢房里是不允许有纸和笔的，他说：是要写思想汇报。因为他是重要的思想犯，所以每次都会给他。他就利用这些纸和笔，乘机写自己想要写的东西，写好以后藏起来。

他和那位大学生一起，编写了一本《中国古诗集》。从屈原的《渔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凡是能背下来的诗词，都尽入其中。几个月下来，凑凑也有了几百首。

星期天，他俩利用缝补的机会，拿针线装订起来。许多人都偷偷借去传抄，默默地念着、背着。牢房的灰壁上，似乎浮现出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等景色——哥哥教大家作起古典诗词来了，并给他们讲解诗词的结构、作法和修辞学。

但告密者常在，一次检查牢房时，即使这些诗放在棉衣的棉花里，也被全部搜走了。不过哥哥并不扫兴，依旧教大家写诗。他说：

“旧体诗有许多内涵，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也只有用这些形式才能表达中国人特殊的感受和情绪。”

他念了自己《登鬼见愁》那一首词，大家都喜欢其中的气魄。哥哥伤感地望着铁窗外的一角，那傍晚的天空——

他多向往自由呵！

“我不会忘记你们作的诗词，”他鼓励大家说，“如果有一天我出狱，我一定编一本《狱中诗抄》，你们写的诗里有不少妙句。”

他的嘴角总是挂着一丝玩世不恭的微笑，但是，他也有愁闷的时候。他有时向难友讲起自己的家，自己的童年。他想念父母、弟弟、妹妹……

“我们家的那个小姑娘……”他总是这样提起我。

平时，他很少哼歌，可是一说到童年，他就会唱起苏联的一首歌曲：

“由斯大林率领我们去前进，大元帅号召我们去斗争……”

他唱得很雄壮，唱完之后又自嘲地笑笑，对难友们说：

“那是在少年宫学的，当时还和合唱队一起唱这支歌参加歌咏比赛，赢得了第一。”

呵，金色的童年！在他童年时代，他万万也没有想到，在他二十五——二十七岁的年头，会在新中国的监狱里度过……那一切，那大眼睛的小姑娘、那愉快的野餐、那小学毕业典礼，一切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呵，一去不复返了……

“你会唱列宁最喜欢的那支歌《光荣牺牲》吗？”他问大学生，他想振作起来。

“会。”

“教我唱吧，我一直想学。”

他俩站在黄昏的暮霭里，站在炕板上，望着窗外蒙胧的余辉，那里刮着的微风是自由的，而这二十平方米的牢房却要挤住二十个人。

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
你光荣的生命，
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
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他动情地唱着，歌声那么认真、沉重，牢房里的人都默不作声，静悄悄地听着、听着……

“唉！别唱了！”一个老头终于忍不住了：“已经够难受的了，还唱这么惨的歌！”

哥哥回过头来，看着老头笑了：

“这个歌一点儿也不惨呵！”

“算了，”大学生扫兴地说，“我们不唱了。”

他们坐下来。那时候，哥哥比号里其他犯人多一样东西——手铐，这是因为他不交代问题而受的惩处，吃饭时摘下来，血液刚一流通又铐上，铐得紧紧的，血管胀得非常难受，疼痒钻心，又毫无办法，好一阵才能过去。每当这时，他总想找些轻松的话题和谁谈谈，以分散注意力。可是，只要有谁一戴上铐，立即被视为号里的危险分子，谁和他说话都要被别人汇报上去，人们恐惧和躲避的目光象刀子一样刺进哥哥的心。人们，什么时候才能不那么奴性呢？什么时

候才能不跪着生呢？每当这时，总是那位大学生比较有勇气，冒着自己同样受罚的危险，和他找话说说。

“金色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大学生感叹地说，“一切都过去了！”

“对，”哥哥微笑而镇静地回答，“将来的生活，无论怎么样子，过去的一切是永远不会再有了。可是，你怎能知道，将来就不会比过去更好呢？”

“你是个理想主义者。”

哥哥不答话，只是微笑着悄悄地哼起那支刚刚学会的歌。

“我入狱纯粹是历史的误会，”大学生懊恼地说，“我根本不懂什么政治，也不是什么政治家，只不过是个热情的青年，却被糊里糊涂地卷进了政治漩涡，作为政治犯关在这里。”

“我值得。”哥哥想了想，郑重地说道。

大学生望着他，他直视着这位“联动分子”的眼睛，自信地说道：

“你出身高干，过去生活一直优越，这所大学上腻了还可以上另一所，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没有和你们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我们从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最令我痛心的，就是绝大多数出身不好的人总有种先天的自卑感——政治上的软骨病，以至有了说话机会的时候，也很难去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我虽然被抓了，也许结局不堪设想，但能为出身

问题付出这么大代价的，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如果说《出身论》是呐喊，也是我们这些青年能够发出的最强音了，文章的巨大影响比我想象的还要强些。你不知道，那些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十分感动我，我不止一次地哭过。许多人寄来血写的信，捐款的、流着泪找到报社来的，……为了这些人，我愿付出任何代价。”

他这发自肺腑的话语，使大学生深受感动……大学生默然不语地望着他。过了会儿，哥哥又笑笑，说道：

“我本来一直想，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和一个出身高干的‘联动分子’，在相等的条件下较量较量。你来的那天，我认为机会来了，我想，如果你来高干子弟蛮横的那一套，我一定要把你整苦，让你知道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厉害。可是和你熟了，才知道我们很有共同语言。”

在监狱里，许多蛮不讲理的人，一听说他是遇罗克，马上都肃然起敬。因为他是《出身论》的作者，是第一个站出来替这个时代被侮辱、被损害的“贱民”作公开辩护的人！他是一个勇士，而且是一个聪明的、冷静的勇士，他知道在什么时候打出最有力的一击。

对哥哥的审讯已到收缩程度了，形势越来越紧张。

“你这死反革命，顽固透顶！”审讯员最后一次警告他：“你的下场可想而知！给你最后两分钟考虑后果！”

屋里的人都出去了，只剩下哥哥一个人。两分钟，最后的两分钟啊！难道，哥哥还需要什么两分钟吗？他从动笔

写《出身论》的那一分钟起，不是已经决定为真理献身了吗？迄今为止，他的一切言行都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两分钟，对他来说太无必要了，因为他已经整整考虑了一生。

门被撞开，忽啦啦涌进十几个人，围着他坐了一圈，气氛煞是森严。

“遇罗克，”军代表厉声喝问：“你考虑好了吗？”

“考虑好了，”哥哥沉静地回答，“我的牙膏用完了，请您让我家给我送一支牙膏来。”

“关入死囚牢！”

死囚牢……

哥哥被关在腐臭阴暗的“活棺材”里。一米宽、二米长、双层铁条门，下面有一个塞饭的小口。没有棉被，没有一切洗漱用具。夏日蚊蝇叮咬，虱蚤遍身，三十斤重的镣铐更添了这些“小吸血鬼”们的狂妄和自由。严冬，没有火炉，寒风无遮挡地从铁条门吹入，浑身冻得麻木生疼。一间间的死囚牢关着待死的人。有的人疯了，吼叫声、求饶声使人毛骨悚然，足以使正常的人也发疯……何况还伴随着肉体的摧残。在两三个月之中，哥哥和一些政治犯天天被拉到各大厂校机关去挨斗。他们的嘴唇虽被封闭着，但哥哥每次都用他那单薄无力、久已虚弱不堪的身体，死命地向上挣，决不肯低头。押着他的彪形大汉踢他、打他；台下的群众啐他、骂他；手腕脚踝全破了，镣铐无情地蹭磨着鲜血淋漓无法愈合的伤口；每天批斗回来，血迹斑斑，浑身青肿，活人象死

人一样被拖进牢房，那滋味儿，真比死更难受。而哥哥是怎样惊人地在死神和魔鬼们面前，昂着他那不屈的头呵！他全身浮肿了，忍受着疾病和酷境的折磨，忍受着刑后的创痛，忍受着精神上的种种刺激，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眠的寒冷的长夜……也许他精神分裂了？失望了？怀疑了？消沉了？不！他没有！他以超人的毅力顽强地支撑着，他想活下去，活下去！他唯一挂在心上的，就是琢磨着如何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上层领导人。他在狱中五次上书毛主席，给陈毅同志写过信，希望能有一线生机……

能尝到的滋味都尝到了，该考验的都考验了，没有谁能征服哥哥的意志。是的，没有人能征服他的心！

哥哥，这位在人间大学将要毕业的学生，用这首诗赢得了“监狱”一课的满分：

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清明未必牲壮鬼，
乾坤特重我头轻。

人间大学的每一堂课他都上得那样认真。如果说“当人刚脱出自然界怀抱的时候，他只是个自然物，而不是人。人乃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的话，那么，哥哥堪称为大写的人。

这位优秀的学生，已经被准予毕业了——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坐满了十万人。各个单位都必须有人来参加，看台上、田径比赛场上都是人。在一片高昂的口号声中，在万人高举毛主席语录的红海洋里，十九名犯人被推到主席台下的跑道上，每五个警察押着一个。所有男犯人全被剃光头，胸前挂着大牌子。

口号停止之后，主席台上的人开始宣判。他每念一个名字，就停顿一下，于是五个警察就把那个犯人向前推两步，拉住套在脖子上的绳索（防止犯人呼叫），强迫他抬头示众，然后把头压低下去。有几个犯人（包括哥哥）坚决不肯低头，就有另一个警察过来用拳头狠狠地捶他们的头。宣判词全很短，三言两语，最后全是这样一句话：

“该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九个犯人全部宣判完了，主席台上那人说：

“以上各犯，均报请最高法院批准，验明正身，现在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话音未落，九十五名警察一起用力，一下子十九个人全跪在地上。在几个迅速的动作之后，他们全被五花大绑地拖了起来。这时观众席上、运动场上，激昂的口号声又响了起来。犯人们被带了出去，有的已经吓昏了，被警察拖着，尘土带起几丈高。哥哥拼命地挣扎，他不肯低头，也不肯把带着铁镣的脚向前迈出一步，几个警察吃力地推他，这时候人们清楚地看见：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他仍然不屈地奋斗

着……

哦，哥哥死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他的名字，象过去的一些英雄一样，在祖国的大地上被亿万人传颂着。

我们纪念他，不希望热闹一阵子而烟消云散；我们纪念他，是希望一个人在生的时候要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不要总是在他死后才给戴上桂冠；我们纪念他，是希望每一个人自省——使遇罗克走上刑场的，自己是否也有一份责任？单凭“四人帮”能杀死遇罗克吗？万一将来另有一个“四人帮”式的人物上台，在工人体育场上会不会再次出现一个盲目呼啸的海洋？我们纪念他，是希望能象他那样勤奋地苦读、勇敢地实践、冷静地思考、明确地生活！尤其是他敢于向邪恶和谬误作斗争的勇气与胆略，为了真理与正义，那头可断、血可流的不屈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哥哥，你的浩然正气，将永世永代地回荡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

编后记

《冬天的童话》最早发表于《当代》杂志一九八〇年第三期。它先后被译成德、日、英、法四国文字介绍到国外，但它在国内正式出书还是第一次。此次出版前，我们应作者要求，对文章作了重要修订和补充，恢复了若干原先删去的章节，并将《冬天的童话》的姐妹篇《乾坤特重我头轻》一并收入此书。

编　者

1985年4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冬天的童话
作者＝遇罗锦
页数＝２７８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第１版
ＳＳ号＝１０１０６６６１
ＤＸ号＝
ＵＲＬ＝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ｓｚｄｎｅｔ．ｏｒｇ．ｃｎ／ｂｏｏｋＤｅｔａｉｌ．ｊｓｐ？ｄｘＮｕｍｂｅｒ＝＆ｄ＝２０４０１８３５０Ｅ１５３ＡＢＢ９Ｂ７３ＦＥＢＣ８２Ｂ５６７１５